

共和国轶事 第一卷

史实真相 澄清谬误

共和国重大事件和 决策内幕

邱石 编
任海日 编
出版社



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

人民大会堂春意盎然。7000多干部翘首以待，希望能早一刻听到领袖那富有启迪心扉，拨动乾坤力量的恢宏之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

60年代的第二个寒冬，北京，共和国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在这里举行。七千名干部聚集一堂，议论风发。刘少奇作报告，情理并重。林彪却弹出一串不和谐音。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但更强调进取。当七千名干部纷纷踏上归程时，他们的心情已同进京的那一刻迥然不同了。

题记：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摘自毛泽东《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

毛泽东认为，困难的形势已经走到了谷底

60年代第二个寒冬。北京。共和国历史上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将在这里举行。

自1960年下半年工农业生产出现巨大。恶性滑坡以来，整个“大跃进”运动已经转换成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非常规经济运行，这就是对挟持着沉重惯性的超速度经济巨轮实行急煞车，对实在高不可及的高指标进行调整。当年9月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显然带有迫不得已的性质。

但是，当时人们对于“紧急煞车”的看法并不相同。这不单反映在经济操作的技术性问题上，更涉及到人们的思想、政治乃至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面。

一方面，党中央为纠正具体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大力恢复农业；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稳定、调剂市场供应。如在农业方面，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在全国农村试行。《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的基本精神是，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时，要求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最近二三年内应更多地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于中央和中央局，反对1958年以来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同时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要求1961年分别完成960万和1000万两项指标。并实行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在稳定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以及增加流通渠道等措施。上述调整措施的出台，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具有积极作用。加上自然灾害的减轻，农业生产微露转机，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但另一方面，在实施调整的过程中，又表现出决心不大，措施不力。例如，由于对1960年各项产值指标预计偏高，实际安排的1961年主要指标仍不符合实际。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当年计划，农业总产值为65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2310亿元，与核实后的上年确切产值相比，分别需增长58%和40%，这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显然无实现的可能。

调整所以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其根源在于全党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没有达到认识的统一。一些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仍然缺乏实事求是地对待困难的态度。他们中有人认为，目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有的虽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的错误；特别是1961年苏共22大召开后中苏两党分歧的表面化使党内思想复杂起来。一部分人不甘心，不服气，仍想大干超过英国；另一部分人则在困难面前产生怨气，要求追究责任。归纳起来，认识分歧主要表现在下述四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

-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到底如何估计？
- 二、对过去几年的工作究竟怎样看待？

三、缺点错误由谁负责？

四、有没有希望？

显然，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分歧需要加以统一。在规划度过暂时困难后的建设方针时，这种全党的认识统一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 7000 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认识分歧。

作为掌舵人的毛泽东，往往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善于从战略高度提出问题，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更是如此。

1961 年 12 月 21 日，也就是在中央为召开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工作会议上，由总书记邓小平向出席会议的各同志传达了毛泽东近来一些深思熟虑的看法：

（一）关于形势到底是好是坏的问题，毛泽东说，他感觉去年前年心情不那么很愉快，究竟国内形势怎样？做一个总分析，还是不错的。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60 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

（二）关于对过去几年如何看。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点错误，我们也把它总结起来了，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了，就变成了财富。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好。

（三）关于责任。毛泽东责成中央书记处将 1958 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作一研究，中央书记处编了毛泽东讲话和中央指示两个本子，认为前者没有错误，后者毛病很多。毛泽东说，有些问题是部门、地方出的主意，为什么中央听呢？他认为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

（四）关于有没有希望的问题。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应该是有希望，是扎扎实实有希望，是真正有希望，毛主席的方法，他多次跟我们讲，就是不断革命，一个任务完成了就要提出新任务，要不然灰溜溜的。

毛泽东还提出，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要大抓一年，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个头绪来，都要“跃进”。

看得出来，毛泽东是乐观的。他并不想掩饰前几年的错误，但却希望全党同志务必明确起来，形势是好的，事业大有可为。在他看来，最大的困难时期已经度过了，今后应当鼓气、振作。用他的话说就是，大抓一年，以求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跃进”。

其实，早在 1961 年 8 月二上庐山时，他关于整个形势已经“退到谷底正走向反面”的想法即告形成。当时他说，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七千人大会前，这种想法与观感，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毛泽东的主导思想。

七千名干部聚首一堂，议论风发

1962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共7078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是建国以来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其代表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会议的原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以便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与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但是，由于代表的广泛性，由于绝大部分代表来自基层，他们目睹了“大跃进”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中发生错误，带给实际工作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困难，他们对许多经验教训有强烈的切身感受，期望有机会谈出看法，进行批评。

分组讨论于1月12日开始。最初议题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上。

关于分散主义的内容，代表提出，经济上主要是高指标，基建乱上马，搞得战线过长。具体表现是：留后手；搞铺张；打埋伏；盲目扩大城市人口；增加职工。此外，在政治上、思想理论上也有分散主义。如乱提口号，乱创理论，标新立异。在组织上，则表现为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甚至搞独立王国，对中央封锁消息，抗拒检查等等。有人将分散主义的表现总结为八条：（1）各自为政，目无中央；（2）乱提口号，擅作主张；（3）破坏计划，不顾国法；（4）谎报封锁，风头至上；（5）监守自盗，以邻为壑；（6）欺上压下，独断专行；（7）生活特殊，像个国王；（8）资本复辟，亡国亡党。

关于分散主义的根源，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问题，即在“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上处理不当。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了“条条”，“块块”摸也摸不得；以后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更多的人认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例如有的人指出，目前我们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分散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而是执政党内部那种“官大、权大、胆大”的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同特殊阶层的萌芽有关。还有的人指出，分散主义源于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主要是怕丢了党票，丢了官。过去确实有人因为讲了老实话，反映了真实情况，遭到无情打击，被开除党籍，送去劳改，甚至老婆、孩子也跟着遭殃。结果是一片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从思想方法上说，目前缺少辩证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的人尖锐提出，反分散主义的重点，是在中央各部门和省一级。

随着对“书面报告”讨论的深入，关于“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经验教训，以及如何认识1959年庐山会议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便成为议论的焦点。在这些议论中，暴露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分歧。

就原则而论，大多数代表对“三面红旗”还是肯定的。有些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因为：（1）“三面红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它的提出和形成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的，具有深刻的科学根据。（2）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绩。（3）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实践过程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等等。

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订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4）“三面红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旗帜。对于它的意义，应该从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

但有的代表提出：“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这些具体问题归纳起来共有七点：（1）跃进还是没有跃进以什么标准来衡量；（2）如果说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粮食、市场紧张；（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减产了，对大跃进怎样理解；（4）高指标、大规划是不是执行路线的错误；（5）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有些错误和缺点会形成全国性的；（6）有些事情大跃进了，有些并没有大跃进，怎样看才是正确的；（7）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还有的代表提出，这几年工业是跃进了，农业58年大跃进是肯定的，59年、60年粮食减产，牲畜死亡，群众积极性不高，跟农民说大跃进感到难以解释。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办快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要求这样改变生产关系。另一些代表有同样看法，认为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搞早了，搞快了，高级社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一定非办公社不可。有的代表还提到大跃进没有标准，以致过去烧饭也要大跃进，将大跃进庸俗化了。

与此不同，有一部分代表认为，（书面）报告草稿中的指标讲得不响，不能完全反映跃进的速度，不能鼓舞人心，更好动员全民的干劲。他们提出，10年左右赶上英国的号召一定要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指标一定要实现，绝不能打折扣，更不允许因为碰到困难，就想把主席的号召吹掉。有的代表提出，不应以目前国民经济处在调整时期的发展速度来看我们将来的发展速度。根据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跃进之后必有休整，休整之后必有跃进……所以说，当前一、二年的工业发展速度虽然较慢，但经调整之后，必将出现一个高速度的跃进局面，对超英赶美是完全有把握有信心的。他们还认为，全党在这次会议上对“三面红旗”要得到认识上的完全统一，并建议在书面报告中对目前仍然存在的对“三面红旗”的各种模糊认识，例如：“总路线的实质是高速度”，“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这面旗子可以不要”等，加以批判和澄清。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不是“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主要是在具体执行时数据不够。如指标要求过高过急，容易发生强迫命令；对某些好的典型强调过分过多，往往使下面不问具体条件、一轰而起，等等。还有人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虽有问題，不尽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

关于几年来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与会代表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下述几个方面的意见最为集中：（1）高指标；（2）强迫命令；（3）迷信小洋群，强迫“遍地开花”、“以土为主”，“愈土愈好”；（4）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5）所有制变化过快；（6）对技术革命作用估计过高，忽视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如某地提出“一天革一个命”“创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工艺”的口号；（7）理论宣传的失误。如《人民日报》自1958年以来发表很多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文章，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则起了动摇作用；报道了一些虚假的所谓高产卫星，助长了浮夸风和谎报成绩，片面夸大主观能

动性，提倡唯心主义。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如“拔白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学术批判同政治反修联系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学术批判；如“厚今薄古”的口号，厚今可以，何必薄古；《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应全面解释“高速度与按比例”、“数量与质量”、“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8）对毛主席指示执行不力。

但是，在挖掘犯错误的根源时，意见很不统一。有人认为，几年来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但相当多的代表不同意这个说法。有些代表提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都归结到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有苏联的经验，还有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如果说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在党的工作、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方面，就不能说没有经验。如果说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没有经验，在郑州会议、庐山会议主席已经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调整了指标之后，就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因此，没有经验，固然是产生某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一切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另一些代表认为，开始确实由于缺乏经验，当时形势大好，大家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对于各地出现的一些高产量、放卫星等经验，就轻易相信、急于学习和推广，但是后来在工作中受到损失，逐渐感到有些不对头的时候，由于党内强调反右，帽子很多，压力很大，以为自己风格不高，因此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说假话当然不能归结为没有经验。一位代表诘问：这几年实际工作中出的毛病，能不能说成主要是没有经验？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也都没有经验，都办得很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经验，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短时间就丢掉了？

有代表指出，这几年经验教训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斗争上。几年来认为右是主要的危险，认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谈右色变”光是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部分代表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之后。前段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后段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是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有，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看风驶舵，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有的代表尖锐提出，59年庐山会议前后，在全国范围内，究竟“左”倾是主要的，右倾是主要的？需要弄清楚。庐山会议反右及其由此引起的全国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对地方工作，特别是人的思想发生重要影响，许多干部挨整、受处分，长期得不到平反、甄别。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的发言不能不接触到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有的代表提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有的同志指出，文件中把高指标作为主要教训，但高指标不是根本的而是派生的问题，根本问题是片面强调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另外有的同志认为，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也不是高指标，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更有同志指出，这几年来为什么瞎指挥，为什么高指标，为什么脑子发热，为什么对许多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什么自以为是，总的根源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认识上有错误，误

认为生产力发展很快，误认为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与此有关的是，不尊重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价值法则，以及剥夺了同盟军——农民等等。有的代表以急切的心情提出，这次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会开好了。

1月的北京，正值朔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时节。然而，人大会堂中，各代表团住地却热气腾腾。人们高声谈论，畅抒己见，甚至面对面地展开争论。几年之中，人们曾登临高峰，也历经挫折，要说的话和要辨明的问题自然很多很多。

彭真说：毛主席为威信是珠穆朗玛峰，拿走几吨土也还是大山。

为了作好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央专门组织了报告起草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牵头，结合各地代表提出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报告起草委员会共 21 人参加，除刘少奇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及各大区书记都是正式成员，可谓“群贤毕至”。或许是整个大会的热烈气氛引发了人们对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也变得不平静起来。

1 月 17 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对书面报告初稿进行修改。华东局书记柯庆施首先就大跃进的争论问题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 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他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了几种地区以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 6000 亿斤不行，5000 亿斤总还是可以的。他认为，华东区到 1967 年可完成 4000 亿斤粮的指标。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

1 月 18 日，彭真发言。他说：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 年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 59 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60 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讲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关键是 59 年庐山会议。就在不久前，刘在 61 年 12 月工作会议上说过：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

彭真接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邓小平在此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按：指中央书记处 1961 年 12 月 16 日写给主席和常委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彭真还表示：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

在 1 月 19 日举行的会议上，周恩来率先发言。他指出，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他坦率地说，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紧接着是陈伯达发言。他将问题转到昨天彭真发言上面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他提出，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彭真马上起而答辩，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21 日，起草委员会继续会议。刘少奇首先发言。他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按指《纲要》规定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所要达到的指标）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薄一波接着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认为，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 2%，苏联 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彭真再次发言，认为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刘少奇最后提出：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至刘少奇的发言止，大家对问题的提法大致取得了共识。作为决策集体，人们意识到有必要以一种客观的、普遍能接受的结论统一全党的思想。但是，这一结论应当建立在实事求是甚至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因为毕竟 1958 年以来的教训太深刻也太沉重了，彭真所说不应文过饰非，其重要性也正在这里。起草委员会内的一番争论，特别是各分组讨论提出的尖锐意见，使党的领袖们认识更加明确起来，这就是错误一定要讲透，教训务必讲够。否则总结经验便流于形式，改正错误就没有保证。一句后，讳疾忌医绝对是政治上的短视。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理情并重

本来，起草委员会在认真讨论之后，已形成了大会报告的修改稿。这个修改稿对几年来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作了深入分析，提出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工作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刮“共产风”，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过分强调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以及对建设事业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市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各方面紧张等几个方面的错误。但是中央认为，有必要对书面报告做进一步的说明。于是，1月27日下午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常委，在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刘少奇的讲话用时超过两小时。毛泽东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话。整个报告更接近于实际，提到了一些重要看法。这些看法是：

(1) 对当前经济困难的估计。讲话指出：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2) 产生困难的原因。讲话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那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3) 成绩与缺点的比重。讲话说：总的说来，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说：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4) 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实事求是地说：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不办

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搞不成。但刘少奇又强调，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

（5）关于所犯错误的性质。刘少奇重申了书面报告的说法：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

最后，口头报告对“三面红旗”提出了总看法：“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认为它非常深刻透彻，把许多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解开了思想上很多疙瘩，感到心情舒畅。其中触动大家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成绩与缺点比重的提法，即不能总是讲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要看到实际的三七开。有的地方甚至更严重，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了。口头报告在这样范围内公开上述说法，确是几年来最富于勇气和彻底性的一次。

林彪弹出一串不和谐音

正当大家继刘少奇讲话之后进一步检查本地区本部门几年中的缺点错误时，国防部长林彪于1月29日作了一次大会发言。在这次发言之前，还有一段不得不交代的插曲。

事情发生在林彪讲话稿起草班子中。一些同志认为，叶群在讲话第四稿“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一语后面，坚持加上“和天才的结合”6个字实属不妥，因为它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会产生不良影响。但叶群立即将讨论情况通报了林彪。林支持叶的意见，竟说“不能提天才是修正主义观点”。进而操起他的老习惯，临上台前把讲稿弃之不用，自拉提纲，信口讲开去。

林彪发言的主题是军事工作。但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谈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整个基调是大事颂扬，肯定。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在议论缺点错误时，他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的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更引人注目的，是林彪下述说法：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显而易见，林彪这些话并非以深刻总结经验为出发点，而是话中有话，言有所指。在大多数人都对错误进行反思时，他偏要讲一番“中听”的话，以博得另一种反响，其用心真是良苦而不可测。这种作法很表明林氏的风格。早在2年多前，他在庐山的中央常委会上，几乎是破口大骂彭德怀，就是出

于一种十分晦暗的心理。结果，为其后一连串的升迁奠定了基础。林彪惯于弹弦外之音，在七千人大会上又一次作了“精彩”表演。

毛泽东作自我批评，但更强调进取

林彪的讲话并未能改变当时大会的基调。毛泽东决心召开这次大规模会议，就是要请各地干部到北京“出气”，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他需要与会同志充分进行批评，讲出心里话，然后统一思想，为未来工作打开局面。

1月30日，毛泽东莅临大会作重要讲话。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里春意盎然。7000多名干部翘首以待，希望能早一刻听到领袖那富有启迪心扉，拨动乾坤力量的恢宏之论。

毛泽东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准时步上主席台。他步态轻松，面带微笑。瞬时，整个会堂中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讲话了，他从这次会议的开会讲起。一如他往昔的风格，在谈笑自若、纵论古今中阐发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这样，就能更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跃一些。毛泽东说，不采用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的方法，而是采用现在的方法，对总结12年来，特别是总结最近4年的工作经验，是适宜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

接着，他引入了讲话的主题。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但对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叫做统一认识，统一政府，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了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在讲到党委机关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在领导班子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书记一人独断时，毛泽东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项羽称作霸王，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而刘邦却“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总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别姬”的典故在这里虽是一句笑谈，但却体现了毛泽东深刻的用意。1958年以来，各地独断专行，完全丢掉民主作风的事例很多。而这造成了干群之间极大的隔阂，也给整个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害。讲到这里，毛泽东仍觉意犹未尽，于是现身说法，向与会的干部们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许多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毛泽东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强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言简意赅、深刻感人的话，使在座的干部们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听到主席作自我批评，有的人甚至当场落下泪来。

然而，毛泽东此时更需要向全党同志阐明的，是在大的挫折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以及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观察事物运动的规律——成绩错误、前进与停顿、挫折与成功之间的辩证道理。因此接下去毛泽东讲了一段极为著名的话。

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了盲目性，认识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个飞跃，到达了自由王国。

他又说：自由是被认识了了的必然，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

毛泽东接着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认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

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他说，头 8 年内(1949——1957 年底)，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由的能力。1958 年，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 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进而，毛泽东指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只有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显然，这掌声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在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下，行动亦进退踌躇时，最需要的是给他们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出光明的前途。并且，这种说理是生动的，贴近现实的，具有令人折服的魅力。这正是毛泽东作为领袖所特有的禀赋与才智。在中国革命众多的严重关头，往往经毛泽东一段高瞻远瞩的点化，形势立即就变得天朗气清，人也变得斗志倍增了。这的确是毛泽东伟大之所在。此外，进取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他藐视敌人，藐视困难的气概几乎伴随一生，直到晚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正如他几年后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

毛主席都作了自我批评，我们还有什么可敷衍塞责的？

毛泽东的讲话在与会者中反映强烈。不论党的高级干部还是来自基层的官员，都有难以安坐之感。从此至会议结束，出现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

在下述问题上，人们作了较为深刻的反省：

1、工农业高指标发生在何时？

2月6日，华东局和前华东区协作委员会负责人在发言中说到：头脑最热的时期是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北戴河会议前后，首先是农业生产，1957年的估产就有点高，1958的麦收以后头脑更热，对亩产几千斤是相信的。1959年11月，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估计全区当年产量是1680亿斤，提出1960年“最低限度”比上年增产20%，即达到2000亿斤，每人1000斤粮食，要求2、3年内搞到每人1500—2000斤粮食……1960年10月华东局济南会议检查了山东农村工作，我们才真正清醒过来。由于农业上的高估产，以为粮食过关了，工业生产的指标也过高了……基本建设战线也就拉长了。

2、“第二次跃进”的起因。

2月1日下午某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说：问题最大的是1959年底到1960年。农村中，急于过渡。砍掉私人养猪。高估产、高征购、大办食堂。养猪“万、千、百”运动。取消自留地。这段“共产风”刮得最厉害，瞎指挥也更多了。在工业上：一本帐、二本帐、三本帐、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追上海“一天一个亿”（产值）……比例关系打破了。2月3日下午，福建省委负责人在发言中同样认为：1959年反右倾面搞得太大了，所以1960年就更“左”了，又发热了，错误缺点就出得更多了，有许多事情不按实际出发、搞了许多大办，损失就更大。如1960年5、6月的大搞煤铁战役，大办“五小”成群……本来我们已经由土到洋，已经有三明中型钢铁厂了，有一些小洋群了，不必再搞小土群了，但那时又大

搞，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农业，计划也打乱了。上海市的领导人在发言中也承认，特别是1960年春天，由于第一季度“开门红”造成的假象，我们的头脑又热起来，搞了几个“大办”，钢铁煤炭的增产指标又安排得过高了，又过分地强调了“小土群”、“小洋群”，曾经要求有资源的专、县及少数公社立即开展年产千吨铁、万吨煤的运动，……给各省的压力很大，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统一安排。

3、高指标产生的影响及纠正的困难。

华东局负责人说：指标过高，带来不少问题。如影响到干部的作风，过多地搞计划外协作，影响国家的统一计划……回想起来，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了问题，如市场从58年底就开始紧张，我们也有所察觉，以为是社办工业搞多了影响市场供应，只是要各地整顿社办工业，而没有追根到底，没有同高指标联系起来，因而每当中央、主席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我们一方面同意，一方面，又怕退得太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又订出了比较高的增产计划，使纠正这方面的缺点错误的时间拖延下来。

2月1日下午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发言中说：问题开始发生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1959年该省粮食本来没有那么多，而估产则达到160亿斤。在高估产的错误下，产生了高征购。1959年粮食征购33亿4千万斤，比正常年景下的征购数（17亿斤左右）增加将近一倍。1960年春，召开的四级干部

和党代表会上，粮食产量仍未落实，而且又吹起了一阵浮夸风。由于高估产、高征购，给农民留下的粮食已经很少了，而在某些地方又开展了反瞒产私分，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浮肿病、死人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4、产生错误的原因。

在各省委负责人的发言中，一般都讲到犯错误的主观原因，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脱离群众。也有的提到缺乏经验。辽宁省委负责人作自我批评说：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性，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认为，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对主席指示学习不够，领会不深。没有把握住主席的思想，顶住错误的东西，非马列主义的、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这是最深刻的教训。如果按着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上主席的指示去做，现在的情况就好多了，许多错误可以避免……其次，我们有争先进、怕落后的思想。形势所逼急起直追，和人家争“版权”。有的提“几天革一个命”，我们就提“一天革几个命”。说“人家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有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而又把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主观主义的东西变成行动，就必然带来强迫命令，施加压力。

广东省的负责人在2月3日的发言中说：在约两年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上是丢掉了党的两个优良传统：一是党内斗争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运用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传统，出现了过火斗争；一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传统。而这两个恰恰是毛主席思想的精华。几年来丢掉了这两个传统，损失很大……但他认为58年以来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省委沉不住气，有指标主义；不了解情况，官僚主义，但不是弄虚作假。省委的同志不懂生产，下去了解情况走马看花，只从计算穗粒来定产量，只看好的，不看坏的。在自己的主观上，感到上半年落后了，急于挽回广东名誉，提出“重夺上游”，是患得患失思想的表现。

5、关于“反倾向斗争”。

2月6日，某省省委负责人在发言中说：省委在几次反倾向斗争中，是犯有机械过火的错误的。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没有严格区别党内党外的界线，在党内对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不适当地采取了机械过火的斗透斗臭的方法。特别是在这次反右派运动中，给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工人、农民错误地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第二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将一些实事求是的好同志错误地反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三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机械过火更加严重。第四次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纠正“五风”运动，不适当地把县一级作为整风重点，各县举行的四级干部整风会议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机械过火的斗争，省委工作队所在的县尤为严重……另外，省委当时对于农村阶级复辟的情况和阶级复辟对于党内的影响估计的过于严重了一些，——所以这次整风又伤害了一部分不应该伤害的好同志。

中南区湖南各组在讨论中提出，对干部情绪伤害最大的是整风整社运动和反右倾运动。反右倾以后，主要是发展了一股不敢讲话之风，影响了党内民主生活。整风整社运动，主要是伤害了很大一部分基层干部的感情。

关于为什么发生过火斗争的原因，一位负责干部分析了如下3点：（一）片面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经常的倾向是右倾保守；（二）混淆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把思

想问题和实际工作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三）对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领会不够。但有的同志仍然尖锐地认为，导致过火斗争的原因是：（一）几年来都是认为右是主要危险，认为“左”是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大家“谈右色变”。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脱离实际。

（二）几年来把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混淆在一起了，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也做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根本问题在这里，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

就60年代人们的实践水平和认识水平而言，上述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是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无疑，它们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和纠正错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如同人们无法穷尽真理一样，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期实践的人们，也难免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带有很大的认识局限性，这种状况只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才能逐渐得到改观。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探索，作为人们向认识长河中真理部分的无限接近，是功不可没的。

尾 声

会议的最后2天，分别由总书记邓小平和周恩来总理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仍突出强调了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问题，并把“坚持与否”、“完善与否”的意义提到关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总理的报告则细密地检查了国务院的工作，并实事求是地报告了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他提出精简机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8项克服眼前困难的办法，充满严谨务实的精神。

2月7日，7000名干部开始纷纷踏上归程。此时，他们的心情已同进京的那一刻迥然不同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和疑虑都先后释去，按照中央的方针，在挫折之中重新奋起，已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

1962年的早春天气，为寒凝的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为克服困难作出了卓绝的努力，在向自由王国攀援的曲折途中，他们留下了艰辛的足迹。

（李向前）

两个文明古国的一场现代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 自卫反击战

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罗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中国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它融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一体，充分反映了边境地区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了我军在高山密林高原严寒地区作战的光辉范例取得了军民共同保卫边疆的宝贵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值此作战胜利30周年之际，全面客观地介绍这场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对于总结其经验，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政府继承与扩大英帝的衣钵，挑起边境冲突

中印边界全长约 1700 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 650 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 400 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 6795 高地；西段，长约 650 公里，从札达县的 6795 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规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一、英国种下中印边界纠纷的祸根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均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 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画一条侵占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1914 年 3 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贝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 5000 支枪、50 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 9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 年 3 月 24 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东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标划在比例尺为 1 英寸等于 8 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委、迟疑不决时，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 1914 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东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 9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浙江省，有着丰富的矿产、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

从未承认。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法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然而，英国侵略者既作贼心虚，又贪婪成性，在时隔 20 多年后，于 1938 年又故态复萌，于起偷偷摸摸的不光彩勾当来。他们采取伪造证据、偷梁换柱的手法，重新出版 1929 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篡改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会议之中，重新出版该卷，而出版日期仍用 1929 年原版日期。这样，1938 年印刷的标明 1929 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伪本中，出现了“麦线”秘密的非法文件。伪版出版后，英印政府即下令把 1929 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在出版《西藏高原与周围国家的地图》中，第一次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符号，画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样，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就炮制出来了。由此可见，“麦线”是非法的，无效的，但从此埋下了中印边境东段争端的祸根。

在中印边境西段，1846 年英国吞并查谟——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 1865 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羌臣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该线。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二、印度政府继承与扩大英帝的衣钵，挑起边境冲突

1947 年印度获得独立后，印度政府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印度独立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西藏同样也应从英国侵占的特权下摆脱出来。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拉萨“代表处”进行了交涉。为此，西藏地方政府的合理要求，印度政府却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它就是要继承英帝的衣钵。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线”，但好长时间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乘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且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逐步向“麦线”推进。1951 年 2 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内务与抗美援朝战争，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之机，派兵 100 余名越过西山口、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

搬出；印军在侵占达旺前后，还占据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占据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西藏解放后，印军继续向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1953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来福敌连共70余名官兵，逆苏班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瑶巴族居民用弓箭将其全部射杀。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占据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改官方地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标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然而，印度军政人员自知“麦线”不合法而感到心虚。1955年4月6日，侵驻下察隅的印度官员发出一份绝密文件称：“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马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占据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年又占据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占据了波林三多；1957年占据了什布奇山口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年又占据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我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趁我军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占据了爱尼山口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占据了马里加斯。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外交部也向印方提出过多次交涉、抗议，但由于我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1959年3月，我国在西藏所取得的平叛、改革的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我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在1950年至1951年我军进军阿里、1956年至1957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于他们，并硬说我国“占据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占据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占据了塔马墩；8月13日占据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听。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我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退。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

我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我巡逻队，我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我击毙印军9人，俘7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我国的诬蔑，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走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哨位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我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得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0余架次。

中国政府被迫作出自卫反击的决定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奉行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的原则，与邻国之间边界问题的处理，既照顾过去的历史，又照顾已形成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解决。据此，中国同缅甸、尼泊尔等国顺利地解决了国界问题。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总理在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对于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在信中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的问题，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同时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军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的来信后，又于11月7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1959年11月16日的来信后，于12月17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英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中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6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他提出的6点完全是对等的，没

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

1960年6月至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我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度坚持其狂妄主张，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1962年8月至10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此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

二、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被迫作出反击的决定

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对尼赫鲁来说，中国要是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进政策”，直到采用战争手段。这样，从1961年开始，尤其是从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印度政府侵占我国领土和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当时印度宣扬：在东段已将中国国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而走险，诉诸武力。

1962年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度边境提斯普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17、18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但是，印度方面毕竟错误估计了形势，它以为充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会得到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正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所以，它认定此时正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它怎样进攻，中国是不敢还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遵照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

问题的同时，也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指挥部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副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自卫反击作战的经过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主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自卫反击战（10月20日至28日）

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2000人。印度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国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与我作战的印度第四师号称“王牌部队”，是“印军编制、装备、训练的试点部队”。第一一四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受过山地战训练。这些部队在印度陆军中具有代表性。其作战部署是：东段，第七旅4个营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炮兵第四旅两个步兵营配置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1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边区”；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西段，印军第一一四旅以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入侵我境的43个据点；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印度的企图是：在东段，依托已侵占的所谓“麦线”以南和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继续向西藏内地扩大侵占范围；在西段，依托其入侵的43个据点，继续向我境内蚕食，逐步侵占新疆阿克赛钦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的主要部署是：以西藏4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以新疆1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张战果；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山南地区，该地山峰比高1500米以上，海拔4000米左右。森林密布、气候恶劣，人烟稀少。该地区有印军第七旅、炮兵第四旅2个步兵营，共6个多营6000余人，部署在克节朗、棒山口、达旺一线，企图巩固已侵占之地，并继续侵占我克节朗河以北地区，实现其“以塔格拉”（即拉则山）山脊为界的梦想。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集结了10300余人的兵力，对印军第七旅实施反击。根据印军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布势特点，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3至4倍于敌的绝对优势的火力，采取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于20日拂晓开始反击。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在枪等、卡龙之间强渡冰冷刺骨的克节朗河，向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互相掩护，交错前进，与印军展开激战。负责摧毁塞维拉河岸卡龙据点的我二连六班（班长阳延安）一往无前，勇猛反击，共攻克27个印军地堡，收复了卡尤据点，为驱逐入侵卡龙的印军第七旅创造了条件。战后，六班被国防部授予“阳延安班”英雄称号。负责清除克节朗河南岸扯冬据点的我三连二排，敢打敢拚，连续摧毁14个地堡，收复了扯冬据点。战后，二排荣立集体一等功。当天即清除了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的入侵印军。

担任左翼助攻部队，向沙则、仲昆桥、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入侵沙则的印军在这里构筑了堑壕及百余个明暗地堡。攻占沙则可直接威胁克节朗地区的印军指挥机关。于是，助攻部队穿密林，攀悬崖，涉急流，迅速突入印军前沿，首先割断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指挥机关与沙则据点的联系。在沙则战斗中，九连二班班长张映鑫率领全班，连续攻克印军4个地堡，在攻击第5个地堡时，他身负重伤，向地堡投入最后1枚手榴弹，并用双腿堵住印军地堡射孔，壮烈牺牲，为后续部队歼灭印军创造了条件。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当天，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22日，中国国防部宣言：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23日，我山南地区部队歼灭棒山口之敌一部，占领棒山口。接着，我军兵分5路实施追击，直取达旺。印军仓惶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一线撤退。我边防部队又以一部渡过娘姆江曲，昼夜兼程，沿下地、龙拉、沙泽一线急进。清除棒山口入侵印军的另一支反击部队，于24日占领了东新桥等地。25日，几支反击部队相继进占达旺。尔后，其中一部继续向南推进到达旺河北岸。克节朗——达旺之役遂告结束，首战告捷。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并在事实上否认了所谓麦克马洪线。

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反击作战。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于10月20日分别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灵公、拉木多、林卡、拉曼、阿夏比拉等印军据点，歼敌一部，进占了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等地，逼近瓦弄，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加勒万河谷、红山头 and 班公湖地区反击作战。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西部，在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山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高寒缺氧，荒无人烟。印军第一一四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0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内，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内。印军第一一四旅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侵占红山头，杰特联队第五营侵占加勒万河谷。印军在侵占的据点内设置障碍，组织较严密的火力，各点均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企图凭借其据点，伺机侵占新疆的整个阿克赛钦地区。

我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打歼灭战的有效战法，决心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然后采用拔点攻坚的有效战法，就地围歼，逐次清除加勒万河谷、红山头 and 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的入侵印军。为防止印军向我边防部队的薄弱地区进攻，又令空喀山口防区驻守分队在班公湖以南组织积极防御，牵制当面入侵印军。

红山头攻坚战斗及天文点防区作战。红山头是西段第一阶段反击战的主要方向。该地是斗拉特别奥里基地印军联系天文点地区据点的重要枢纽。印军构筑了16个地堡、5个地下室工事，组成两层火力阵地，火力强，工事坚固。20日，新疆边防部队首先实施炮火急袭，尔后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反击。一部由正面佯攻，一部从侧后直插红山头主峰，另一部直插入侵印军平台阵地，攻击分队以爆破筒、炸药包、喷火器歼灭负隅顽抗之印军。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驱除了入侵印军，夺回了红山头主峰。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半途撤回。红山头战斗后，我们乘胜扩大战果，担任

打援、守卡、警戒的分队相继拔除 31 号、12 号、5 号、8 号、11 号、17 号等 6 个印军据点，全歼守军，收复失地。其他各点之入侵印军于当晚仓惶逃窜。至 21 日晚，天文点防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被肃清，给印军第一一四旅第十四营以沉重打击。

加勒万河谷拔点及河尾滩防区作战。加勒万河谷地区，谷深沟窄，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交通不便。印军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印军在此处构筑了工事、地堡，企图长期占领。新疆边防部队对其军情、地形了如指掌。20 日，我边防部队向该处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反击。首先利用夜暗隐蔽接近印军据点，尔后实施炮火急袭，随即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反击，在工兵、防化兵密切配合下，经过 40 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该处战斗结束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兵分两路，一路顺加勒万河谷南进；一路北上向西大沟发展。至 23 日，拔除“河印 27 号、28 号”据点，其余印军哨卡闻讯而逃。至此，河尾滩防区全部肃清。

班公湖四战四捷战斗。印军第一一四旅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入侵班公湖南北两岸建立了据点。班公湖北岸为空喀山口防区，南岸为阿里防区。21 日，担负空喀山口地区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抓住战机，向位于班公湖北岸中国一侧的西里扎普、安拉沟等地的印军进行反击；22 日，班公湖南岸新疆守卡分队一部，清除了占据南岸及其以西另一据点的入侵印军。在班公湖西岸的西里扎普、4400 高地、绝拉沟、野营地的拔点攻坚战斗中，我军四战四捷，全歼印军。战至 24 日，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及其以北地区的 31 个入侵印军据点。

转战巴里加斯。巴里加斯位于西藏阿里噶尔县西北，为狮泉河河谷，距传统习惯线 18 公里，河谷宽 200—300 米，河谷有公路经东提通列城，两侧为高山。印军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入侵该地，建立据点 6 处，企图长期占领并作继续蚕食其它地区的基地。23 日，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肃清后，我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马里加斯地区入侵印军。受领任务的部队不顾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以惊人的意志挥师南下，对阿里之羌山口、约山口、巴里加斯等地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转移中，我边防部队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夜以继日行军 1400 里，有的分队两次徒涉齐腰深的冰冷刺骨的噶尔河。工兵分队在零下 20 多度的冰河上架桥，保证部队开进。部队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吃冰雪，啃干粮，忍饥耐寒，于 26 日赶到甲岗——狮泉河一带集结。尔后，分兵两路：右翼由甲岗——且坎——拉干赫尔方向迂回印军侧后，断其退路；左翼沿狮泉河谷实施主攻，围歼印军于巴里巴斯——卡日果之间地区。27 日，反击部队一部抵达羌山口与印军打响。机枪连连长司马义买买提在汽车上为掩护战友下车，用重冲锋枪向印军猛烈射击，吸引印军火力，他两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直至壮烈牺牲。战后，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次战斗毙、俘印军多人，占领了羌山口，27 日，阿支、且坎分队攻占约山口。同日，攻击部队对巴里巴斯之印军形成合围。28 日，打退入侵印军的进攻后，收复了拉多和碟木卓克等地。尔后，又收复了巴里加斯、卡日果等地。马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

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 37 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

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斗争已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其最主要之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当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三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东段于24日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指出，中国的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和停止反击的行动，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敦促印度政府响应中国的建议。三项建议不仅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我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边境状态，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夜向边境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要扩大边界武装冲突，与我国再作军事较量，与我军一决雌雄。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炮兵、装甲兵部队各一部，总兵力增至30000人。其部署是：东段，以第四师4个旅部署在西山口——邦迪拉公路沿线；以第二师之第十一旅部署在瓦弄地区；第五旅分布在“苏班西里”和“西安”两边区；第一九二旅布置于提斯普尔。西段，第七十旅部署在东堤及其以西地区；第一一四旅部署在楚舒勒及其以北地区；喜马拉雅第三师师部位于列城。尼赫鲁满以为这样能有把握击败我军。在印度政府大吹大擂之下，瓦弄、西山口等地印军于11月14日和16日又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鉴于此，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还必须再给印军以沉重打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三、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11月16日至21日）

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总部署是：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鄒晋武组成，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

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战。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3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2个团实施大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心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参战各部于11月10日至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17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但印军未发觉我军企图。17日晚，我迂回部队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切断了德让宗——邦迪拉公路。此时印军才发觉我军已多路逼近，彼处于不利地位，遂于18日晨全线撤逃，但已陷于我军合围之中。18日晨，我军发起总攻。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为追歼一股溃逃印军与连队失去了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攻占2个炮兵阵地，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辆汽车。战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当日，我军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歼灭印军一部，一部溃逃，其四师战术司令部率直属部队乘我军未截断通往打陇宗道路的空隙逃脱。19日，我军占领邦迪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随即我军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至此，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瓦弄地区反击战。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该地区山高林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易守难攻。入侵印军第十一旅4个营2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向我军出击。中国边防部队以1个团向瓦弄扎公西北之印军左翼实施迂回包围；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居高临下，直插瓦弄；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11月16日晨，我军发起反击。我军一部攻占扎公、曲子扎公等地，打乱了印军部署。印军十一旅旅长等人见势不妙，惧我全歼，即下令全线撤退，旅长本人随四军军长考尔乘飞机仓惶逃跑，部队大部溃散。在反击战中，我军排长周天喜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打下了印军第一个地堡群，当向印军二个地堡群冲击时，周天喜不幸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周天喜“战斗英雄”称号。战士陈代富奉命执行摧毁地堡任务，当他将爆破筒塞入地堡时，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下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人们称赞他是活着的黄继光。战后，国防部授予陈代富“战斗英雄”称号。16日17时许，中国边防部队进占瓦弄。另一部向东村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进占敌能。我部进驻瓦弄后，主力转入搜剿，一部乘胜向南追击。到21日，我军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就地转入搜剿。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里米金、梅楚卡、都登地区反击战。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边防部队以约1个营的兵力，于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林芝边防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于1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我军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班公洛地区反击战。班公洛（今斯潘古尔）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脊梁上，可以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队的哨卡，威胁阿里纵深之安全。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新疆边防部队作出部署：迂回入侵印军侧后，摧毁其据点，清除侵入班公洛地区之印军。我军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大坂，按时进抵反击出发阵地。18日上午，以连为单位分别向3个据点发起冲击。攻打第一个据点的部队，一鼓作气战斗30分钟即摧毁了敌工事和地堡21个，攻克了据点；攻打第二个据点的部队，冒着印度猛烈的机枪射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激战1小时，攻克了25个地堡，拔除了据点。攻打第三个据点的部队，以果敢迅猛的动作，扫荡印军连部，摧毁了据点，拔除据点后，我军在转向印军炮兵阵地的攻击中，工兵战士罗光燮在排长排雷负伤的情况下，奋勇冲入雷区排雷。在排雷中，他的左腿、右臂相继被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眼看雷还未排完，部队无法前进，他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最后壮烈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我军清除了印军廓尔喀第十一联队第一营第三连的大部兵力。与此同时，反击部队以炮火压制破坏了入侵印军另3个据点，其守敌于19日逃窜，我军于20日占领该3个据点。至此，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段入侵印军据点全部清除。

为了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促成我国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主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12月1日开始，我军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月，我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9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飞机5架，坦克10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反击作战中，我军共伤亡2400余人，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和平谈判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中印边界这场战争，中国方面完全是被迫的。中印两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1979年2月邓小平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要双方以诚相见，按照上述原则，是能够圆满解决的。希望中印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邓礼峰）

“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在北京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

——熄灭印支战火的卓越历史

1950年1月，胡志明从越北丛林进入中国，随后又赶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和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会谈。斯大林秘密接待了胡志明，却没有答应胡志明提出的公开发消息和签订苏越条约的要求，表示援越一事由中国负责。随后，胡志明随毛泽东回到北京，商定了派遣军事顾问和援越的事宜。

毛泽东对援越军事顾问团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在北京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

50年代初期，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进行的抗法战争，史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这场战争斗争包含着反侵略斗争、民族独立运动、国内人民革命等复杂的内容。中共中央确定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以后，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了这场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获得了许多对外工作的宝贵经验，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准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确立援越抗法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法国政府顽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在英国支持和美国同意下，自1945年9月起派兵在越南登陆，随后又进兵老挝、柬埔寨，迫使老挝、柬埔寨王国政府承认回到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内，只享有“自治权”。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法国当局周旋一年后，当法军于1946年末大举进攻河内时撤往越北山区，进行长期抗战。越一部分武装人员又进入老挝、柬埔寨，会同老、柬两国的反法武装开辟了“西部战线”。这样，印度支那三国形成了互相联系同时内部又有区别的一个大战场。

印度支那战争初期，抗法武装处境十分艰难，正如胡志明所形容的：“当时我们只能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当时，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从国际主义原则和自身胜利的经验出发，公开宣布支持他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1949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刘少奇致开幕词说：“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做得正确的。”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现实任务，迫切要求国家周边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并开展对外贸易。从这点出发，中共中央又希望同西方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当时，法国政府曾试探着表示愿意和新中国建交，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向中共中央提出外交承认的要求。经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决定，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政府将这一天定为“外交胜利日”。对于中越建交会影响中法建交，中共中央事先已经估计到。刘少奇在北京接见印支共中央委员黄文欢时，就表示说：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1950年1月，胡志明从越北丛林进入中国，随后又赶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斯大林秘密接待了胡志明，未答应胡志明提出的公开发消息和签订苏越条约的要求，表示援助越南由中国负责。2月间，胡志明随同毛泽东到北京，商定了派遣军事顾问和援助事宜。在抗法战争中，中国成为唯一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中共中央不惜影响本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本国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行援越抗法，体现了为支持别国民族解放斗争而不惜做出民族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还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方针，并从中越国家关系出发，援越工作开始时就注意尊重越南主权。1950年4月，印支共请求人民解放军派干部赴越，一部分担任顾问，一部分直接担任主力部队的指挥员。中共中央同意派顾问，表示：“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从当年4月起，中共中央军委从全军选调281名干部组成援越顾问团。6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接见了顾问团主要干部，对援越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都作了详细阐述。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在北京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毛泽东还强调，要搞好与越南领导人的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团结，宁可别做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阐述了援越的国际意义和对我国安全的关系，指出：你们此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

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朱德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的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实行援越抗法，从维护我国自身安全和民族利益来看也有一定必要。自中法战争后，法国殖民军在中越边境上始

终对中国边防构成威胁，美国自中国革命胜利后又开始着手在中国南部建立反共阵地。据 70 年代初的美国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报告称，1949 年 12 月 30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亚洲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应该特别注意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从此美国开始直接向侵越法军和保大伪政权提供援助。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将印度支那和朝鲜、台湾并列为反对新中国的三个战略方向。当时越南人民的反法斗争牵制了法国和美国的部分力量，对中国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也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

中共中央在大力援越的同时，还严格规定了不出境作战的原则。1949 年末，广西战役结束时约有 2 万余名国民党军逃到越南境内，得到法军的庇护，并经常回窜到广西境内袭扰。

周恩来曾代表中国政府在 1949 年 11 月 29 日对法国政府及与中国国境毗连的各国政府郑重声明：“不管战败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逃到什么地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保留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但是在 1950 年内，中央军委、毛泽东向中南军区提出反回窜作战的部署时，都一再强调注意不要越过边境。以后，当越南人民军提出希望中国派部队出境直接配合作战时，中共中央又强调：我不能出兵深入越境配合作战，这是早已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抗法战争中，中央军委曾派出部队在边境中国一侧声援越方，但始终恪守不出境的原则。

中国开始援越抗法后，印度支那战争的形势很快发生变化。自 1950 年 4 月起，中国开始向越南卫国军（翌年改名为人民军）输送装备和物资，允许其主力部队开入中国境内换装，并帮助其训练。同年 7 月和 8 月，陈赓和韦国清带领顾问团多数人员到达越北。在中国大力协助下，越军于 9 月中旬到 10 月下旬发起了首次大规模运动战——边界战役，粉碎了法军在中越边界上的防御体系，从而使越北根据地和广西连成一片，从此扭转了战争的形势。

1951 年春夏季，越南人民军主力南下越北平原、连续同法军主力进行了 3 次战役，但未能打开局面。1951 年秋至 1952 年春，根据印度支那战场上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改观的实际情况，中国顾问团着重帮助越南人民军扩大主力部队并加强部队整训，并在越南党内军内开展了阶级教育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使越军建立起 6 个步兵师和 1 个工炮师的主力部队，为下一段进行大的战役奠定了重要基础。本着尽量使越南方面自力更生的思想，在越军整训有了较大进步后，中国顾问团就逐步将人员由 300 余人减少到 100 余人。1953 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顾问工作的指示》，批评了顾问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喧宾夺主的错误作法，强调顾问应幕后帮助，不宜出台唱戏，更不应出台扮主角。这一指示同时还规定了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一些重要准则。

为进一步打开战局，1952 年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越党中央提出了“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的意见。从避实击虚和解放老挝的目的出发，同年 9 月胡志明秘密访华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先取西北和上寮，逐步向南推进的意见，得到胡志明的同意。随后，越南人民军改变战略方向、进行了西北战役，接着又和老挝抗法武装进行了上寮战役，为老挝抗战政府建立起一片基本根据地。随着印度支那抗法战争的发展，柬埔寨国内上层的民

族独立要求山高涨起来。

印度支那战争的发展，使战场上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矛盾交织。当时中国方面进行的援越抗法斗争，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不直接出兵的方式支援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通过工作实践，中共中央大大增加了国际斗争的经验，在如何解决支援民族解放和处理他国国内革命的问题上，主观认识也日益和客观现实相统一。这样，就为以后顺利解决印度支那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政治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希望国家能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阶段。然而美国政府出于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又积极筹划直接出兵印度支那，对中国南部实施战争威胁。法军从1953年夏季起开始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实施由南向北推进、旨在两年战胜越盟的“纳尔瓦计划”。为了粉碎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上谋求取胜的最后尝试——“纳尔瓦计划”，中国自朝鲜停战后加强了对越盟的

援助，越南人民军从1953年冬至1954年春展开了冬春攻势，并于1954年3月向其已包围了3个月之久的法军奠边府据点发起进攻。这时，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双方综合力量对比已处于均势。根据朝鲜停战的先例及印支战场上的僵局，中苏越3国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出路。1953年11月26日，胡志明提出愿意同法国讨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建议。

1954年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柏林会议上又建议召开包括美、英、法、苏、中5大国会议，以谋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两国都同意苏联的建议。英国内阁为此还要求外相说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法国国防部长对美国记者公开发表谈话，声称，“印度支那问题只能由共产党中国来解决”。

美国虽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态度，但因在盟国中的孤立处境，不便公开反对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这就使战争出现了通过国际会议和平解决的可能。

但是，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后仍在准备扩大印度支那战争。

根据当时印度支那的形势，是把战争继续下去而不惜同美国作战、还是通过和平谈判给法国以面子使其撤退以结束战争，这两种选择已经摆在面前。中共中央军委反复研究了继续进行印度支那战争的前景，认为：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是愿意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而且如果法国不停战不撤军，美国势必又插进来，把战火直接烧到中国南部边境（因当时法军还占据着邻近中国边境的越北要地），就会出现类似1950年秋朝鲜战场的情况，我国不得不再以“志愿军”名义出兵援越；而出兵到越南作战比到朝鲜作战要困难得多，从中国工业基地东北到中越边境有几千公里，只有一条铁路干线，印度支那半岛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不利于大兵团作战，中国军队数量上的优势难以很好发挥。对美作战还会大大影响国内已经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另外美军直接介入战争，也会大大增加越盟和老、柬的抗战力量的困难。考虑到种种因素，中共中央主张争取在美国尚未插手前，就在日内瓦会议上和平解决问题。在决定派遣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的同时，中共中央规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促进国际紧张的缓和；并争取会议达成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1954年4月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同苏联、朝鲜、越南领导人举行了日内瓦会议前的预备会，研究了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方针、策略。经中苏越三方研究决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联法抗美”的策略，以争取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根据这时战场上双方占领区犬牙交错、敌方又占中心区和交通线、就地停战则越盟力量被分割而难以长期生存的实际情况下，周恩来提出，比较有利而且可行的方案是争取以16度线为界实行停战，线北法军撤出，线南人民军撤出。对此，中

苏越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¹²⁾，三国还商定了在会议中如何互相配合、协调行动等具体事项。

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这是以现实主义精神处理国际争端的重要决策。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的外交工作实践，使中共中央对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了解大大增加、尤其是对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有了清楚的认识。以和平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从中国来说，照顾到了履行国际义务和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两个方面，反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及政策经历了抗美援朝和抗法斗争，已经日益趋向成熟。

日内瓦会议上的胜利以及“不输出革命”原则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召开。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了灵活的斗争。

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法国政府的主战派和保大伪政府仍然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没有固定领土的“幽灵”。能否攻克已为全世界瞩目的奠边府，成为显示力量并压法方让步的关键。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以战促和的经验，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在攻坚战术、火力支援、作战指挥和物资供应上尽可能向越南人民军提供援助，以攻克奠边府。5月7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支援下攻克奠边府，全歼守军1万多人。这一仗规模虽不很大，政治影响却很强烈，法国国内反战情绪更高，政局也出现混乱，主和派势力占了上风。

从5月8日起，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然而在前3周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除了法国政府尚不想停火和美国破坏外，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对停火问题也一度出现不同意见。越盟代表团团长、越南副总理范文同，未和后方协调，曾表示越南问题应以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为主。周恩来认为，若就地停战，那么尚在敌人手中的红河三角洲及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便无调整的可能，而且对西方同意通过普选统一越南也下应抱过高希望，即使将来形势好转能实现普选，也应首先站稳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不然南越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被敌人挤掉了，北越和中越的根据地又未能在交换中得到加强，对越盟是不利的⁽¹³⁾。最后，中苏越三方照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停火和区域调整的意见，法国表示接受，会议开始有了进展。

自5月底至6月中旬，日内瓦会议又在老挝、柬埔寨这一关键问题上陷入僵局。法国虽然已同意从老、柬撤军，却要求越盟也从这两国撤军。越方这时仍不承认越盟有军队在老挝、柬埔寨，对此西方国家不可能让步。美国利用这一形势与法国实际上已就干涉条件达成协议，打算援助3个师兵力。在这种形势下，不承认有越盟军队在老、柬，不解决这两国的政治问题，会谈势必破裂，这不仅在政治上会犯将国内革命和民族革命放在一起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在军事上也势必把美国、法国和越南保大伪政权、老挝王国政府、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到一起，造成很不利的局面。

在6月15日会议接近破裂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在3方代表团商量对策时建议承认有越盟“志愿军”在老、柬作战，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原先就赞成这一办法，范文同经反复考虑后也表示同意。6月16日和17日，周恩来分别会见了艾登和法国外长皮埃尔，提出在老、柬撤出包括越盟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人的建议，6月18日，范文同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英、法代表团立即表示愿意商讨，原先对中苏越三方持激烈态度的老挝、柬埔寨王国代表团也积极赞同。6月19日，会议达成了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柬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美国虽然仍持反对态度，却已完全陷入孤立。

周恩来在日内瓦提出的解决方案，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完全赞同，胡志明也同意这一方案。6月下旬，周恩来利用会议休会，访问了印度、缅甸，又于7月3日至5日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武元甲等会谈。两党会谈达成一致意见后，越南劳动党中央以“七·五条件”的形式通告在日内瓦的范

文同，提出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具体方案。7月15日，胡志明在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采取调整驻军地区的办法以求达到和平，用全国普选的办法达到统一，这是我们的主张。”⁽¹⁴⁾7月12日，周恩来回到日内瓦，这时范文同还没有下从16度线以南撤军的决心，法国政府的主战派和美国又在积极活动，法国由主和派刚组织起的新政府已有倒台的危险。周恩来回到日内瓦的当天就和范文同彻夜交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并结合中国“皖南事变”和日本投降后及时撤出江南根据地以争取东北的经验，说明进退的辩证关系。周恩来还向法国总理说明，让步是双方的。经过双方讨论，会议最后达成协议，法军撤出印度支那三国；越盟军队从老挝、柬埔寨撤出；原老挝抗战武装以桑怒、丰沙里两省为集结区；柬埔寨抗战武装就地复员，柬王国政府保证他们享有同于全国公民的权利；印度支那成为和平区。对于日内瓦会议达成这样的结果，美国极为不满并拒绝签字，但是由于英国、法国和老挝、柬埔寨两个王国政府都赞同这种解决方式，美国政府被迫声明“美国将不使用武力来干扰这一决定”。1954年8月8日和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两次会议得出结论，日内瓦协议对美国是一场“灾难”。⁽¹⁵⁾

日内瓦会议取得了这样的成果，说明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是十分正确的。日内瓦协定于7月21日签订后，7月22日，胡志明发表号召书宣布：“日内瓦会议已经胜利结束了。我们在外交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¹⁶⁾

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的活动还体现了尊重各国独立、主权、不输出革命的原则，从而全面奠定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当时中国的对外宣传中，已经改变了建国初期公开支持他国国内革命一类属于世界革命范畴的提法，而强调了尊重他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对中国周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表示长期友好的愿望。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缅甸，他在同缅甸总理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¹⁷⁾日内瓦会议处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正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对于日内瓦会议取得的成就，1954年7月上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印度支那停战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中国的外交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输出革命的基础上，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也为50年代中国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日内瓦协议达成后几十年后，印度支那地区的风云变幻，验证

了当年中共中央处理印度支那战争的方针的正确。

注 释

黄文欢《沧海一粟》第256页，第2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战斗争纪实》第5—6页，第58页，第140页，第56页，第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¹⁵⁾《关于越南战争的五角大楼秘密报告》，《纽约时报》1971年7月4日，7月5日。

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第 373 页。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11)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 5—6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

(12) (13)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实践》第 255 页,第 263—264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14) 《胡志明选集》第 2 卷第 336 页,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2 年中文版。

(16) 《胡志明选集》第 3 卷第 1—2 页,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3 年中文版。

(17) 《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30 日。

一篇文章挑起了一场大动乱——从《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到《二月提纲》

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但没有点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张春桥学毛泽东“引蛇出洞”，声称要“‘放’，一万年也要放，不收”。张春桥编发《文汇情况》和《记者简报》，这两份刊物成为 1965 年底到 1966 年上半年毛泽东了解知识界情况的重要渠道。彭真下令，不转载姚文。毛泽东要上海将姚文印成小册子，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在“五·一六通知”中，他们把“放”定罪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张春桥派杨永直赴京摸底，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他们游过泳没有？

江青：上海的神秘之行

1965年2月，江青又一次来到上海。只是在十多年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江青此行，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从1962年起，长期称病赋闲在家的江青不甘寂寞，开始出面“过问”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她一出马就不同凡响，一口咬定舞台、银幕上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但她很快就感到，要实现她的“抱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阻力很大”。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上海。1965年2月江青的上海之行，目的有二：一是与张春桥一起插手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改为《智取威虎山》）。江青的目的，是通过这出京剧来吹捧当时在东北工作的林彪，以便同林彪勾结起来，借这座“尊神”攫取更大的权力。江青的上海之行的另一个目的，是物色撰写批判《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剧）的入选。江青1962年就提出要批判《海》剧，但一直遭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冷落。她又私下先后在北京找了一两位同志去写，但也被婉言拒绝。在上海，她通过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合适的人选很快物色到了，此人便是姚文元。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是搞文艺评论的，而且在文艺界一直以“左”的面目出现，早有“棍子”的绰号。加上不久之前对周谷城先生疾言厉色的批判，他更是与众不同。姚文元受领任务之后，从3月初起，开始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着手写作。但他对历史、特别是明史完全是门外汉，只好找人来提供明史和海瑞的有关资料。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张春桥找了几个心腹参加讨论。当有人提出文章第四部分将《海》剧中“退田”等问题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说法是不是太过分了时，张、姚都莫测高深地不置一辞。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人们莫名其妙地或漫不经心地看着徐徐拉开的帷幕，谁也不曾料到，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剧”，竟是一场把偌大中国搅得沸沸扬扬，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而使神州大地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创伤的政治动乱。

1966年4月，在起草批判《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时，康生、陈伯达授意王力等起草了一个《文化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在《大事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指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作者注），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这段话给人这么一个印象，似乎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中央9月工作会议之后，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指示而写的。这样，写作的时间从3月改为9月，写作的直接原因由江青的发难变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事实是，江青在1963年就已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批判《海》剧；而毛泽东同志在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吴晗问题时，姚文元的文章已经修改过了若干次。《大事记》中这段用心良苦的文字，按照阴谋家的需要，巧妙地篡改了历史。而这也正是《大事记》一以贯之的鲜明的特点。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与陈伯达等谈话，内容主要是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改革问题。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也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但没有点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大事记》中就些写道：“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又是谎言。自江青提出批判《海》剧问题以后，毛泽东同志当时

虽然同意批判，但却未见到他说什么要害问题，“要害”的发明权属于康主。但是，在 1964 年康生提出这个问题后，毛泽东同志要么是没有接受，要么是未予重视，所以直到 1965 年 9 月，他审阅姚文时，并未因文中未提要害而表示异议。无疑，这反映了他当时的认识。只是在姚文发表 40 多天后，毛泽东同志才明确指出，《海》剧要害不是“退田”，而是“罢官”。可见，与其说毛泽东同志“一向认为”，还不如说在姚文发表后一个多月，他的认识又有所发展更为合适。

“要害”从“退田”变为“罢官”，仅仅两字之差，却使得《海》剧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大大增加了。一出普通的戏剧，因此而和 1959 年发生在党内的那件大冤案联系起来，和 60 年代以后围绕着“大跃进”及调整工作所产生的深刻分歧联系起来。

“要害”升级之后，谁要是再像过去那样对批判《海》剧采取抵制或消极的态度，谁就会被看成新的、更大的“要害”。

张春桥“引蛇出洞”

姚文发表之后，江青、张春桥对上海和北京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在上海，江青、张春桥的计划，用他们自己的后来说，叫做“引蛇出洞”、“围城打援”、“围而不歼”，然后“聚而歼之”，如此等等。其目的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知识分子中，展开一场空前的“横扫”、“围歼”。

姚文发表之后最初 20 多天里，虽然除北京、湖南外，全国各报刊立即纷纷转载，声势不可谓不大，但是大煞风景的却是应者寥寥。文艺学术界一则不知其底蕴，二则畏其来势汹汹，大都以沉默的态度对待它。其他部门和领域里的人们，对几年来文艺学术界中声色俱厉、上纲上线的过火批判早已习以为常，对此也未予重视。结果，在这 20 多天里，《文汇报》仅收到三篇有关《海》剧的稿件，其中一篇还是对姚艾的尖锐反驳。

这样冷冷清清的场面使江青、张春桥大为不满。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人们消除顾虑，参加“讨论”，打开局面，“引蛇出洞”。为些，从 11 月上旬到 12 月上旬，根据张春桥的指令，《文汇报》开辟了讨论《海》剧的专版。专版上除了一些批判《海》剧的文章外，还重新发表了《海》剧的剧本及吴晗的一些旧作。张春桥亲自为这些版面写了两个“编者按”，并下令都要连续登载 6 天。两个“编者按”中，大谈贯彻“双百方针”，提出要“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使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等等。

张春桥唯恐人们不说话，12 月 10 日，他又要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出面召开一个关于《海》剧的座谈会。会前，张春桥对宣传部长说，我们现在要“放”。如果别人不敢提相反意见，你可以先表个态，就说姚文元文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可能是小部分正确，大部分不正确……你带头一讲，人家就敢讲了。

张春桥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说：“《海瑞罢官》提出来的，不只是一出戏的问题，而是一系列原则问题，涉及到海瑞、清官、道德继承、历史主义、让步政策、历史剧、历史人物，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是我们同……历史界、戏剧界、哲学界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之间的分歧，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有步骤地搞，首先是要给这出戏是不是毒草定案。然后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搞。”“方法是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大辩论……”“《文汇报》如能在一年中解决了这几个问题，中国思想史上就要写上一笔……”

然而，张春桥放出的空气、撒出的诱饵，仍然收效甚微。“蛇”未出洞，“鱼”未上钩。几年来文艺界、知识界的风风雨雨，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文艺学术界的学者专家知其来意不善，采取了虚与应付的态度，很少有人认真对待。《文汇报》等报纸上除了张、姚写作班子御用文人的几篇以势压人、标语口号式的文章外，还有一些史学爱好者激于义愤写的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对这些“小鱼”兴趣不大，为了“钓大鱼”，他把“百家争鸣”和“放”的调子唱得更高，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说：“‘放’，一万年也要放，不收。”12 月中旬，在一个理论工作会上，张春桥竟号召与会教授、专家“挺身而出”、“勇于当反面教员”、主动给青年当批判的靶子。与会专家相顾愕然，瞠目不知所云。阴谋家“钓鱼”心切，连垂钓放饵静候的功夫都等不及了。

张春桥眼看“钓鱼”不行，又进行狡诈的欺骗。12月31日，他指令《文汇报》出面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海》剧，会前宣布是内部讨论，不登报，不发表，畅所欲言。会上，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纷纷发言，不同意姚文元强词夺理地上纲。会议结束时，主持人突然宣布要把讨论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学都们大哗，惊呼“上当”。当张春桥看到记录时，阴险地笑道：“蛇出洞了。”

张春桥等一方面不厌其烦、声嘶力竭地大唱其“放”的高调，侈谈“百家争鸣”，一方面密切注视着文艺学术界、知识界的各种反映，搜集迫害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把极左思潮进一步升级的各种材料。张、姚等下令《文汇报》记者在京、沪两地通过走访、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知识分子的反映。收集来的情况，立即被刊登在《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张春桥下令缩小这个刊物的发行范围，控制发行数量，连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都不在分发之列。根据他的要求，《文汇报》另辟了一个保密的排字、印刷车间，人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1965年12月中旬，周总理以及杨永直先后在偶然的时机看到了载有关于《海》剧讨论的《文汇情况》，张春桥十分惊慌，立即下令自12月23日起，《文汇情况》不再保密，不再登载讨论情况，改出不编号的《记者简报》，专门反映讨论情况，刊头上印有“绝密。只供负责同志参考”字样，每本限印12份，由张亲自分发。这份材料主要送给江青，并由她转送毛泽东同志。《文汇情况》和《记者简报》以夸大事实、歪曲真相、造谣诬蔑、制造矛盾、揭露隐私等手法，反映了京沪两地文艺学术界对姚文的不满，对学术批判的抵制情绪和惶惶不安的心情。这两份刊物成为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了解、判断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和依据。“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曾经很得意他说，当时毛主席非常爱看这份材料，每天都要。

从姚文发表到《二月提纲》发出这段时间里到张春桥在上海的一系列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当时他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文艺学术领域；第二，就其内容来看，则表现为自1962年以来在文艺学术领域里的“左”倾思潮的再一次膨胀、升级。

在上海是如此。对北京方面，江青、张春桥鞭长莫及，其做法也有所不同。在论争开始时，他们还曾希望多少能得到北京方面的一些支持，使北京也能像上海一样，掀起一场“围剿”、迫害知识分子的黑风浊浪。1966年5月，张春桥曾说，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5月，张春桥还多次谈到：“真正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在文章发表以后。我们估计到会有震动，但是震动如此之大，是原来没有估计到的。”“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震动这么大，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地反对。”“我们当时对批吴晗的意义是理解得太肤浅了。”

出于这样一种心理，在姚文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除了对北京“天天看，天天盼”以外，还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封锁保密。姚文是在背着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背着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写成的。文章发表以后，当北京市委、《人民日报》等向《文汇报》等询问文章背景，以确定是否转载时，张春桥严令上海有关方面托词不答，使对方不知底细而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从而为他们的诬陷制造口实。二是打听。姚文发表后，张、姚立即要求《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派出全部记者，到北京各学

术部门、各报刊、大学以及主管宣传、学术的领导部门，走访专家、学者、教师、学生、领导干部，了解他们对姚文的反映和对学术批判的态度。采访到的情况，立即刊登在《文汇报》及后来的《记者简报》上。三是发现、拉拢“左派”。1966年1月下旬，通过张春桥安排，江青在上海秘密接见了专程来沪领会精神的关锋，亲自向他交底：“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姚文元文章，北京不转载，不发行，是黑线专政的一例。”江青还格外关心他说：“你在翟里搞四清，得罪了北京市委，我们很为你担心。”关锋受宠若惊，立即回京向康生等汇报。此后，他多次对人宣扬：要在这场斗争中“起点作用”，“做点贡献”。在此前后，戚本禹、吴传启等都曾去沪取经。不久之后，这些“左派”都成为“文化革命”发动时期的骨干力量。

张春桥等很快就看出，像以往一样，北京方面这次仍然对他们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而且，很自然地，他们以为这是彭真同志从中作梗。随着斗争的发展，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在他们头脑中，一个关键的思想更加明确了：要想把这场以批判《海》剧为开端的运动进行到底，必须首先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中宣部以及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我们之所以往上文那样不厌其烦地记叙江青、张春桥等在这段时间里的言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说明在姚文发表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还没有那样明确的“把矛头直指北京市委”。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这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不仅需要，而且已有可能将矛头直指一切敢于一切抵制这场斗争的任何部门和个人。

彭真下令：不转载姚文

姚文发表之后，中宣部、北京市委等都因事出意外，感到十分震惊。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民盟负责人之一，又是中共党员，《文汇报》点名批判这样一位知名学者，为什么事先一点风也不向中宣部、北京市委透露？周扬同志在1965年上半年传达五人小组指示的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指出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为什么姚文一下就给吴晗、《海》剧戴上那样大的政治帽子？这样的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在经过几次起伏以后，自1965年初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又有所缓和，怎么突然之间又出来一篇姚文元文章？

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等同志开会研究“转载”问题。当时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但结果却因为江青、张春桥下令《文汇报》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而一无所获。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也打电话向上海方面询问，但也吃了闭门羹。邓拓同志等决定立即请示正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指示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再定。

本来，姚文未经任何中央主管部门，就点了一位知名学者、一位北京市负责人的名，而且把问题说得耸人听闻，是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的。而且，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北京和其他各地报纸本来也没有一定要转载的义务。但是，那些有来头的发难者却为此大动肝火，他们立即添枝加叶地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同志。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根据江青的报告，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印成小册子，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这样，在姚文发表10天之内，围绕着“转载”问题，经过江青等的挑拨，毛泽东同志对中宣部等的不满迅速加深。

11月下旬，彭真同志返京后，立即着手处理“转载”问题。他在听取了《红旗》某负责同志汇报后，指示说：“关于发表批判吴晗文章的问题，中央报刊还要考虑一下再说。《红旗》更不要着急，《红旗》现在不要发表文章，也不必转载。”他还指示北京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转载”问题，并指示说，呈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几经讨论之后，市委书记处的主要意见有两条：一是不同意姚文第四部分（即《海瑞罢官 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从政治上批判吴晗），认为吴晗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表现都是好的；二是如果必须转载姚文，转载时要加上编者按，表明自己的态度。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根据许立群、姚溱同志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中央一级报纸又停了几天才先后转载。根据彭真同志指示写成的《北京日报》编者按中指出：“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等等。根据周恩来、彭真同志意见写成并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判。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同时，《人民日报》有意把姚文放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中，这种安排本身就是对“政治要害说”的否定。此后，《北京日报》等陆续发表了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当然，不是按照姚

文的调子。

“转载”的风波过去了，但是从这时起，在批判《海》剧的运动中，实际上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一个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中宣部；一个以上海为据点，以江、张为核心的阴谋集团。从形式上看，前者应该是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但是他们不可能获得运动的真正领导权，他们当时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运动的真正领导权是在后者手中。虽然他们没有任何中央规定授予的领导运动的职权，但他们却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用一特殊的方法来左右舆论、领导运动。显然，这两个中心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姚文发表后，在批判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中，各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纷纷报到中宣部，要求指示、解决。像北京市委一样，中宣部虽然不能超脱“左”的窠臼，但与江青等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为了指导运动，中宣部领导同志及专门负责学术批判工作的有关同志，根据自己所能听到的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以及上海方面的动向，根据彭真同志的要求及自己对运动的理解，除了召集各种会议进行布置外，还组织了一些有份量的文章，用以指导斗争。例如，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 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该报首次发表的表态性文章，这篇文章是周扬同志组织中宣部等几个单位的同志写成的。文章根据彭真同志的要求，把《海》剧作为一种思潮——而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批判。作为一种思潮，文章把《海》剧高高举起，进行批判，显得很“左”，这使得许多读者感到对《海》剧的批判“又升级了”；但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文章却又把它轻轻放下，也就是不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使得深知其意的张春桥等怀恨在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方求并无意与姚文完全对立，而且是想把姚文荒谬、蛮横的批判说得更周全一些，但是，对于姚文这样充满谎言和杀机的文章，任何希望以认真态度对待它的企图，都只能是对它的某种否定。果然，《文汇报》上不久之后就出现了由姚文元授意写成的反驳方求的文章。

此外，中宣部还尽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限制各种极“左”行为，控制斗争的发展。1966年1月中旬，关锋、戚本禹等先后把自己攻《海》剧“政治要害”的文章交中宣部。中宣部的同志要求他们改写，但关锋等却态度强硬地拒不同意修改。中宣部只得将此事上报五人小组处理。在此期间，中宣部先后送了四篇文章的政治性提法的摘要上报请示。但因当时五人小组还没有专门办事机构，送去材料无法——立即答复。这就是后来《五·一六通知》和《大事记》中所说的“扣压左派稿件”。

出于对当时那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左派”的憎恶，1966年1月初，中宣部许立群同志等把关锋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找出，一并上送五人小组，目的是想用这篇在道德继承问题上与吴晗观点相似的文章提醒关锋等，当年他们也不是那么高明，现在整别人也不要太过分了。这就是后来《五·一六通知》、《大事记》中所说的“整左派材料”。

可见，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任何试图对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加以约束的努力都是有意无意地、直接间接地得罪了江青、张春桥这一伙“左派”。

彭真反击“左派”：制定《二月提纲》

下一步的学术批判工作如何进行？如何处理工作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为了研究、处理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1966年2月3日，彭真同志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上印发了中宣部报来的反映。请示各种重要情况和问题的7份材料。彭真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经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海》剧与庐山会议并无联系。他还否定了关锋等对邓拓的诬蔑（这就是《大事记》中所说“包庇右派”，强调学术批判不要过关，要慎重，等等）。会后，许立群、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经在京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后，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同志到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康生因其他事项，也同机前往。

《大事记》中说，在2月3日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一种以康生同志为代表”，等等。实际上，康生在会上并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大事记》中又说，起草提纲时对康生严密封锁消息，2月5日政治局常委讨论的稿是未经五人小组传阅、商酌的，等等。事实是，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之前，《提纲》的初稿和修改稿都交康生审阅过，但他从未提出任何不同意见。《大事记》中充满了谎言，使人驳不胜驳。

2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彭真同志等的汇报过程中，除了说“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外，并没有对《提纲》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他甚至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还表示，吴晗经批判以后，仍然可以当副市长，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对《提纲》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彭真同志当即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电传北京，经在京常委同意后将《提纲》发往全国。

正因为如此，汇报之后，彭真同志等都如释重负地感到很振奋很轻松，觉得几个月来的问题都解决了。

《大事记》中说，在2月8号的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等等。这当然又是捏造。诚然，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提纲》的意见，但在2月8日，在听取汇报时，不论他内心如何考虑，他都没有表示任何同《提纲》“完全对立”的意见。能够证明这点的不仅有参加汇报的其他领导同志，而且还有康生自己。从姚文发表直到1966年3月底毛泽东同志与康生、张春桥等谈后之前，康生这个1962年就借小说发难整人，1964年到《海》剧“要害”发明权的阴谋家，态度一直模棱两可。甚至在2月8日汇报时，当毛泽东同志谈到“要害”的“发明权”是康生的时候，康生还连连否认。这倒不是康生同意彭真等同志的看法，而是当时他还没有摸透毛泽东同志对中宣部、北京市委、彭真同志以及对《提纲》的态度，这个长于察颜观色。善于投机钻营的阴谋家还不敢贸然下赌注。直到3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已最后下定决心后，康生才一反模棱态度，声色俱厉地大批《提纲》，不厌其烦地吹嘘自己的发明权。康生态度的微妙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同志认识的发展变化。

《二月提纲》总结了在彭真等同志具体领导下，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领导前一段学术批判工作的经验，规定了今后进行批判的方针、政策。毋庸讳言，《提纲》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带有不少“左”的色彩。

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江青、张春桥的要害，有力地遏制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要求。

贯穿于《提纲》始终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这也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一个极力把学术问题说成是可怕的政治问题，一个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学术问题无限上纲。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编者按到向阳生、方求的文章，直到1966年1月五人小组、中宣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以及在此期间彭真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其主旨都在于要划分两类矛盾，反对把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提纲》集中地概括和反映了这一思想，从而规定了学术批判的性质。《提纲》虽然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去反驳“要害说”，但它却通篇只字不提“要害”二字，这无疑是对“要害说”的一种间接否定。此外它还通过一些特定的语言，诸如：“意识形态领域内一场大斗争”、“彻底清理学术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语言，肯定了吴晗是世界观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使批判偏离了江青等所设计的轨道。《提纲》的这一中心思想，再一次给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以有力的限制。因此，它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

围绕着对当时斗争的性质、《海》剧要害的认识，又产生了一个如何进行斗争的方针问题。《提纲》在“方针”一节中规定，采取“放”的方针。自1965年11月底，彭真同志作为五人小组负责人一直强调“放”的方针。中宣部、北京市委等也多次重申这个方针。而在《提纲》发出之前，张春桥在上海的多次讲话中，也不止一次他讲到要“放”。表面上看来，双方都主张“放”，但实际上，由于对吴晗、对《海》剧、对斗争的看法不同，双方“放”的目的也大相径庭。张春桥鼓吹“放”，意在“钓鱼”，以便利用《海》剧这个政治钓饵，迫害打击更多的知识分子；彭真同志等提出“放”的方针，是针对江青、张春桥等抓“要害”和无限上纲的鼓噪而发的。在当时条件下，这一方针表现出了某种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这表现在：第一，把“放”作为开展学术讨论的方针，本身就肯定了这场斗争只是一场学术讨论，否定了“要害说”。第二，根据“放”的方针，《提纲》要求学术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很明显，这一“放”的方针，回避了《海》剧的政治问题，分散了指向《海》剧和吴晗的火力，冲淡了批判的政治色彩。江青、张春桥等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放”的真谛和实际作用，在充满谎言的《大事记》中，有一句话却说对了，这就是：（《提纲》）“把‘放’同讲要害对立起来。”在《五·一六通知》中，他们把“放”定罪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此外，《提纲》还对斗争作了一系列重要规定。它要求“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强调“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领导机构批准。针对几个在斗争中破门而出的‘左派’的跋扈作风，《提纲》尖锐地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并提出“左派整风”的任务。这些至今读起来仍使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尖锐语言，像一柄柄利刃，刺到“左派”们的痛处，使他们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可见，尽管《提纲》的作者们当时还缺乏自觉地抵制极左思潮的认识，但《提纲》仍然提出了一个区别于江青等人的指导斗争的纲领。不难想象，

当时的斗争如果按照《提纲》的规定进行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在几个月之后爆发，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将不是对《海》剧的批判。

《提纲》发出后，摆在江青、张春桥面前的有3种选择：第一，如果斗争继续按照原有的内容、范围进行下去，他们就不可能将斗争进行到“底”；第二，如果接受、承认《提纲》的指导，那末这场由他们亲自发动起来的斗争就将被“扼杀”，不仅不能发展，就连姚文都有被否定之虞；第三，要使斗争不致半途而废和夭折，就必须使斗争升级，即把斗争升级为一场批判《提纲》及其作者的政治运动。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后一个办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具备了使斗争升级的主要条件。

2月中旬以后，在贯彻、执行《提纲》的过程中，围绕着《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深刻、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从对《海》剧的批判转移到《提纲》，与《海》剧相联系的政治问题从彭德怀发展到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斗争的对象从《海》剧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如果说：“在《提纲》之前，江青等还只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把一个剧本上升到可怕的政治高度，那末，在此之后，他们的注意力已不在《海》剧本身，而在于由它所“暴露”出来的在中央出现的所谓“修正主义”了。对《海》剧的批判，迅速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提纲》的发出，成为矛盾升级、转换的枢纽。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0页）。在这次斗争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过程，是发展。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矛盾各方面在此之前的基本倾向，而且应特别注意自姚文发表到《提纲》发出这段时间里，矛盾各方的发展、激化，而不可根据某种“想当然”去导演、调度前人前事。矛盾各方的基本倾向固然已包含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种种可能因素，但是，只是在矛盾进一步发展激化的条件下，“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才能成为现实。

张春桥派人到北京“摸底”

以《提纲》的发出为契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阶段。

在《提纲》的指导下，在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等有关方面同志领导下，全国甚至包括上海的学术批判形势又有所缓和。“左派”无限上纲的文章被主管部门“压”了，在政治上抓要害的文章少了，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批判的成分增加了，讨论、批判的范围扩大了，文艺学术界又稍稍松了一口气。

江青、张春桥很快就发现了《提纲》中的“异端”，以及贯彻《提纲》给他们带来的威胁。张春桥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到，《提纲》的发出，“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多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提纲》中更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容易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而“这一定与彭真有关”（张春桥语）。

但是，《提纲》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张春桥一时不知道底细、不便立即发作，而且不得不传达。为了缩小《提纲》的影响，张春桥指令上海只在小范围内传达、讨论。当时还未能跻身于江、张核心地位的姚文元，甚至已经着手根据《提纲》精神为《文汇报》起草“四个月来运动总结”，作结束斗争的准备了。当然，“左派”们不情愿吞下这颗苦果，不甘心斗争就这样夭折。特别是对《提纲》中所说“‘学阀’”，“以势压人”等话，更是耿耿于怀。为了彻底弄清五人小组、中宣部的意图，3月初，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赴京了解情况。正是这次“摸底”之行，使双方蓄之已久的矛盾终于直接爆发出来。

3月上旬杨永直同志到京后，许立群、胡绳同志先后与他谈话。谈话中，许立群重申了《提纲》的精神，杨永直则根据张春桥的要求，反复提出“学阀”是否有所指等问题。因为双方差距已经很明显，谈了几次也不得要领。3月11日晚，在杨永直即将返沪之前，许立群将谈话内容向彭真汇报，并请示如何答复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当夜，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电话告诉杨永直，杨永直立即赶回上海向市委汇报。张春桥听了汇报后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这个长于靠无限上纲陷人于罪的阴谋家，按照他独特的逻辑和推理，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提纲》与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两个月以后，张春桥更明白地说：“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多么霸道的推理，多么蛮横的逻辑！

但不论这种方法是多么荒唐、卑鄙，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却足以置人于死地。

“电话事件”使江青等人有了进一步向毛泽东同志进行挑拨的依据。从江青提出对《海》剧的批判，直到姚文元的写作，一直得到毛泽东同志程度不同的支持。姚文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又通过各种途径注视着斗争的发展和知识界的各种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他进一步加深了对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满和不信任，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批判《海》剧的同时，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内正在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反党”、“篡军”、“特务活动”进行揭发、批判。这些使人难以置信的重大事件，是1962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产物。反过来，它们的出现，特别是它们戏剧性地几乎同时地出现，又进一步坚定、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作为一个伟大的、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从未满足过已取得的胜利。在他的晚年，他一直在不懈地探索着如何使中国革命不断地、健康地向前发展。1964年，毛泽东同志在“九评”中提出了“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这里，他主要是鉴于苏联的教训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上的设想。1965年初，在“二十三条”中，他首次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主要是出于对四清运动的总结和指示，当时从表面上看侧重点在基层。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谈到地方可能出修正主义时，也谈到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在这两者中间，还没有十分明显的侧重点，而且这里讲的还只是一种“可能”。在此之后几个月中，一系列严重事件接踵而至，“可能”一下子变成了极为严峻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央出修正主义”中的“中央”也越来越明确、具体了。在他看来，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警惕”和“防止”赫鲁晓夫，而是要根据这些事实进一步发展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必须把这些理论立即付诸实践，动用一切手段，与这种修正主义斗争，并教育、锻炼广大群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围绕着《海》剧、《提纲》所展开的斗争具有了以往类似斗争所不能比拟的严重性质。

1966年2月8日，当彭真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提纲》时，他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当时是支持《提纲》的。康生曾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提纲》已由在京常委讨论通过，毛主席尊重多数意见，不便反对。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3月初。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通过另一途径，用另一份重要文件，实际上否定了《提纲》，表明了自己的意图。

毛泽东说：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1966年2月2日至20日，得到林彪“完全支持”的江青，在上海邀请军队4位政治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之后写出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这份文件，毛泽东同志没有像对《提纲》那样不置可否，从2月下旬到3月24日一个月内，他亲自修改了4次，作了一些重要补充。2月底，江青曾说：（对《纪要》）“主席很关心，亲自作了修改，老夫子（陈伯达）有个很好的意见报告了主席，主席同意，叫他来上海同我们谈一谈，帮助我们改好。”

《纪要》针对着《海》剧批判中的反对派，对文艺界的形势作了极为夸张。极为严重的估计，第一次公开提出了“黑线专政论”，并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个《提纲》，一个《纪要》，虽然都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但是很明显，只有《纪要》才真正反映了他的认识、意图和决心。而且，这两份内容迥异、并必将引出不同后果的重要文件的比较，也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鲜明的比较使他加深了对《提纲》及其起草者的不满，加深了对在京讨论通过这个《提纲》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不满；反之，也加深了对《纪要》起草者及其坚决支持者的信任和依赖。“文化大革命”中“左派”和“右派”、“旗手”和“对象”阵线的划分，此时已轮廓分明了。

这样，在“电话事件”之后，随着《纪要》的定稿，毛泽东同志的态度逐渐明朗了。1966年3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彻底的批判。他明确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实权”，“他们实际上是国民党，有些共产党员也反共，搞修正主义。”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与康生等人的3次谈话中明确表示，《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如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同志询问了“电话事件”的经过，而康生挑拨性的添油加醋的汇报更使他生气。谈话中，他已经比较系统地表达出那些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

——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

——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

——我们面临着文化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革命，反对修正主义。

毛泽东同志3次谈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煞有介事地给《提纲》罗列了3条罪状。这个红得发紫的“左派”，又在抢头功了。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要害”的文章。自此，报刊上批判的调子又提高了，态度更为激烈了。4月上旬，以邓拓同志为首的“三家村”开始被公开批判，此风一开，几乎每个省市都“揪”出了所谓的“三

家村”、“四家店”。与此同时。中宣部已经被撇在一边。斗争形势这样迅速的发展，使江青、张春桥这伙所谓“左派”们兴奋不已。“左”倾错误再次升级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左派”们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掀起更大的风浪，窃取更大权力。4月中旬，张春桥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在分析形势时，应该看到，以往的斗争“不过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长期斗争的序幕，不过是前哨战。”“当前的主要危险，则是过高估计斗争的成就。”“左派”们对《海》剧的批判已经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他们的眼睛已开始盯着更大的斗争对象。这些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哨兵”，开始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位的觊觎者。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先后在会上发言，批判彭真同志在学术批判斗争中和历史上的“错误”。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4月12日，在京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讨论、修改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通知》草稿。此后，从4月14日至4月底，毛泽东同志先后7次修改《通知》。上纲越来越高，措辞越来越尖锐，理论上越来越完备。

在4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4月下旬，彭真同志被停止工作。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公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至此，围绕着《海》剧和《提纲》而展开的这场曲折、复杂、激烈的斗争终于见分晓了。然而，这还只是开始。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同志与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一起，被作为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受到严厉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宣布发动时的第一批被打倒的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同志。

以对《提纲》的批判为标志，从1957年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经过一系列量变和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终于发生了一个全面的、质的飞跃，文化革命开始变为一场政治大革命——尽管它还被称作是“文化大革命”。

从对《海》剧的批判到《提纲》发出，再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为时虽短，内容却十分丰富。我们可以认为，1965年11月开始的对《海》剧的批判、表明经过几年的酝酿和积累，“左”倾错误已经难以遏制地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野心家、阴谋家集团。他们把党内一般的原有“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并随时准备通过这样或那样的事端发难。任何错误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特别是当它发展到某种极端的形态时。既然种种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得我们难以在“左”的错误萌芽阶段及其一般状态时就认识它，既然我们在“左”的错误已经造成一些严重后果时仍然缺乏纠正它的条件，那么，历史就按照其内在的深刻辩证法，给我们安排了另外一种途径：物极必反。它使这种错误一直表现到最极端的形态，从而为我们最终彻底认识并纠正错误创造条件。当一小撮野心家把党内原有的“左”的错误发展为极左思潮和行动时，不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党还缺乏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条件。但是《二月提纲》的出现及其厄运表明，当时党内除了原有的不同程度的纠“左”力量外，同时也出现了受到一般“左”的错误影响的同志与极左思潮的对立。

虽然这种对“左”的错误的批判，还仅仅是初步的、微弱的，还不可能充分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但这却是我们党最终认识、战胜“左”倾错误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张欣）

斯诺曾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了……”——“炮打司令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50年代末期，毛泽东说：“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张文伯先生在湖北时，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

埃德加·斯诺曾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1966年，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10个年头。春去夏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到处是一派热烈、紧张、兴奋、不安的气氛。人们在狂热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却也多少不等地带着一些迷惘和疑问，就连主持中央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明确表示：“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晓得，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但是，这一天成为后来历史大书特书的一笔并不是因为它是建军节，而是因为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开始举行了一次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央全会。

按照中央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可是，在1962年9月24日至27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4年以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序幕才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徐徐拉开。

“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東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曾如是说。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慢慢追溯吧。

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

1965年仲夏，华夏大地笼罩在一片躁热之中。就在中国人民战胜因“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灾难，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时，国内的政治氛围却变得似乎越来越严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逐步升级，党内高级领导层内出现的政治分歧日益扩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不断发展。在我们党过去长期的战斗岁月中，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一篇报告，一项决策就可以使全党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夺取胜利。毛泽东是那样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信赖，以至后来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曾形象地写道，生活在那些非凡的年代里的无限忠诚，而从不对他的任何指示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因为毛泽东在思考，而他个人的思考往往高于全党的其它同志。所以，当毛泽东后来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经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时，党内并没有过多的异议。在过去几年里，毛泽东据此发动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全党同志也是认认真真地去执行。

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些举措都是小打小闹，不足以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社会改革理想。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决心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的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进步只能靠“波浪式”推进逐步实现。为掀起这场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政治“大革命”，毛泽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毛泽东的这些举措，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动提供了机会。这些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

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之所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

50年代末期，毛泽东曾说：“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张文伯先生在湖北时，建议我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正是这种“不放心”的心态，加上他本人一向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敏感，以及1962年以后对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的估计，终于使林彪、江青这些窥伺时机的野心家得以利用，借《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推波助澜，点燃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内乱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著名的明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吴晗受毛泽东提倡海瑞和魏徵精神鼓励，应人邀约，陆续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和剧本。作为一个政治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吴晗在这些文章和剧本中特地加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示与在庐山会议上被诬为“假冒”海瑞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划清界限。《海瑞罢官》上演后反映很好，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部优秀剧本日后会给剧作者招来杀身之祸。

1965年11月10日，经过江青和张春桥的秘密策划，姚文元的《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文中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与“退田”有关，因而是影射“单干风”，翻案风”问题的。后来，老谋深算的党内野心家康生进一步“发现”了主题“罢官”与彭德怀撤职一事的关联。

毛泽东也对《海瑞罢官》定了性。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今日的海瑞——彭德怀招魂。

但是，中央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不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都不同意这种不讲道理，纯学阀腔调的文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准发姚文。凡是点名批判的消息和报道，要向北京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点党性来。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他十分关注着北京的动向。得知姚文在京受阻，非常不满。他下令上海出单行本，责令北京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北京各报随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学术专栏发表，加上经周恩来亲自审定的编者按，尽力把这场过火的斗争局限在学术范围。为了正确引导学术急鸣，彭真召集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经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报经毛泽东同意发向全国，试图限制当时过火的倾向。

1966年3月至4月，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这期间，在康生和江青等人的鼓噪下，毛泽东否定了刚刚经过政治局讨论的《二月提纲》，并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下支持“左派”。接着，林彪、江青合伙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阅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认为，应该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真问题，借以揭开“盖子”。会前，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讨论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为了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除通过《五·一六通知》外，还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撤职的决定。中央决定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期间，一些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大会上或小组会上批判了彭真等人，有的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对于批判彭、罗、陆、杨等重大问题，尽管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中，人们还是将信将疑地接受了既成事实。

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五·一八讲话”，大谈特谈政变，制造紧张恐怖气氛。

此后，中国的政治气氛强烈低压，令人难于正常喘息。

5月18日凌晨，邓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离开了人间；

5月23日，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秘书田家英自杀身亡。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为领导的这个小组名义上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毛泽东决心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埃德加·斯诺曾在1970年12月18日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了，1965年1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实际上，早在1962年到1965年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已经发生了意见分歧。首先是对“三面红旗”持何态度，其次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最后是关于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问题。随着分歧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逐渐加深，一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忧虑不断发展。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江青、康生等人将会议的信息迅速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展开对北京市委尖锐的攻击，许多重要负责干部受批判靠边站。被陈伯达率领工作组于5月底夺了权的《人民日报》，极力把左的影响推向全国。5月25日，一张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在北大校园赫然出现。6月2日，《人民日报》继前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发表了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批判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整个北京以至全国在6月上旬即开始极大的混乱，许多学校，机关，以至工厂的正常秩序眼看难以维持，纷纷要求上级派人加强领导。在此期间，毛泽东不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虽然对毛泽东的系列举动不甚理解，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待。觉得还是应该坚定地站在第一线，积极加以引导。他认为：“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因此，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总是想方设法加强党的领导，希望运动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他在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后，于6月初和邓小平一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中央各部派出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院校，并决定由团中央派工作组负责中学“文化大革命”，协助各单位党委把运动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八条”指示，提出运动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等，试图扭转越来越混乱的局面。

派工作组，这是当时的一般客观要求，也是我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对于这一措施，毛泽东开始也是同意的，如5月底由陈伯达率领到《人民日报》社夺权的工作组，6月初到北京大学工作组，即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同意派出的。甚至到7月初，毛泽东在刘少奇、邓小平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的请示报告上，还明确批示同意他们的办法，并指示“应当迅速”将他们主持起草的中央、国务院通知发下去。在这个通知中，就有分别不同情况派出工作队的意见。虽然在6月中旬，他在杭州会议上曾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一类的话，但是直到他回北京以前，一直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的意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的那次会议上，只有陈伯达对这个决定表示反对。他给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递了一个条子，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以后，他于24日、25日，连续发表了批评工作组的讲话。他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事实上，不仅工作组被指责犯了错误，几乎所有的党委后来也都受到同样的指责。当然有例外，当时陈伯达等极少数几个工作组就没有受到指责。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撤出全部工作组。工作组一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把“一切权力归文革”的口号一喊，于是各级领导纷纷靠边站，许多单位党委也名存实亡了。

当时全党所以赞成派工作组，一方面表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和斗争。当时许多老同志提出：我们国家1965年形势很好，1966年5月以前形势也不错，为什么突然要来一个所谓“大的政治变动”？刘少奇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的“不晓得”和周恩来后来接见部分院校红卫兵代表时所说的“真没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领导集体和毛泽东之间产生认识差距。所谓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所谓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来说主要是不赞成“乱”；对于毛泽东来说则是主张“不要怕乱”，通过“乱”来达到“治”；对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则是唯恐天下不乱，趁机浑水摸鱼。这就是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央领导层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分歧。

就是这样，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发展，中央高层领导中的“路线斗争”也日渐白热化。

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透露了他对于这场党内斗争的大思路。他说：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作者注：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不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

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出于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深深忧虑，联系到近几年，特别是5月以来中央第一线的种种令他不满的表现，他认定刘少奇就是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决心将其在政治上铲除，以防止身后中国有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斯大林的教训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太深刻了。

但是，即使凭毛泽东在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崇高威信，要想从政治上搞掉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深受全党信赖的党的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并非易事。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但是多数同志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同志很明显对《通知》中的观点有抵触情绪。毛泽东1967年5月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曾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意见的深刻分歧。毛泽东深切感到运动有阻力，他自己的一套举措不能畅通，“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被人为地压下去，这就促使这位有着巨大意志力和富于迎接挑战精神的巨人下定决心非作进一步的解决不可。毛泽东的这种性格特点在过去的岁月里曾使全党每每化险为夷，不断胜利，也曾导致党在1957年后犯了很多严重错误，而在现在，则是把全国人民引入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

为了使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至“夭折”，毛泽东决定采取更为有效的大动作，最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扫清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障碍。

“造反有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先声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决意通过召开党的全会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为了确保这次仓促召开的中央全会能够实现毛泽东预想的意图和效果，从7月27日开始，先举行了几天的预备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7月24日、25日的讲话，以期从思想上为大会统一认识。预备会议开得并不轻松，不出毛泽东意料，会议代表的意见并不像以往历次党的会议那样统一集中，中央领导层内对毛泽东规定的大会事项依然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的礼炮声中正式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到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包括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47人列席了会议。

除中央常委外，与会人员编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活动。会议原定议程是讨论和批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

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刘少奇、陈伯达先后讲话。邓小平说：“会议的开法刚才主席讲了，要开五天，今天算是第一天，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以后开三天小会；最后一天再议一下，通过文件。”邓小平还提到这次大会还要为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职务，增补陶铸和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补行党章规定的手续。刘少奇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工作组问题，他叙述了陈伯达提出意见，但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经过，然后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二是简要叙述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陈伯达则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陈的发言貌似公允，实际上是利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政治分歧搞政治投机。

就在大会开幕的当天，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成立于1966年5月29日。据发起者事后回忆，这个组织的成立纯属偶然。在国内一派炽热的政治气氛中，5月29日晚，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的废墟上举行集会，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在确定小组的名称时，有人建议叫“向日葵”，还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取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同一天，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3个字后面有100多人签了名，名列其首的是清华附中高年级学生卜大华。“红卫兵”的名字反映了这一时期青年学生的狂热而又纯洁的心态，尔后北京各中学纷纷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

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该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但这两张大字报遭到工作组的反对。

7月1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请那天到会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把这两张大字报转呈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了信。信中肯定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的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组织回了这封寓意深刻的信并在大会印发，显然有他战略上的考虑。鉴于预备会议上的种种“阻力”，毛泽东决意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推动运动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8月3日，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这封信，红卫兵们顿感热血涨腾，惊喜万分。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也由此扩展到全国各地。

8月2日和3日，举行大会发言。在发言中，有的同志就工作组问题勉强地作了自我批评；更多的同志在发言中谈了对工作组的认识，实际对撤工作组并为此大动干戈想不通。

8月4日，大会发生了异常的情况。

按照大会原定日程，8月4日下午召开大会，与会者到会后再改开小组会，全会定于8月5日通过《十六条》宣告结束。结果，8月4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感到震惊的讲话，全会日程也由此而延长。

毛泽东在会上严厉地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他表示，这次的问题，“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明确称赞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世界人民知道嘛。

毛泽东的讲话，使人感到震惊。他如此严厉地在党的会议上指责中央集体，并且这番话显然一反他过去提倡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和风格，使与会大多数代表感到惊骇之余，又有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兆。

但是，更使人惊骇的还在后面！

“炮打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骤然升温

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宣布撤销1966年6月20日中央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同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如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这个批注，也作为全会的文件发给与会者，连同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道被指定在各组传达和讨论。

8月4日至6日，小组会上没有重要的发言——没有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批评、评论，也没有对毛泽东讲话的热烈拥护。大家并不清楚究竟要发生什么，也不甚明了自己应该怎么办，但会场的气氛已变得非常紧张。一些人表示，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上震动很大，感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跟主席革命的问题，主席把话讲透了，我们应该想透。绝不要走到相反的方面去”。刘少奇、邓小平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刘少奇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他最后表态：“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但是，尽管如此，8月6日以前，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是在检查自己的所谓“问题”，并未把矛头指向刘少奇等同志。

尽管党的副主席已经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犯了错误”，但事情并没有完。

8月6日，毛泽东要秘书徐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到会。在此之前的8月4日，林彪曾连夜从大连打电话给中央，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来，大会的气氛又进一步骤然升温。

毛泽东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亲自写大字报批判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这是绝大多数与会者根本没有料到的。语气之严厉、观点之鲜明，更使大多数人惊得目瞪口呆。尽管事先已经听了毛泽东7月24日、25日及8月4日的讲话，又经过了几天来的讨论，在思想不通的情况下尽量上纲上线，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彭、罗、陆、杨”不是已经解决了吗，现在用这个字眼意欲何指呢？

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接过了大字报的解释权。阴谋家们一看时机成熟，便猖狂发挥大字报的火力，把斗争矛头迅速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的大字报刚一发出，中央文革小组的“大秀才”陈伯达就写了《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并作为大会文件下发。陈伯达写道：“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回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这位“左”派“大理论家”接着说：“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法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列宁也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由俄国发动，而由德国、法国、英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在历史是否可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实现呢？……难道这不像人们所说的国际的希望在中国吗？

老奸巨滑的康生说话并不多，但他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高深莫测，点中“要害”。他说：“在今年5月举行的政治扩大会议上，我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呢？我认为是超过了。”“有的常委不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久有感觉。”康生的阴险、无耻，奸诈，从这几句话也就可见一斑。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粉墨登场。张春桥一出马便不同凡响，他说：“他（指刘少奇）讲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我在1964年看了记录……完全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报告的口吻。”江青紧随其后，当有的同志发言说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时，她说：“我反对这种混淆是非的意见”，“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们注意这些用辞：‘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发人深醒’。主席一般不用这样的辞。”关锋在发言中对江青的话进一步发挥：“在我们党内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后一个司令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司令部，修正主义的司令部。现在要打的就是这个司令部，必须把这个司令部打垮。”姚文元也在他《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中模仿江青的口吻说：“《炮打司令部》打的是什么？是用马列主义的炮弹，打掉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8月8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讲话中。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部是我们毛主席。”“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现在重整旗鼓再进攻。”林彪还说：“我们毛主席把文化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毛主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林彪还借此机会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声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视毛泽东思想，犯了很大的错误。林彪的讲话，在全会上作了传达。后来，全会又印发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

野心家们推波助澜，会议形势为之大变。

即使在毛泽东大字报发出后，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所说的炮打只是对准我们司令部里面犯错误的同志，并且多是批评刘少奇所谓对毛泽东思想和毛

泽东本人有抵触、不服气、自以为是，等等。林彪，江青等人发言后，大会便接受了这种提法：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既是“司令部”，就不止是只有一个“司令”于是，大会一度开始出现不正常的个人攻击，邓小平、朱德、陈云、邓子恢、薄一波及其他许多同志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搞得人人自危，狂热纷乱。后来甚至有人建议中央组织专门小组审查刘少奇的所谓“问题”。

值得提出的是，即是在几个野心家们疯狂煽动，把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推向极端时，大会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批判也只是集中在刘少奇身上，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激烈。在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是谢富治。这时尚无人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并列为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首，毛泽东本人也没有点名或当面指责邓小平犯了什么错误。

“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中央全会正式承认

在不正常状态下，全会接受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判。然而，事情不能到此结束。早已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只是在大政方向上确定了“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至于具体怎么搞，人们并不清楚。作为一贯重视理论指导作用的毛泽东认为，要搞这样一个“政治大革命”，不能没有一个具体的章程。这一任务，应由八届十一中全会来完成。8月8日下午，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拟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中央全会的正式承认，更加合法化了。

《十六条》的起草从1966年7月初就开始了，在毛泽东主持下，最初参加撰写的有陈伯达、王力等人。初稿先后经过20多次修改，毛泽东又委托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加以审订。陶铸等人同周恩来商量，删去了初定稿中的“黑帮”、“黑线”等提法和若干内容，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最后报送毛泽东。8月7日，毛泽东同意了经修改后的第31稿为最终文本，决定第二天在大会通过。

《十六条》沿用了“四清运动”时曾伤害了不少基层干部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并把它引伸到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十六条》还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十六条》还规定：“干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它们“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的代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十六条》还号召：“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抓革命、促生产”。“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单从字面上看，《十六条》也有一些合理或比较正确的主张。比如把干部分为四类，认为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大多数；指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严格区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有错误的人，严格区分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明确规定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党委讨论批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等等。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出发点，还是想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搞好。这同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左”倾错误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有本质的差别。但是，整个说来，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根本错误，作为具体贯彻这一根本错误方针的《六十条》的规定，占主导地位的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方面。而且正是由于根本指导方针的错误，比较正确的条文事实上也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况且《六十条》的基本方面是高度评价“革命大方向”，鼓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出“一斗二批”的任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没有对一些具体政策和提法订出判别标准，对许多涉及原则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未作明确而有力的规定和保障，没有配套的详细而准确的解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是非混淆，各行其是，各取所需，局面混乱。实践证明，这个文件对导致“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的局面起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

与会者对于《十六条》的通过很难说当时有几种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尽管大多数同志思想不通，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但是由于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积习已深，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威望达到了高峰，全会已无力挽回“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的趋势，而只有接受和照办。

8月9日，《十六条》公开发表。

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接待站。就是在这次接见中，他发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妇孺皆知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会的议程仍没有结束。

尾声中的惊雷——林彪跃居党内“2号位置”

8月10日下午，在继续批判刘少奇的同时，开始讨论全会公报。八届十一中全会似乎就要最后落下帷幕。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虽然心事重重，但也准备收拾行装，回去慢慢消化会议精神了。

出乎中央第一线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外，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这是把全会的“胜利成果”在组织上予以最后落实。

这并非事出偶然。从8月7日开始、会议一方面对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本来，毛泽东在会前（7月25日）曾经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措词。但在会议期间制定的一个贯彻这一指示的文件中却说：“林彪同志提出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非常生动。通俗和鲜明的语言，在群众学习和斗争中发生了积极作用。”“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反党黑帮”反对这些提法，是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8月7日中央批发了这个文件，要求各地“遵照执行”。文件刚刚下发，就有同志在会上发言建议，“党内还是要大讲特讲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是最高原则，与对外宣传区别”。当场许多同志表示赞同，并且认为，“最高指示”等作为群众语言要一直保留下去。

与此同时，对林彪的褒扬也不断升温。有人发言称颂林彪“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贯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最紧，跟得最好”，认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必须是主席最好的学生”，“这样的人只有林彪，这已是众望所归”。此时中断养病的林彪本人也不再怕风，不再怕光，频频亮相，劲头十足，大有有机不可失，舍我其谁之慨。一些已经揣摸到毛泽东意图的人更是望风而动，乘机提出：“我们党，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帅。今后的一切大政方针，都要由主席和林彪同志来决定，其他人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因此，在大会举行选举前，林彪将取代刘少奇已是昭然若揭了。

8月12日召开大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首先通过了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6名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以取代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以后陆续病故的中央委员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6人。接着大会通过了撤销“彭、罗、陆、杨”职务和补选陶铸和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为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事变动决定补办了法定手续。大会决定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后，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委员11人，次序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2人：谢富治，刘宁一。全会并未重选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却于会后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这次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不满。后来，毛泽东本人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

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利用个人权威，通过法定程序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线，把大权集中到个人手中，这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应当指出，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决心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固然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毛泽东本意来说，并没有将刘少奇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打算。所以，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件事表态时只是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位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至于到后来毛泽东同意刘少奇是所谓“判徒、内奸、工贼”的结论，则完全是江青、康生等人极力蒙骗的结果。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造成了两位战友之间的历史悲剧。

按照惯例，8月12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在这之后，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话，他说：“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九次大会大概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毛泽东还说：“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毛泽东表示：“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以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林彪在周恩来讲了若干具体事项后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强调：“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会议解决了重大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批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今天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全会闭幕以后，按说这次重大政治斗争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在毛泽东看来，通过的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思想上仍然不通。思想不通，实际行动中就很难主动积极地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8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找一些人谈话，打通思想。林彪则在会议的第一天讲话。他讲了两大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和“干部问题”。第一个问题，林彪强调：“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战略措施。”在第二个问题里，

他宣布：“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

他还说：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党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距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多么“悦耳动听”的言辞！多么“虚心”，多么“诚恳”、多么“周密”的施政演说呵。但是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最后总是给予那些玩弄历史本身的人以无情的讽刺。5年之后，外蒙大漠里呼啸的黄沙向人们诉说了历史的真理。

几年之后，那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疯狂攻击刘少奇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紧随林彪之后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与此同时，党对自己的历史也作出了勇敢科学的分析：“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经过十年浩劫的严重曲折之后，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屡受批判的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完成由毛泽东开始探索、后经10年中断的中国富强与民主的历史大课题。

(张保军)

始自 1955 年的远征垦荒队·解决大量中学生出路问题的应急措施·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下乡知青共达 1623 万人。——“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个“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是一场运动。

别林斯基说过：“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但是，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

简单回顾

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 50 年代。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已经把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以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以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1955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提出了当时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理由。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同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时，他发出了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 年 4 月 8 日，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知青上山下乡是与我国人口多，城镇就业困难和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的农村需要更有文化的农民，广阔的边疆地区需要建设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知青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农村、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

1955 年起，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 10 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到 1957 年底，城市下乡青年已达 79000 多人，回乡的更多。在 1958 年，由于盲目扩大基建，大量增加职工，知识青年也不需要下乡了，这一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必须提到的是，在这些下乡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了开拓者的作用。他们那种以大局为重，排除习惯势力的阻挠，立志改变农村、边疆落后面貌的思想境界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佩。

在 60 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其原因除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外，还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首先，它是由于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关系过于简单化。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其次，自建国以来，长期忽视计划生育，造成人口比例失调，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

很高，使我国人口多、就业难等矛盾更趋突出。城市里每年不断出现的大量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的压力，使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再次，60年代初，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也就显得更加必要。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知青上山下乡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一项工作。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配置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乡与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知青上山下乡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国情的影响，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认识上和工作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对于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农村的建设有着积极作用的知青上山下乡逐步变成解决城镇部分青年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一个时期里，这一工作表现出了连续性、起伏性和一定的紧迫性。如果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理顺经济关系，即使不出现“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会继续下去。这一时期，在一些地区由于安置政策不够落实，致使一些下乡青年生活困难，思想波动，甚至出现下乡青年受迫害的情况，不过，从总体上来讲，这一时期的政策还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显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知青上山下乡说成是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任意歪曲历史的作法。有些人因此而认为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连同知青上山下乡一起给予否定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而那种以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为前提，认为应该继续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作法的观点，也是欠妥的。

被“文革”扭曲的运动

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严重的混乱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个“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为一场运动。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

1966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以及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参加红卫兵，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的浪潮很快遍及全国，在社会的各方面引起了极大混乱。

1967年第一季度，随着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连，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但是此时，严重混乱的理论宣传，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断作乱，已经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分辨不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使他们仍然滞留在学校之外，与社会上各行业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到处揪斗“走资派”，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武斗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极度混乱的7、8、9三个月。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于是，停课已久的各学校领导班子不健全，缺少教材和经费，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开始了所谓复课闹革命。当然，复课闹革命只是流于号召。在各地地方给中央文革的简报中有如下反映：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有实现”，“武斗不断发生”。许多学生不愿到校，还有一些学生“要求退学”。同时，复课闹革命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了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以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1966、1967年两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进行分配。大量积压的毕业生，是使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并成为学校恢复教学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把毕业生分配问题作为“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作了如下反映：“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毕业生分配问题虽然突出，但是在当时社会严重动乱，许多地区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无论在动员组织方面还是接受安置方面都是缺乏条件和力量的。因此，虽然在1967年10月上旬，出现了北京一些中学的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的先例，但却未能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更加显得紧迫、积压在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是1966、1967两届，加上1968届的初、高中毕

业生，共达 1000 余万人之多。1968 年上半年，大多数地区陆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也就到了不得不解决并有可能解决的时候了。同年 4 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对于毕业生分配，文件上提的是“四个面向”，当时工矿、基层的情况如何呢？1967 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近 10%；1968 年在 1967 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 4.2%，只相当于 1966 年的 86.6%。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招收新工人的。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所提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 年 7、8 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透过这种已经变形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国民经济急剧恶化，3 届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大量地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终于在 1968 年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严重问题。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性质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使得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法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当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运动的直接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

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除上述的直接原因以外，还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想不断拉平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他从个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改造知识青年的经验绝对化，对于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表现出轻视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倾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要缩短”，阶级斗争应该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以后，联系到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错误认识，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的主张，把同工农相结合，作为“再教育的根本途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考虑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认为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要把全

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学校的设计，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一想法也体现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当作是“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广泛地加以宣传。它反映出毛泽东试图通过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划等号”，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提到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一）它是一轰而起，没有长远的整体规划。在毛泽东发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后，各地方不区别具体情况，所有的城市都搞上山下乡，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同时，不管本人和家庭的情况如何，一律要下，搞所谓“一锅端”、“一片红”。从1968年底开始的头两年中，有400多万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下到农村和边疆。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大批知青下去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许多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地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泽东根据福建李庆霖反映知青问题的来信，复信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言辞间可见毛泽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境。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当年，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但是在当时，“规划”没有实现，政策仍是混乱多变，以至于有些地区又制订出什么“牛年招工，马年下乡”和“先下乡，后招工”之类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土政策”。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是直到他逝世，也未“解决”。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就是对这种大表大喻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

（二）在“大批判开路”的精神压力下，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的做法。在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报纸上一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并且表面化地把这个问题作为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气氛下，动员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到了所谓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知青下山下乡运动被作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迎着阶级斗争风浪破土而出的共产主义幼苗”一再拔高。“四人帮”及其死党，针对周恩来提出的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庄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和邓小平提出的“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的讲话，进一步把所谓“拔根”与“扎根”提到了“复辟”与“反复辟”，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高度，再次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向极端，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三）它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

中改造世界观。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有些地方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有的地方在城市郊区举办了知青场队，发展多种经营，但被批评为“下乡不离城”、“下乡不务农”、“违反大方向”。有的地区把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由于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

从以上几点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反修防修的思想指导下，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运动。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第一、加重了“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历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少培养了100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人才奇缺的问题，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人才深谷”。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中断教育，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等作法，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得后果更加严重。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头两年，只有一部分青年能得到升学或就业机会，大部分青年都下到了农村、边疆。“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1968年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共达1623万。一些年后，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即使又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因大多数人只有相当于初中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文化基础很差；同时，由于“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思想的广泛流行，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这是长时间来教育质量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使我国人才整体在一个时期内，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严重不足，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不易跨越的障碍。事实证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拉大了我国与正处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青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共达100多亿元。虽然这些钱有一半支援了农垦事业，但是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到了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对于大量的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多数插队知青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一般每人每月至少要补助5元，多子女下乡的家庭，负担尤其严重，给许多知青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造成很大负担。知青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以后在知青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文

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提前步入社会生活。上山下乡的实践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锻炼，使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的甘苦，学到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对于农村和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社会阶级——农民有所了解，并且逐步感受到和继承了我国民族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但是，这种收获对于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事实证明，脱离文化教育，离开文化素养的提高，孤立地谈论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不仅不利于青年正确地实行思想观念的变革，在思想上，精神上，个性上健康地全面发展，反而易受各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知识青年在若干年后返回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困境中重新奋起，不断地拼搏，开拓。但是，这种一切需要重新开始的状况，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时期里一部分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原因。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也许有人会谈到上山下乡对于青年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而肯定它的合理性。习仲勋在一次讲话中说：“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在这里他讲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伤害和磨炼。无疑，这是正确的。如果脱离开伤害去谈磨炼，就将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磨炼，是积极的，需要坚持和发扬的？还是消极的，必须反对和避免的？当然，别林斯基说过“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的话，但是，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点，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是在肯定其悲剧性质的前提下，认为这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但是，决不等于承认这种磨炼，就否定悲剧的性质。

从以上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体现出政治运动的特点，对于这种把知青上山下乡当作政治运动来搞的作法应该给予否定。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他们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起、建设着诸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许多场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创办社队企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热心地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在一些边远落后的地区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所处的逆境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坚持在农村和边疆，在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历程中起着骨干作用。

展望：继续？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试图主要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作法是不成功的。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之所以突出，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的破坏，也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和重要工作上的失误。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来，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和改革。在一个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我国在解决城镇知青就业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比较，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党和政府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所有制，着重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从1979年至1981年全国并安排了2600多万人就业，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难的矛盾基本上得到缓解。在全国范围内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逐步结束，“知青上山下乡”及其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为了消除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党和国家在艰巨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下决心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在知青工作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仍在农村、边疆的知识青年的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或在当地得到妥善安置。已经同当地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得到照顾。以后，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国家作出了给自1962年以后下乡的1500万插队知青计算工龄的决定。知青工作中的遗留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国国民经济还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存在。为此，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必须进行。近几年，党中央继续号召知识分子发扬50年代知识青年的“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采取多种形式支援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大批年青有为的知识分子自愿地走向边远落后地区参加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知识界的一种可喜现象。这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主要不同点在于，这种“结合”已经具有新的涵义，它既不单纯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更不是为了“接受再教育”，而是作为工农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在深入实践，与群众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输送。同时，“结合”的形式更加多样、灵活，联系实际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注重实效。这种结合，不仅是建设农村、边疆的需要，也是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走上成才之路的需要。它将使“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在更高的水平上和更广的范围内转化为振兴不发达地区建设，加速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物质力量。我们切不可因为历史现象表面上的“回流”或“趋同”，就简单化地“向前比”或“向后比”，忽视了知青上山下乡在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我们目前许多作法与过去的根本区别。

（张化）

苏联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60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

风声紧，雨意浓。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8年1月，大批苏军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1969年3月，苏军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1969年6月和8月，新疆又发生中苏武装冲突。

风声紧 雨意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从60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1969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60年代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据此，《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在1965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各省、各部及军内各部门着重汇报、交流了全面加强战备、加速三线建设的情况和计划。会议同意“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1966年，毛泽东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的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

战备在“天下大乱”后走向复苏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对外敌入侵的高度警惕，主观上仍想继续加强战备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均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陷于瘫痪和停顿。

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1968年9月7日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指出：这“是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在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性质，虽然“天下大治”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相比，在全面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还是较为平稳、安定了一些。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所恢复，有所发展，部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也有可能比较正常地运行。

与此同时，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困难越来越大。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凭借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磨擦。此外，加之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中国方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来自与自己接壤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实、最危险的敌人。有鉴于此，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放在“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随着中苏边境冲突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这是中共九大前后战备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以后，战备工作立即被当作一项紧迫的重要工作提上革委会的议事日程。

1968年9月7日，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同年9月30日，林彪在庆祝国庆19周年大会讲话中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要时刻保持警惕，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在同年10月31日通过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的提法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

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出“越是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提高革命警惕。我们要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国防，随时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侵犯我国的敌人！随时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不难看出，以上言论虽然提到了外敌入侵的可能和备战问题，但基本上属于一般号召，没有给人多少紧迫的感觉。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8年1月，大批苏联边防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用装甲车压死、撞死、撞伤中国渔民多人。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1969年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1969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还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社论指出“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他们对一些东欧国家的人民任意进行残酷的掠夺和野蛮的压迫，甚至出动几十万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东欧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企图建立沙皇式的殖民帝国。同时，他们也把这一套搬到亚洲来……而且妄图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领土……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社论最后说：“我们警告苏修叛徒集团：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你们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说到了国际形势和中苏边界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在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分 歧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例如：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语）；在战略方针上，60年代中期以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表现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防御重点在“三北”地区；在战备问题上，一致同意要以充分、广泛的战备工作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外敌入侵，等等。

在战争的危險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珍宝岛事件后，四位元帅开了两次会，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美苏在全球争霸的态势和重点，提出了若干关系中国战略方针的重要建议。报告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快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最迫切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这也就是说，它们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未改变这一基本战略格局。报告同时也着重指出，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时间已经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素。1969年9月17日，在全国贯彻执行中央“八·二八”命令，战备工作已出现全面高潮时，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联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分析，指出，苏联方面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但它又对战争顾虑重重，怕在政治上孤立，怕加剧国内矛盾和经济困难，怕两败俱伤美国得利主宰全球，等等。所以，在可以预想的时期内，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反而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革命制止战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走向高潮

九大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1969年6月，为系统研究、制订对付苏联入侵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委召集的“三北”会议在北京举行。

同月，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提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费用比1968年猛增 $\times\times\%$ ，1970、1971两年又继续递增 $\times\times\%$ 和 $\times\times\%$ 。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多达 $\times\times\%$ ，超过1968年不到 $\times\%$ 的比重，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6月中旬至7月，军委办事组召开了一些加强战备的会议。

同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纪念建军42周年社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社论号召：“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必须有足够的估计。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的这个方针是无产阶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打。但是，如果美帝、苏修硬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迫使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一定奉陪到底。”——同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工作。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为：组织和进行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等等。次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周恩来、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办事机构设在总参作战部。1969年9月，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同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同月29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同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口号共29条，其中第11条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第12条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第22条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此条为毛泽东审阅时所加。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最大的战备，但实际上，正是“文化大革命”给战备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九大以后，虽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已成立，整个形势逐步趋于平稳，但前一阶段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留下的后遗症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

而且，“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又在继续造成新的动乱，严重地阻碍着战备工作的进行。

九大以后不久，山西、河南、江苏、湖北等一些省、市、地区又出现反复，动乱再起。例如，山西省革委会领导班子长期不和，各拉一派，全省许多地、市又出现了各种另立山头、制造分裂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各自拥有专业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社会上搞打、砸、抢、抄、抓，冲击部队指挥机关，抢夺部队武器装备，破坏铁路公路，武装袭击列车，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割据，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等等。为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中共中央于1969年7月23日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扫除一切武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大联合。“七·二三”布告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的形势迅速好转，其它省、市、自治区存在类似情况的地区也受到震动。布告本身虽然没有谈到战备问题，但它所针对的问题和所产生的结果都与战备密切相关。

但是，“七·二三”布告仍不足以解决大规模动乱和武斗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严重问题。布告发布后，一些边远省、自治区武斗动乱的问题仍未解决，这与当时已经十分严峻的战备形势是很不相适的。为此，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备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势的命令。命令提出，美帝、苏修正在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命令要求边疆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的思想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命令要求：大敌当前，要加强军民、军政及军队内部的团结，巩固革委会；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拆除一切武斗据点，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命令要求，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意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八·二八”命令把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明确地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进入了高潮，并由主要是思想动员进入了全面的具体实施，由主要是部队的工作变成了全民的紧张行动，由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主要工作之一。

“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传达、贯彻的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发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命令，布置、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例如，甘肃省于8月30日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对照命令检查了群众的战备工作，会议决定：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个大宣传、大学习“八·二八”命令的高潮；下决心解决一些地区、厂矿的“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把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分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查清，对阶级敌人发动一次进攻，彻底解决矛盾；在国庆前整顿一次社会秩序；提前进行战备物资、人员疏散等工作。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9月2日和3日连续两次召开全市大会，号召全市800万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以高昂的战备姿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命令，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起来，准备打仗。大会决定：立即在全市城乡掀起学习中央命令、执行中央命令的热潮，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武装每个人的头脑，用“八·二八”命令指导每个人的行动；进一步加强革命大团结，巩固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革命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坚决镇压反革命，维护革命秩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有领导、有步骤地整顿民兵组织，要做到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三落实，并加强首都防空设施。

随着对“七·二三”布告特别是“八·二八”命令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贯彻和执行，全国出现了一片浓厚的战备气氛。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的因素都受到严厉的打击，革委会的权威得到维护，生产逐步恢复，社会生活、工作秩序有所好转。这些都是进行战备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紧迫的战备活动的结果。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1969年9月1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原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题为《举行军事情报传达会议。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的攻击保持戒备》。报道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人和民政官员正在接到通过要他们预防苏联将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场‘必然的’袭击。……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一个命令，授权军队对‘无政府主义者’、‘反革命分子’和‘颠覆分子’加强镇压措施。……在广东会议上，干部们把由毛泽东认可，从9月1日起生效的这个命令说成是实际上是一个‘动员令’，其目的在于加强‘祖国的防御’。……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干部们敦促参加会议的军官和官员对士兵和老百姓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报告表示不解的是：“这里的专家们同样不清楚的是，中国人谈论马上就要打仗，是用来推动它过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计划，还是真正害怕战争而提出这种严密的计划。”

日本《东京新闻》于1969年11月23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布“八·二八”命令，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的消息，以及题为《同苏联的紧张状态历历在目，对边境地区的武斗感到危机》的评论。评论中说：“‘八·二八’命令的八项内容，直接或间接都同准备打仗有关，由此可见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是多么地紧张。……在这种对付苏联和对付美国的准备也即备战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北、内蒙、新疆、云南等边境地区，问题特别多，据说各派之间不断发生武斗。针对边境地区的混乱，发布‘八·二八’命令的目的，似乎是要严惩首恶，确保军民纪律，从而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突破国内外的严重局势。”

中国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文件。

“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双方协定，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

1969年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

10月中下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1969年10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部队司令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视察、看地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背着党中央、毛泽东，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全 民 备 战

中苏边界谈判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立即爆发战争的迹象逐渐减少。这时，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尽管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直到1969年底，战备气氛仍然很浓，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969年9月以前和1970年以后。在当时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纲”。

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没有全局观念的工作，就是单纯业务观点”。1969年10月下旬，广东省革委会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确定，要以战备为中心部署今冬明春各项工作。1969年11月中旬，长春市革委会举行城市斗、批、改工作会议，决定从准备打仗出发，以经得起战争考验为标准，认真搞好全市今冬明春斗批改工作。1969年12月7日召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以战备工作为重点，讨论落实1970年斗、批、改及工农业生产新跃进问题。

当时，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却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农业生产等项工作，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1969年10月至1969年底，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加强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具体内容有：

(1) 战备动员、教育。这是战备工作的思想基础，一直被放在各项战备工作的首位。例如湖南省在“八·二八”命令下达后，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备教育工作。全省农村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以战备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广泛的“革命大批判”，利用电影、幻灯、图片、漫画、墙报、文艺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据报道，通过这一系列战备教育活动，加强了战备观念，促进了斗、批、改运动和工农业的发展。天津某厂革委会自九大以来，“结合国内外形势，针对职工的活思想，”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战争的一系列论述，并采用讲形势、摆敌情、声讨批判、忆苦控诉、敌情展览、战备落实、讲用会等形式，对全厂职工进行战备教育。通过学习，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敌人的侵华罪行，明确了我们必须立足于打；同时认识到，搞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敌人的有力回击。在中苏谈判开始时，全厂167名职工主动把被褥搬到厂里，日夜守卫在机器旁，突击生产军工产品。

(2) 按战时要求组织指挥机关。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1月上旬决定，将省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十几的人到新的指挥机关；一部分约占百分之二十几的人留在西宁，坚持工作；另一部分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到新指挥机关的周围做群众工作和负责面上的工作。湖南省革委会组成了三线，成立了第一指挥所、第二指挥所和本队。中苏谈判时，革委会机关的一、二线人员都背起背包分别进入第一、

二指挥所，本队则进行了就地疏散隐蔽。

(3) 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战备活动之一。1969年10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学校被外迁，一些高等学校被裁并，一批高等学校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青海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969年11月8日关于战备问题的讨论中，决定将被撤销的18个厅局的2500多人，除搞专案的人集中起来到省办“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办公外，其余的一部分担任中、小学教员或充实到各级革委会中，一部分人组成宣传队到各州、县协助当地革委会工作，另一部分到“五·七”干校或“五·七”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不能坚持工作者，动员其回原籍，按当地工资标准发工资。对职工家属，能回原籍的一律回原籍，路费可报销，户口带与不带听其自愿，无原籍可回的则安置到省革委会的家属基地去。对城市居民，应尽可能动员去农村和牧区。对省市监狱的劳改犯均转移到州、县一级，已服刑期满的刑事犯则遣返原籍。会议还议定粮食、档案、商品等物资，除保证日常供应外，扩大州、县的库存，档案资料凡重要者，一律转移。

这次战备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费，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冲击。

(4) 修建地下防空工事。修建防空工事的工作，早已在进行。“八·二八”命令下达及中央防空领导小组成立后，进度明显加快，例如，截止12月中旬，湖南全省主要城市已挖好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壕等）可容纳160多万人，而这些城镇共有280万人。其中株洲市的防空设施可容纳人数占总人数的92%。省革委会要求城镇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防空位子。福建省南安县地处晋江中游的某公社，在村道口、大路道口、大路旁到处挖了战壕、坑道和单人掩体。交通要道旁有能攻能守的阵地，房屋里有枪眼，制高点和暗道直通到指挥作战的堡垒。此外，还有专门储粮、存放战略物资和耕牛的地窖，这些设施还作了防水、防毒、防塌的准备，一些地道也从村里发展到村外、田野、山头，从一家一户发展到户户相通、岗哨相通。县城里的地道，也按疏散区为单位开始挖，计划将各区的地道连接起来，构成地道网，达到能打能防，能在地上打，也能在地下打，使敌人寸步难行。

(5) 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这是当时各级革委会普遍重视的一项工作。黑龙江省把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以及街道居民都以民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实现全民皆兵，有的地方是按生产、工作或居住单位，把群众分别组成战斗队（基干民兵），支前队（普通民兵）后勤队（有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和儿童团，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福建省南安县在搞好清队的基础上，结合整党整顿了民兵组织。到1969年12月中旬，全县已经组织起两个民兵独立团（其中一个团战时归军分区直接指挥），共5200人。此外，还培训了民兵骨干425名，轻机枪射手45名，全县以民兵为骨干组织了一支拥有万人，840副担架的支前队伍，还有六个公社组织了500多人的自行车战备运输队。

除此之外，各地的战备工作还包括：修筑战备公路、桥梁，制造轻武器，储存战备物资，建立战时生产领导体制，建立健全战时后勤供应、物资运输、消防、防化、治安纠察等各种专业小分队，等等。

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形势的新看法

从1970年初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全国的战备工作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1969年的特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指出：“新的一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在这里，战备工作仍然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和“纲”，但在程度上，较之1969年10月至12月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似乎又不那么突出。1970年5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谈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在这里使用的战争与革命这对范畴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有所不同。这里的革命是当作与战争对立的一个因素出现的，这不仅包括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行为，也包括了全世界人民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努力。而他这里所说的战争主要是指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其《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里又明确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有他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提法，还有他对主要敌人的表述。

1970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帝国主义大国想要瓜分中国，但中国被瓜分的可能性不那么大；尽管可能性不大，想着这一条还是好的，准备着。

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八·一”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中，把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尖锐地指责了它们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处心积虑地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野心。社论重申了毛泽东在“五·二”声明中的重要论断：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社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做好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对付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社论要求：“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在1970年9月6日通过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战备问题的提法有所改变。公报在谈及今后工作任务的第三条中说：“要继续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公报没有重复1970年元旦社论，“八·一”社论中有关“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等提法，而代之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这种提法实际上是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又重复了这一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

表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已适时地调整了战备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

1970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也不想打。同年10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又说到，究竟是战争的危险为主，还是革命为主，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当前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

不难看出，在70年代初期，毛泽东通过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态势的敏锐、科学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又有所发展。他一方面指出还存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一方面肯定了由于全世界进步的、革命的、和平的力量的发展，形成了遏制战争的强大力量，而正是这第二方面，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

不仅如此，与1969年相比，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突出了对美国扩大印支战争和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谴责。

1970年5月20日，针对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以及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首都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集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五·二”声明。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5月中下旬，全国各地4亿多人集会游行示威，声讨、谴责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

1970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的战争挑衅。中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越南和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把1970年中国对美帝国主义扩大印支战争的强烈反应，与1969年中国因苏联的战争挑衅而进行的全面战略动员相比较，不难看出因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不是根本性的，但它还是逐渐反映到1970年中国的战备活动及其他各项工作中。

从临战向帝各的边步转变

从1970年初开始，大规模的战备活动逐渐向常备型方向发展，战备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年初起，虽然在内部讲话、文件和动员中还把战备作为整个工作的“纲”或“中心”，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1970年初全面展开的“一打三反”运动，加之斗、批、改运动中的各项繁重任务，以及1970年初掀起的工农业生产高潮，战备工作往往难于被放在中心的地位，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精力往往不得不放到不间断的、杂乱纷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上去。例如，1970年5月至6月召开的北京市第二次战备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要求以战备为纲，掀起一个赛革命、赛战备、赛团结、赛生产的新高潮。报告又说，当前，全市主要是做好三件工作：第一，认真抓好“一打三反”运动，这是最大的战备，第二，坚决落实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搞好工农业生产。要狠抓生产建设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促进工农业生产，以更加丰富的物质资源支持持久的人民战。第三，打一场落实战备的人民战争，目前，还要认真抓好人民防空、人口疏散、民兵建设、物资储备、医疗救护、后方建设等项战备工作。报告里虽然提出要以战备为纲，并且也规定了一些战备任务，但其强调的心中却是“一打三反”运动和工农业生产。当然，这些工作又都被说成是“最大的战备”。

从1970年初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备运动虽然还保持着大规模、高速度的势头，但基本上还是逐渐向常备型的方向发展。1970年2月，总参谋部下发要重视部队的近战、夜战训练的指示，要求部队在狠抓“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训练的同时，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对部队的影响，为了改变部队纪律涣散、条例条令废弛和事故增多的状况，1970年5月，总参谋部召开了以“加强部队管理教育、严格组织纪律、大力减少事故”为主要内容的全军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指出：1959年以来颁发的条令、条例，在没有修改之前，仍须贯彻执行；有些专业性的条例和操作规程，凡是科学的合理的，行之有效的，也要坚决执行，不能随意废掉。1970年下半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中央军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战备工作的报告。在1970年8月至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这个报告。

1970年，战备交通建设出现了空前的多项目、大规模、高速度的局面。其中，新建铁路××××余公里，新建或改建国防公路××××公里，疏浚、整治航道××××公里，各地还新建了许多地方交通线路。焦枝、成昆、襄渝、湘黔、枝柳等铁路已经通车或正在加紧建设，大三线的铁路网迅速形成。“三北”地区新建和改建国防公路××××余公里，主要战役方向的公路干线基本成网，通往战略、战役后方基地的道路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长江上建成×座军用重件活动码头，黄河新建了×座公路大桥，为部队南北机动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防通信网的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

地方的战备活动也在广泛进行，但其声势和紧张程度已不如1969年下半年。

1970年上半年，华北、东北等地又相继召开了地区级的战备会议，然后有关省、市、自治区又分别召开了各自的战备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层层传达，成为基层各单位战备工作的指导思想。会议分析、研究了国际形势，总结交

流了前一阶段各自战备的经验，研究确定了今后战备工作的方向和内容。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防空工作在 1969 年的基础上，又取得较大进展。据 1970 年底的统计，全国 75 个大、中城市已挖防空工事 $\times \times \times$ 万平方米，平均可掩蔽市区人口的 60%，许多城市的工事已连片成网。在此基础上，大部分城市已开始规划建设通往郊区的疏散干道，其中 52 个大、中城市已经完成 $\times \times$ 万纵长米。“三北”地区一些靠近边境的城市中，许多工厂、学校已经可以转入地下。这些单位的工事已初步达到能藏、能生活、能生产、能工作、能防御、能进攻的要求。但在当时条件下，由于是仓促上马，缺乏全面、长远的规划，又不注重使用科学技术和管埋，这些防空工事普遍存在质量低、施工中伤亡事故多等问题。1971 年以后，这些问题逐渐有所改善。

紧张战备空气中的经济与政治

但是，尽管如此，战备还是对1970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各项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虽然一些直接的、具体的战备工作往往没有被摆在中心的位置，但当时的各项工作又都是在强烈的战备气氛这个总背景下展开的。

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计划纲要的总要求是：“四五”计划期间要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战备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适应战备需要，计划纲要中要求：“四五”计划期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备后方；内地的工业要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特殊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要“进洞”等等。“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高指标，与当时以战备为中心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希望在1970年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愿望是密切相关的。1970年国民经济的盲目跃进也与这种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除经济工作外，战备工作还对1970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斗、批、改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指示》认为：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作，为害很大。当前国内外阶级搏斗激烈，反革命分子必然要跳出来，或者由国外派进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此必须提高警惕。《指示》要求：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要求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中，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动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指示》指出：“当前我国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示》又说“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

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要发动广大群众去进行，一样要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

同月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根据中央这些指示和通知的精神，从2月份起、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与当时已在进行的“清查5·16”运动，本身已带有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加之这些运动又是在“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和背景下开展的，被认为是“打击帝、修、反”的斗争，所以，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对铺张浪费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扩大化后果。

全民野营拉练

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训练。通过野营拉练，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明显提高。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些部队野营拉练的经验。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进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军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北方部队实行冬季野营拉练，南方部队实行夏季野营拉练。野营训练培养了部队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提高了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通过野营训练，也发现了部队内部许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而产生的严重问题。

1970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的批示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野营训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大兴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树立常备不懈的战备观念。”通知还要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传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帮助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等。既进行野营训练，又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福利。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难看出，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野营训练的意义，已超出了战备的范围，而带有浓厚的阶级教育、生产劳动教育、路线教育、组织纪律性教育的色彩。

中央通知下发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纷纷立即开会研究布置落实，有的省、市还专门成立了野营训练指挥部。

沈阳市革委会于11月27日召开全市电话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对开展野营拉练工作作出部署。市革委会成立了野营拉练指挥部，各区和一些工厂、学校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市革委会决定先在6个工厂和中学进行试点，拉练地区在沈阳市郊区各县。市革委会规定各单位的野营活动大体上分4个单元进行：政治教育10天，军事训练4天，参加劳动7天，行军7天，行程约300—400里。

全国的野营拉练一般是在1970年底至1971年初全面铺开，在1971年初达到高潮。虽然全国各地的做法有一些不同，但在政治教育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点来看，却是基本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地方都把这种拉练称作“首先是政治拉练”。1971年以后，除部队外，这种野营训练已不多见。

结 束 语

1969年至1970年间全国性的战备高潮，是在中苏、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国际环境中，在我们对于发生外敌入侵、对立即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后发生的。从1970年上半年起，当我们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地调整了我们的战略构想之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又逐渐走上常备型的轨道。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战备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紧张的战备工作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紧张的战备空气，使得中央在1969年下半年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有力地解决了由于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遗留下来的武斗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纪律和秩序，为工农业生产和战备工作创造了基本条件。1970年后几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的回升，都与这种环境密切相关。全国战备动员虽然强制性地解决了一些地区恶性武斗，削平了一些顽固的派性山头，但因“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未得到纠正，导致动乱的根源并未被触及，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便又会产生和泛滥。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刑事案件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问题，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果。

由于形势的变化，由于斗、批、改工作各项繁重的任务（如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基层革委会建设、教育革命，等等），由于1970年一些新任务的提出（如“一打三反”，工农业生产新跃进，等等），战备工作已不再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国防战备费用自1970年起逐步减少。在减少国防战备费用的同时，中央还将一部分投资由内地转向沿海地区，把支援三线作为一、二线主要任务的提法改为重要任务，1973年国家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比上年增加了 $\times\times\%$ 。这些变化反映了毛泽东与党中央对发展着的国际形势的及时把握，以及据此时战备方针、国民经济建设方针的及时调整。

60年代末的大备战距今已近30年了。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战争的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战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也的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三线”建设也由于要求过急而存在着粗糙、浪费、质量低等缺陷。现在的人们有理由对这些缺陷提出批评。但是，人们不应当忘记，当时的中国的确存在着强敌入侵的危险，不应忘记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曾设想动用原子武器以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或者是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以及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叫嚣“共产党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等等事实，这就比较容易理解，正是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使得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贸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孙子兵法》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郑谦）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联人说：“我们要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来与中苏边界谈判
中苏总理“机场会见”，周总理指出：“边界问题是现今中苏问题的中心。”
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周恩来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
周恩来多次召开内部会议，请示毛泽东后决定坚持下去。苏方处于被动，谈判陷入僵局。

除夕之夜，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要边防注意警惕。

对于敬爱的周总理，我们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作为曾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一名普通战士，回忆起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和爱护入微，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里仅忆述他领导我们进行外交谈判的一段往事，以寄托对他的思念之情。

中苏总理“机场会见”，周总理指出：

边界问题是现今中苏问题的中心 1969年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3小时又40分钟坦率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之后传话，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有能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9月10日，当他飞达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弯路的泥潭里。50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党就范，不服，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全面紧张。1964年10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缓的表示，当面对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1969年6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

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了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恩来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机场会见，经过3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他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3个月时，周恩来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就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论地区，就是你们说是我们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关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一次会议，

周恩来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 1969年10月7日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八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我被指定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荃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他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畔，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1964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他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1960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1964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还可能更为严重。

周恩来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可是，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的谅解列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就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声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的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恩来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他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

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都要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周恩来多次召开内部会议，请示毛泽东后决定坚持攻下去。苏方处于被动，谈判陷入僵局 10 月 19 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70 岁的库兹涅佐夫。他从 1953 年至 1955 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我想试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10 月 20 日谈判一开始，当我们根据总理指示，把 9 月 18 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恩来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我们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的影响，二是处理从一些外交上急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中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排除了 1967 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总理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们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后，周恩来在一次交谈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我们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然无言以对，但仍不愿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难道他们真的想打仗吗？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我们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我向苏方的副团长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他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 11 月 18 日，苏联又在同我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从 9 月的谅解倒退，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 10 月 20 日谈判开始后不久，25 日苏美双方就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 11 月 17 日在赫尔辛基举行。苏联表示，苏联期望能够限制战略武器，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损害”。经过一个多月秘密会谈之后美苏又宣布，将在 1970 年 4 月继续在维也纳会谈。12 月 24 日，苏美双方又同时批准了《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12 月 8 日，苏德就共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华沙条约的外长会议还于 10 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建议 1970 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并同意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也许他们认为同西方的外交将会有有一个大的进展。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前景对于短视的政治家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在中苏谈判会场上，他们却十分被动，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在“争议地区”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边界问题的僵硬态度，一点也没有松动。1964年谈判时，我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而对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都得算是苏联的。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地区”的结果，使对方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也使谈判走不出僵局。

12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我们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除夕之夜，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要边防注意警惕。毛泽东对苏方说，我们要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12月31日的晚上，我接到通知说，当晚12时总理召集代表团开会。那天下午，我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

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照会所提两个岛屿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一侧。1968年1月苏军越界侵入七里沁岛破坏我边民生产，并有装甲车撞死、压死、撞伤我边民13人，虽经我一再抗议，苏方均不置理。珍宝岛不仅位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而且枯水期同我岸相连，由于苏联的蓄意挑衅，终于导致了举世皆知的1969年3月的流血冲突。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联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总理。

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了。总理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不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在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1970年的凌晨。这是他70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周总理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了，他的谈判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被动。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回去后苏联政府所走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质问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所讲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时，他根本无法回答。会谈后，总理告诉我们，不必再攻了，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并不高明的压力。

我们总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是周总理一再向我们交代的方针。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的副团长讲：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以后对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总理说：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后来对方又改提签订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告诉我们说：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也不愿达成，谈边界连存在争议地区部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代表团的同志讲，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外，苏联不愿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同周边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争议，它怕引起连锁反应。总理说：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他不愿干，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总是要谈的，但关键是他

们领导人的决心。

1972年的下半年，我离开了代表团。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9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今天，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多年了，可以告慰他的是，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国与苏联的紧张局势得以解除。中国与苏联解体后诸国的边界问题也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在解决。周恩来为扭转中苏关系、谋取缓和两国紧张局势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对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培养教育，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奋斗不息。

（柴成文）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震动了世界。尼克松叹道：“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

陈老总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20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难道比登天还难？美国发出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周恩来的案头，但是毛泽东庄严地沉默着。盘马弯弓，中国领导人并不着急。毛泽东对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使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新中国开国的声声礼炮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将在自己的政权下建设新生活的种种美好远景。而对大洋彼岸的华盛顿高层决策者们来说，这只意味着两大外交难题直逼他们而来。那就是，是否承认新中国以及如何处理同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据说生长在非洲的草原和沙漠地带的大鸵鸟在被迫急了的时候，就把头钻进沙里，自以为这就可平安无事。而华盛顿的高层决策者们最后却也做出了和鸵鸟这种行为相类似的政策——宁愿死抱蒋介石在台湾岛上的残渣余孽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的虚构，也不愿与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打交道。“鸵鸟式否定”的历史逻辑导致了中美敌对局面的出现，并最终把两国引向兵戎相见的朝鲜战场。敌对和最低限度的接触成了20余年中美关系的写照。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中苏分裂而不复存在；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实力大损，在与苏联争霸中开始处于守势；苏联在全世界加紧扩张，咄咄逼人，大有席卷亚、欧、非，囊括全球之势。越南战火和中苏关系恶化促使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摒弃原来奉行的反帝又反修、两面开弓的外交路线，制定新的对外战略，以适应国际关系中发生的新变化。于是，在国内一派“文化大革命”的轰轰烈烈气氛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挥动他们改变历史的大手，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导演了又一幕精彩绝伦的话剧。

毛泽东委托 4 位老师纵论国际形势

1968 年 11 月，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战胜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和第三党候选人华莱士，成为美国的第 37 位总统，次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宣誓就任。对于这位在竞选中信誓旦旦一旦就任一定会在外交上搞大动作的新总统究竟如何动作，人们拭目以待。

很显然，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并没有因为这位新总统上台而有丝毫松动。1969 年 2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前中国驻荷兰外交官廖和叔叛逃，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送往美国一事发表强烈抗议的声明。中国政府决定取消原定在 2 月 20 日举行的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与此同时，美国侵越战争的规模不但没有因为美国新政府上台而缩小，反而呈现继续扩大的态势。美机、美舰仍不时侵入我国领空、领海。中国外交部照例提出严重警告。

中苏关系也更加恶化。1969 年 3 月 2 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领土珍宝岛，中苏边防人员发生激烈交火。同时，苏联国内的反华气氛甚嚣尘上，在莫斯科，10 万人冲砸了中国驻苏大使馆。苏联大量集结兵力于中苏边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与此相对应，中国国内的反苏备战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4 月 1 日开幕的中共“九大”对国际形势做出了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的判断。

就在国内一派“大备战”的火热气氛中，毛泽东主席却要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 4 位身经百战的老师们思想不要被框住，放开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决策还有一个系统在起着作用，那就是以林彪为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大员”紧随其后的军委办事组集团。其中林彪对形势的判断起着决定作用。

与林彪集团相比较，4 人小组成员更熟谙外交与国际事务，因此他们的观点相比之下会更稳健，更成熟。毫无疑问，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自 1967 年所谓“二月逆流”以来一直靠边站的 4 位老师参与大政决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6 月间，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宣布了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判断和命令，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很显然，军委办事组集团认定，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6 月 7 日下午，4 位老师在中南海武成殿一聚，熊向晖和姚广列席。讨论的主题是苏修、美帝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战争是否真的就要到来了？当然，毛泽东要求他们讨论中不能有条条框框，他们也自然不会被军委办事组对形势的判断和大量宣传报道中的“假、大、空”口号所框住。

是年，叶帅 72 岁，聂帅 70 岁，陈总和徐帅都是 68 岁。讨论中，4 位老师都不用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每次连续讨论 3 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从 6 月 7 日至 7 月 10 日，他们经过 6 次共 19 小时的讨论，写出了第一次书面报告。7 月 11 日，由陈总定稿的 4 人座谈会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报告提出了与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完全不同的判断。4 位老师认为，当前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既不同于“二战”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美苏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但是并不因为他们的互相勾结而使他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

他们之间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4 位老师透彻地分析了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态势，最后认定：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它在中苏边境挑起争端是为了在欧洲结出果实。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美、苏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别有用心。苏、美都想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4 位老师认为：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主动进攻，军事上积极防御；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壮大陆海空军；同时，在国际上，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做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断后，7 月 29 日至 9 月 16 日，4 位老师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 10 次共 29 个半小时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尼克松新政府对华战略的新动向和重新评估中苏战争的可能性。

9 月 17 日，由陈总定稿的 4 位老师《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呈送周恩来总理。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再次肯定了“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的判断。鉴于苏联担心中美可能联合，而美国新政府又多次表示战略收缩和松动中美关系的意向，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矛盾、“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用和苏联举行边境会谈，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的战术行动，以获取战略上的主动效果。

报告定稿后、陈老总感到意犹未尽，又产生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陈老总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20 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难道比登天还难？华沙会谈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很难有什么突破。鉴于目前国际局势出现的新变化，我们应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矛盾和有关问题。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个战略行动。陈总表示，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总理口头汇报。

至此，4 位老师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老师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建议引起了毛泽东深沉的思考。

中美跳起了“小步舞”

对于一国的外交决策，其领导人的思想素质和政治经历有着重要的影响。留在一代美国人心目中的尼克松，却是“一位其全部生涯都是以不懈地反对革命运动著称”的反共斗士。早在50年代，尼克松就曾积极支持麦卡锡指控那些“不忠的”外交官们“丢失了中国”。1954年他当副总统时，又曾强烈要求出兵越南。在1955年和1958年发生的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又是他最为强硬，声称不能向共产党放弃一寸土地。1960年10月，他与约翰·肯尼迪辩论时宣称：“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的不只是金门和马祖。他们想要的不仅是福摩萨（即台湾，作者注）。他们想要的是整个世界！”1965年，作为共和党的发言人，他批评约翰逊总统对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抑制不力，坚决反对任何使美国对华政策“软化”的做法。直至他任总统之前，关于他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过去的观点，尼克松也无多少透露。竞选中的尼克松虽然也说过希望和中国缓和关系，但更多的却是极力主张为了在军事上遏制中国，美国必须予其东南亚盟友更多的援助。他重申他反对给予中国外交承认、联合国席位及贸易特权。美国的政策，他辩称，应当“使中国相信它必须改变，它不可能实现它的帝国主义野心”。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那样富于戏剧性，又略带讽刺意味。1971年7月15日晚7点半钟，美国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这位以坚定反共而著称的美国新总统却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喜形于色地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足以成为“本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的新消息。据当时美国报纸报道，大部分美国人在看完这则消息后惊得目瞪口呆，久久反应不过来。

“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进展”，这位总统说，“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公告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

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世界轰动了。

正如风雷激荡时刻的到来往往要经过一个能量积蓄过程一样，公告虽然简短，它的背后，也经历了2年多复杂、微妙和艰难的外交酝酿。

其实，尼克松也决不是一夜之间就大彻大悟，彻底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对华政策观，只是他一旦居于美国总统高位，时势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促使他认识到和中国和解会使他的新政府内政、外交获益无穷。于是，尼克松决定启用深谙欧洲梅特涅和俾斯麦的“地缘政治说”和“均势”理论，力主缓和对华关系的基辛格博士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准备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实际步骤，实现中美和解，从亚洲收缩战略力量的外交大写意。

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开始间接透露新政府缓和中美关系的政策意向。他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

星期以后，尼克松交给基辛格他上任以来的第一项任务：“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3月，尼克松访法，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就中国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接受了戴高乐对他缓和中美关系设想的鼓励。4月22日，法国的艾蒂安·马纳克动身前往北京就任驻华大使，他认为，华盛顿现在正力求同北京开始真正的对话，美国准备承认中国并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

早在尼克松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尼克松上台后，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中国的官方报纸转载了美国新总统的就职演说。借毛泽东要求整顿“文革”初期搞乱了的外事队伍之机，周恩来又迅速指示外交部重组对美政策研究机构，尽快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做好可能与美国新政府打交道的准备。对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松动对华政策的某些暗示，中国给予密切注视并不失时机地作出反应。周恩来曾指示外交部要认真研究尼克松7月25日在关岛发表的“新亚洲政策”的讲话，吃透尼克松所说的从亚洲战略收缩的真正含义。

1969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放松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的对中国的旅行及贸易限制，第7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作为对中国不久前释放2名误入广东海域的美国旅游者的回报，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借此机会，他开始传播美国准备开始同中国来往的信息。在旅行的每一站，尼克松都请该国领导人把他对中国人的好感转告中国，并明确表示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美国不会参加苏联敌视中国的任何安排。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论，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

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一篇重要演说，声称：“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9月5日，副国务卿理查森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最终改善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我们不想利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敌对，坐收渔翁之利。但是，如果这一争吵升级到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程度，我们不能不感到深为关切。”

美国发出的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周恩来的案头，但是毛泽东庄严地沉默着。盘马弯弓，中国领导人并不着急。

1969年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了吊唁仪式。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又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毛泽东批示同意。但当中方答复苏方时，柯西金已飞回苏联境内。于是，柯西金遂又飞回北京。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历时3个半小时的会晤。这是1965年2月至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20余年间两国政府首脑所进行的仅有的一次会晤。中苏之间的紧张气氛一时有所缓解。

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晤，完全出乎美国人意料之外。尼克松马上召见基辛格。讨论的结果，两人都认为应当加快同中国和解的步伐，以争得战略上的主动。但是，中美接触只有通过大使级会谈这唯一的直接渠道，并且会谈已中断2年之久。于是，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催促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以便建立联系，尽快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由此演出了一幕美国外交官在华沙猛追中国外交官，中国外交

官避之不及的外交趣闻。后来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基辛格说，华沙那一幕差点没让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虽然不敢与美国人接触，但是外交官的职业敏感告诉他此事意义重大。他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国内，此时，中国领导人又先后收到美国方面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的信息。12月6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2名因游艇误入中国海面已被拘捕数月的美国游客。1969年底，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指示雷阳积极与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发生接触。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重开。会谈中，美方代表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商谈。中方代表表示，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以在大使级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级或双方同意的渠道进行。

2月18日，尼克松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在中美大使级第136次会谈中，中方代表则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中美和解的前途似乎由此“柳暗花明”。3月和4月间，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进一步放宽。

但是，历史风云的变幻是那样令人眼花缭乱，意想不及。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庄严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武装侵入柬埔寨的罪恶行径。声明的最后，毛泽东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中美大使级会谈遂告中断。

1970年6月，美军撤出柬埔寨。美国再次向中国发出愿意打破僵局的信号，要求恢复中美联系。作为回应，7月10日，中国专政机关提前释放了于1958年10月被捕的美国间谍，天主教主教詹姆士·华理柱。中美之间的“小步舞”又重新活跃起来。9月，尼克松接见《时代》周刊记者时明确表示：“如果我有生之年有什么事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10月，借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不少政府首脑赴美之际，尼克松特意接见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请求他们为中美建立联系牵线搭桥。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国宴的祝酒辞中，尼克松再次重申美国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良好关系，第一次正式使用新中国的正式名称。

中国也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信号。10月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并与他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第二天，斯诺面带微笑和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不寻常的姿态意在向美国表明：中美关系的演变已经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高度重视。正如斯诺本人所说：“中国领导人从不公开做无目的的事。”11月和12月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客人，通过他们了解，美国政府的一些新建议，并请他们转达中国决定缓和中美关系的信息。周恩来还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转达了中国热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台湾问题的信件。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斯诺，明确表示：“如果

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还表示：“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精神被一直下达到农村大队党支部，为中美关系解冻“转弯子”，作舆论准备。

中美和解的实现总是那样的一波三折，步履维艰。正当毛泽东明确表态愿意在北京接待尼克松，中美之间通过“罗马尼亚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频繁地传递口信之机，又出现了美国加强在越南战场上的攻势的事变。中国方面迅速作出反应，严厉谴责美国侵略印度支那3国的新罪行。3月5日至8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印度支那3国人民抗美斗争的原则立场。

尽管中美两国在唇枪舌战，但双方的政策面貌却不会由此而改变。在另一层面，中美之间的外交“小步舞”仍在不停地行进着。3月间，周恩来接见日本前外相藤山爱一郎时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引人注目地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大陆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至此，中美之间的外交“小步舞”已跳了2年之久。量变只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中美关系解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下一步需要的是一方或双方果断决策，大胆行动，推动中美关系历史性转变时刻的到来。

乒乓珠把基辛格打到了北京

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决定派队参加。这是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派团参加世界性比赛。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乒乓球赴日参赛，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事无巨细，关怀备至。他特别关照代表团应把此次参赛作为恢复对外联系，争取友谊的机会，并亲自规定了万一与美国队接触时应持的态度和原则。3月21日下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启程，揭开了世界外交史上的创举——“乒乓外交”的序幕。

不出周恩来所料，参赛的美国乒乓球队主动和中国乒乓球队接触，表示愿意访华。中国乒乓球队迅速报告国内，经毛泽东批准，4月7日，中国方面正式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邀请的对象不仅包括美国乒乓球队全体球员，还包括其领队及随团记者。在解冻中美关系的关键步骤上，中国就这样先以民间往来的形式主动地走了一大步，打了一个漂亮的“政治抽球”。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震动了世界，其新闻价值超过了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24大的分量。一时之间，世界各大报纸都在其最显著版面以最快的速度予以报道评论。当然，最感惊讶的是远在大洋彼岸，正在为接近中国绞尽脑汁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惊喜之余，尼克松叹道：“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华盛顿高层决策者马上得出结论：中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一个充满含义的微妙示意。它绝不是一段孤立的插曲，而是盼望已久的重大外交进程的开端。

4月14日，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两国贸易的禁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欢迎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周恩来在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谈话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周总理请他们回去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美国代表团成员也即席发言，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好客，并回邀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美国方面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立即同意。

“小球推动了大球”，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由此迅速活跃起来。

4月21日，中国通过沉默几个月之久的“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发出了一个重要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两国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方能找到办法。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美国方面马上作出答复。尼克松总统表示他本人准备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并建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中国方面同意这一建议，并于5月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中美会谈的对策。5月29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国方面以周恩来名义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复了一封尼克松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信中详尽地讨论了邀请尼克松及基辛格访华的具体安排。6月4日，尼克松致信北京，感谢周恩来总理欢迎他访华，

并说“由于时间短促，以及为基辛格博士找个合适的借口”，“建议基辛格博士于7月9日到达中国，于7月17日离开，他将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北京”。6月11日，周恩来回信同意。至此，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航线即将开通。

基辛格为这次中国之行作了精心安排和充分准备，并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几百年前的中国旅行之名，把这次戏剧性的行动代号名为“波罗一号”。1971年6月30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在他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个简短的公告，说尼克松将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前往越南南方执行一次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将去巴黎与布鲁斯大使进行磋商。在基辛格前往巴黎途中，他将到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一系列的访问与会谈。

7月8日，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当晚，基辛格突然宣布生病，肚痛不止，由叶海亚总统当面邀请他“去山间别墅休息”，避开新闻界的追踪。7月9日中午，载乘着基辛格的飞机降落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官员黄华、韩叙、熊向晖等到机场迎接。同机到达的还有先期到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来华的章文晋、唐闻生、王海容等人。

与此同时，在伊斯兰堡，为基辛格打掩护的伪装行动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基辛格“病情”尚未好转，需要多休息1天！一切安排，天衣无缝。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的48个小时里，同周恩来总理商谈达17个小时，第一次会议是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这次会谈中，两个世界外交巨擘避开了中美双边关系的棘手问题，集中讨论了一些基本点：各自对全球特别是亚、非的看法；双方的外交目标和两国利益的能接近之点；能够使双方获益的世界形势问题，等等。双方商定在巴黎继续保持美中高级联系。会谈中，周恩来寓论辩于说理之中，强调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必须放弃对中国这一内政的干预，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还批评了美国所谓“体面撤出越南”的论调，强调美国只有彻底、干净地放弃对越南的武装干涉，尊重越南人民自己的历史选择，才能真正体面地和光荣地结束越南战争。

会谈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

就在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的前3天，尼克松觉得有必要事先阐明中国接近的理由。于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并且正在上升的世界大国加以接受的明显意图，通过尼克松的一篇重要讲话表示了出来。

7月6日，尼克松飞往堪萨斯城，向一大批代表中西部11个州的新闻机构负责人发表了他的著名的“5极世界”的讲话。尼克松在讲话中认为，在今后5年、10年或许是15年的时候，将会出现“5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5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的经济前途，而且由于经济力量成为其它力量的关键因素，这5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在其它方面的前途”。由于中国蕴藏的巨大潜力，尼克松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尼克松还很含蓄地暗示：“由于双方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因而还必须很明确、很审慎地采取另外一些步骤。”

由于中美接触一直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尼克松的讲话在堪萨斯城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北京它却受到极大的注意。尼克松在堪萨斯城话音刚落，讲话全文就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周恩来的手中。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周恩来还特意发表了他对尼克松讲话的看法，这使基辛格大吃一惊。因为，基辛格对此事一无所知！周恩来见此情形，微微一笑。第二天一早，周恩来作过记号的尼克松讲话被送到基辛格手中。

随着两位国务活动大师外交艺术的施展，会谈气氛逐渐活跃起来。用基辛格的话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会谈中，基辛格渐渐为周恩来迷人的政治魅力所倾倒。他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双方经过几个回合争辩交锋，各自对对方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但是，尼克松访华之事究竟如何定夺，基辛格这次访华的联合公告如何措词，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任何其它重大决策一样，只有请示毛泽东后，才能有最后结论。

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两轮会谈情况的汇报后，批准了联合公告的基本草案。毛泽东还表示，台湾问题并不重要，国际局势才是重要的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纲举目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也由此进入了最后阶段——有关尼克松访华细节安排的讨论。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尼克松访华可以在1972年5月以前进行。双方商定，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

7月11日，基辛格一行兴高采烈地飞回巴基斯坦。除了带回即将震动世界的那份联合公告外，飞机上装载了中国人送的中国菜、毛泽东著作英文版及这次访问的照相集锦。

基辛格以十分激动兴奋的心情向尼克松报告了他的这次“探险似地秘密飞行”的基本总结：

“我们已经为你和毛翻过历史的一页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我们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在最高级会谈以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和其它重大问题上将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不可调和的敌人。据我看来，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同时，他们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安全感，这使他们在自己原则的范围内能够细致地、万无一失地同旁人打交道……”

“我们的交往，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别人，都需要讲求信用、准确和策略。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些，我们就是进行了一场革命。”

历史性握手之前

中美《公告》宣布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对于尼克松本人来说，这一首创性的行动无疑提高了他在国内外的声望，并且为他作为“缔造一代和平”的总统争取连选连任创造了有利条件。基辛格也曾沾沾自喜地写道：“以合乎人情的条件戏剧性结束同这个伟大人民（中国）的隔绝，以及这件事对全世界和平前景的含义，将会像是吹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并且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所能完成的事情。这样做还会向我们自己以及别人证明，我们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能够大胆而技巧地采取行动，以促进我们的目标和一切依赖我们的人们的福利。”但是，这一重大行动所引起美国国民的期望和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在无形中也给尼克松和基辛格增加了沉重的压力。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不能使这次旅行毫无实际效果，惹世人耻笑。这就使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能够敦促美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较为合理的立场，同时也迫使美国总统在讨价还价方面不可能有太大的回旋余地。

谙熟外交谈判技巧和规律的周恩来总理对于美国领导人的这一心理是有精确把握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1971年8月5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和夫人，谈话长达5个小时。借此机会，周恩来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对于中美最高级会晤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所要采取的立场和基本要求。谈话记录由周恩来亲自审核并同意《纽约时报》予以发表。对于尼克松总统的即将来访，周恩来表示了谨慎的欢迎，并且认为这是逐步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他说，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封锁了20多年了，觉得要来看一看，也很好嘛。我们也愿谈。当然毫无疑问，双方在好多问题上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都能统统解决，但是通过接触，就会找到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周恩来还赞扬了尼克松总统的远见和魄力。

关于中美会谈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首先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因为那里在打仗。他以戴高乐从阿尔及利亚撤兵得到世界称赞为例，希望尼克松尽快作出从越南全部撤兵的决定。

在中美之间巨大障碍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他言辞锋利地说：台湾是谁去占领的呢？如果要改变，就应当照中国这么一句俗话去做，“解铃还需系铃人”。至于中国在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明确表示：凡是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类似这样荒唐的行动，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搞所谓台湾独立，我们坚决反对，也决不进联合国。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世界是在起变化，但这种变化总不能使中国人民再受损失。过去20几年不是我们使别人受损失，而是美国政府使别的国家、别的人民受损失。我们等了20几年，再等1年也无所谓，但总要有个公正的办法解决问题嘛。

周恩来还认为，尼克松主义鼓励美国的盟国在太平洋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尼克松本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之间，有一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抬头以及日本对台湾和朝鲜的野心。周恩来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但周恩来又说，如果局势真正走向和缓，如果日本放弃对朝鲜和中国台湾的侵略野心，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

础上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的这段谈话反映了一个时期内中国对日本的基本看法和政策。关于国际战略大格局问题，周恩来认为，首要的是要反对苏联的军事扩张。在周恩来看来，当美国正在实行战略退却的时候，苏联却在走美国过去的老路，并由此构成了对中国和世界和平的更大威胁，在对付苏联方面，中美两国显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与此相关，周恩来还阐述了中国在核武器和战备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周恩来同赖斯顿的谈话首先在美国引起轰动。尼克松对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极为重视，还在《纽约时报》发表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并仔细推敲了谈话的内容。为了慎重起见，白宫对中国总理所表明的立场未做任何评论。但是，毫无疑问，华盛顿的高层决策者们都陷入了沉思。9月，在中国又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变——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得发紫的副统帅林彪突然垮台。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中美两国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的具体安排与讨论仍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按照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双方的商定，中美两国在巴黎通过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的直接联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联系和沟通的外交渠道。通过这条渠道，双方频繁接触，广泛地讨论了有关双边关系和其它国际问题。经过多次磋商，基辛格于1971年10月20日公开来华，商定尼克松访华的具体日期和公报草案。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来华在中国逗留期间，一个和中美关系松动有直接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了。

新华社1971年10月26日讯：联合国第26届会议10月25日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联合向大会提出的提案。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曲折斗争，中美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的争斗以中国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

饶有意味的是，就在联合国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表决结果刚刚揭晓之际，已经知道表决结果的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和还蒙在鼓里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开了个不大不小的政治玩笑。在送别基辛格去机场的路上，乔冠华问基辛格对联大表决结果有何预测，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很遗憾，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明年还差不多。而当基辛格乘坐的飞机一飞离北京，译电员就送给基辛格联大表决的结果。“无可奈何花落去”，基辛格哀叹道：“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干涉世界事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比华盛顿政府更伤心的是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据台湾最后一位“驻美大使”沈剑虹回忆：“我在华府担任大使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督促美国政府在为确保我国联合国席位政策上，继续采取坚定立场。”但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毕竟不以华盛顿政府的意志为转移，20多年来美国为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机关算尽，终于到了山穷水尽，无力回天的地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台湾当局呼天不应，求地不灵，只好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聊以自慰，接受永远开除出联合国的现实。

1971年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从那时起，在联合国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讲坛上，有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出的声音。

一系列的事变并没有影响中美接近的既定步伐。基辛格中期访华期间，

双方迅速就尼克松总统访华具体日期和联合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1972年1月，由基辛格副手黑格将军率领的美国使团到达北京，这个庞大的技术小组为最高级会谈进行了最后的物质和技术准备。尼克松本人不但请了一些著名的中国通到白宫向他介绍中国及中国领导人的情况，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而且熟记了不少毛主席的诗词，甚至还学会了用筷子进餐。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尼克松总统静候2月17日乘“76年精神号”专机来华。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中国方面也作了细致周到的准备。考虑到中美两国敌对多年，尚无外交关系，而尼克松又是以国家元首来访，周恩来确定给予有礼貌的接待。他规定对美国客人的接待要依据“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方针，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在北京检阅三军仪仗队，军乐队，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不搞群众欢迎，只由周总理自己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姬鹏飞、郭沫若等人前往迎接。在会谈方面，周总理也确立了一系列原则、方针。他决定把会谈分成4个层次：一是毛泽东主席同尼克松会见；二是周总理本人同尼克松会谈；三是姬鹏飞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四是全体会议。在其它活动安排上，则根据客人的不同情况做了多套准备，供他们选择。为了创造一个与迎宾相适应的环境和气氛，周总理还布置客人拟去的各地方抹去了街上的一些宣传标语，恢复了店铺的老字号名称。周恩来总理还对在宴会上将要演奏的中美两国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选择，并亲自抓紧对管弦乐队的演奏集训。

毛泽东和尼克松“吹哲学”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的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飞机前面。这一天，天气严寒，冷风刺骨。他引用了乘“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第一批人在月球纪念碑上留下的话：“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以此作为他访华旅行的先声。

2月21日上午9时，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用餐后，即由专程前往迎接的乔冠华、章文晋、姬鹏飞、王海容等陪同，于上午11时30分到达北京。

抵达北京机场时，尼克松刻意要在这举世瞩目之时，纠正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并略为修补美国过去对中国造成的伤害，特安排在他同周恩来握手前，随行人员暂缓下机。此事虽已通知，但他又不放心，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机舱口，以防其它人员紧随其后，当他和他的夫人快步走到舷梯尽头时，就在掌声中他急忙伸手向周恩来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情握手。摄影师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时刻，快速摄下了尼克松和周恩来将要握手的瞬间。尼克松事后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其它美国客人鱼贯下机，周恩来总理将前往欢迎的中方人员向他们逐一作了介绍。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周恩来在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后，两人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牌轿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离开机场时，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车到钓鱼台18号楼前停下，邓颖超、于立群站在楼前迎接，客厅待茶时，周总理一一同美国客人打了招呼，然后请尼克松和罗杰斯到各自下榻处休息。

基辛格在飞往北京途中就向乔冠华表示，他想在午后3时单独会见周恩来总理，商谈活动安排问题。尼克松则表示他要同毛泽东谈哲学问题。客人刚吃完午饭不久，毛泽东突然决定，要立即会见尼克松。尼克松喜出望外，答应立即前往。2点40分，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唐闻生（翻译）、王海容（记录）；美方在场的只有基辛格和记录洛德。这次会见因毛泽东大病初愈，只进行了1小时又10分钟即告结束。谈话时间虽短，但谈笑风生，寓意深刻。毛泽东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之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尼克松即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毛主席指着基辛格说：“他是博士，今天主讲是他。”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主席话锋一转，很自然地引出了台湾问题。

然后，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基辛格很得体地称赞了尼克松的大胆决策。

毛主席又幽默地说：基辛格“他不像个特务”。实际上是称赞他秘密访华保密工作做得好。尼克松笑道：“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基辛格忙做解释：“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毛主席问：“是在巴黎吗？”尼克松说：“凡是能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毛主席反问：“这么说，你们的姑娘常被利用啊？”尼克松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周恩来总理点上一句：“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引得宾主哈哈大笑。

说到大选，毛主席表示：“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尼克松说：“这个我懂得，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毛主席爽朗大笑：“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中选择一个好一点的一个。”毛主席大笑：“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政，我比较高兴。”尼克松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左派只能是夸夸其谈，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如此。”

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主席说，是巴基斯坦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们是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的几位总统的。中间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那段时间，你们也没有想通。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少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在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哲学，主要是它对世界其它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接着想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主席打断地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跟你谈的事。”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2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随后毛主席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最后表示，他这次应邀来访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接着尼克松又申明：“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听到译员译出自己的诗句，毛主席露出了笑容，随即指着基辛格说：“只争朝夕就是他。”“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尼克松幽默地接道：“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帮。”毛主席说：“就个人来说，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毛主席又称赞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说：“你读的太多了。”毛主席

说：“读的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然后他又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路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这时双方已经站了起来，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主席未置可否，笑了笑说：“我就不送你了。”毛主席说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尼克松也客气地恭维：“不过你气色很好。”“表面现象是骗人的。”毛主席耸了耸肩说。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评价同毛泽东——这位现代历史上的巨人——的会晤的：

“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略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子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后来，我慢慢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样，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则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把它抓住……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突然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仔细分析一下，在毛泽东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纪录片。一时之间，北京成了全世界瞩目的中心。

周恩来和尼克松“只争朝夕”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周恩来历史地担负起与美国客人一系列会谈的任务。当日晚6时至7时、中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商讨会议办法和公报的形式和内容。会上，周恩来很艺术和自然地解释了毛主席突然会见尼克松和没有让其它美国客人参加的原因。

晚7时，周恩来总理设国宴招待全体美国客人。

作为宴会的主方，周恩来举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辞。他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在答词中用带有理想色彩的语言表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用主义基础。他说：

“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5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公正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双方祝酒后，周恩来举着盛满茅台酒的杯子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团人员逐一敬酒。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悠扬的乐曲徐徐响起来时，在场的美国客人都非常感动。这是一支尼克松最为喜欢，并指定在他就职典礼上演奏的乐曲。但是，现在正演奏这支曲子的军乐队所属的这支军队在20年前曾和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啊！

尼克松在京期间的活动日程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参观中国的古迹名胜，下午会谈，晚上参加宴会和文艺晚会。会谈主要是在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之间进行。正式会谈有5次，其中在北京谈4次，在上海1次。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换了看法。

关于台湾问题，尼克松重申了美国政府的新思考：（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决定在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他强调在政治方面有困难，还不能马上丢掉台湾，希望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

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掉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

他们还就朝鲜、印度、裁军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在谈到美苏军备竞赛问题时，周总理说：“你们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你们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困苦。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就是因为军费太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又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能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由此可见周恩来论断之精辟和风格之高。

会谈气氛自始至终轻松、友好、充满智慧。从个人经历到两国领导人的年龄，从世界大势到人生哲学，尼克松对周恩来思想的高度敏锐，谈判的高超艺术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也对他 70 多岁高龄仍能保持旺盛精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72 年 2 月 28 日上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尼克松和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在另一张谈判桌上

在周恩来同尼克松会谈实质问题的同时，中美之间的另一场会谈也在激烈地进行中。

主谈的双方是中国外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参加会谈的还有中方总理助理熊向晖和美方助理国务卿格林等人。

会谈的气氛并不平静。

罗杰斯首先提出要弄清关系正常化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关系正常化就是改善关系，就是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情况下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姬鹏飞认为不然。他说关系正常化的真正含义，是指建立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关系，走向正常化。

会谈开始后不久，美方就闹出了笑话。美方翻译的上衣口袋突然响出声来，急忙用手去按，没有按住。不久，参加会谈的格林和詹姆斯的口袋里也响了起来。齐格勒急忙递了一个条子给罗杰斯。罗说，拿出来吧，并表白说，这是同总统联系的小电话。实际上是小型录音机发生故障发出的。由于双方事先商定会谈不用录音，只让记录。美方暗作手脚，一时显得十分尴尬。

接着，罗杰斯反复强调双方建立常设机构的必要性，建议互设贸易、旅游等办公处。姬鹏飞表示，不解决台湾问题，两国关系中的其它问题的解决就受影响。在蒋介石集团在美国还有代表的情况下，要我们派人去美国，使我们很为难，就像周恩来总理难于明确回答尼克松对他访美邀请一样。罗杰斯表示可在第三国大使馆内设立专门办公室，并强调建立电话联系十分必要。姬部长表示可以再考虑考虑，看看是否能找到更合适的办法。

关于增进双方在文化、体育、医学等方面进行人员交流问题，姬鹏飞表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可以通过民间机构进行这些交流，双方政府给予协助和方便。当熊向晖询问罗杰斯，美国还要不要入境的人按手印时，新任国务卿罗杰斯表示还不大清楚，马上到另一房间打电话询问后表示，这个规定已经取消。

罗杰斯还说，开展中美贸易的经济意义不大，可有可无，美方并不急于同中国开展贸易，如果中国觉得有利，可以搞一点。姬鹏飞则明确指出，贸易是美方上次提出的。我们的政策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美贸易可以不搞，问题是许多美商向中国外贸部门提出了做生意的要求。熊向晖当即报告总理。周总理诘问基辛格，你们说要搞贸易，而你们的国务卿却不感兴趣啊。基辛格经报告尼克松后修正了罗杰斯的观点。在随后的会谈中，罗杰斯本人也做了申辩和解释。他说，美国对开展中美贸易是有兴趣的，对愿同中国做生意的美商，政府将给予便利。在谈到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和双方的原则立场问题时，姬鹏飞外长还批评了罗杰斯“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实体”的说法。

姬、罗会谈还就是否参与公报起草工作产生了分歧。罗杰斯提出，他和姬鹏飞应积极参与公报起草工作，并进行“监督”，因为“政策是要我们执行的”。姬外长则表示，先等乔冠华副部长和基辛格搞出一个草稿再说。

周恩来在得知罗杰斯要参加公报起草工作的汇报后，他同尼克松说，有一个问题要向总统说一下，你们国务卿要参加公报的会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说定了，双方已分别指定乔冠华和基辛格博士负责此事。当时国务卿没有说话呀。尼克松忙做解释说，我想这件事可能有点误解，可能罗杰斯对公报有些想法，他认为可以同你们外交部长谈谈这些想法。我们指定基辛

格谈公报，你们指定乔冠华谈公报，现在还是这样。

看来尼克松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会谈，而国务院的人对此很有意见。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会谈休息时曾向姬外长说：“似乎你们认为只是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而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不愿改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是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

姬、罗会谈也举行了5次。在北京4次，上海1次。

2月27日，周恩来总理特地赶到美国国务院官员们下榻的上海锦江饭店，看望“有情绪”的罗杰斯国务卿及国务院官员们。当他了解到这些美国国务院官员被安排在锦江饭店的13楼层时，他首先向罗杰斯表示了歉意。他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习俗对‘13’的避讳。”中国总理的热情与谦虚使美国外交官员大为感动。周恩来逐一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寒暄，对美国国务院给予中美关系和解所做的贡献大加赞赏。随着周恩来的手掌翻飞，美国国务院官员的“怨气”烟消云散了。

为中美关系发展奠基

基辛格 1971 年 10 月访华期间，双方商谈联合公报问题时，美方按照一般的国际惯例，想搞一个格式老套、粉饰分歧的公报。周恩来总理却别具匠心，主张不搞官样文章，应如实分别写上双方的分歧与共同点，以反映真实情况。经过多次会谈，搞出了一个公报草案。草案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新颖创造。序言概述尼克松总统一行访华情况；第一部分双方各自阐明了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看法；第二部分确定了建立中美两国关系的共同原则；第三部分写明双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 改善双边关系的协议。但当时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以后黑格访华带来的美方方案我方未予接受，所以，此次尼克松亲自来华，商定公报成了一项重大而又复杂的外交使命。

基辛格一到北京，他马上向周恩来说明，美国国务院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方已经起草了整个公报，罗杰斯国务卿也只知道公报草案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两句措词。美方将由他本人负责商谈公报，只有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时，总统才会过问。基辛格还表示，南亚问题因情况变化，需要考虑修改措词，人员来往和贸易问题还需补充，台湾问题也需进一步讨论。基辛格还说、黑格提交的措词，中方可以考虑。对于基辛格这种意欲先发制人，讨价还价的手法，周恩来针锋相对。他表示：“当时我就说，不同意黑格带来的措词，而倾向于我们原来的方案。”当然周恩来也没有把门堵死，他答应在具体商谈中再讨论。

经毛泽东亲自点将，周恩来确定乔冠华、章文晋为中方主谈人，总理助理熊向晖穿插其间，必要时周总理亲自过问。

在尼克松，罗杰斯等人参观游览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两位大辩才躲进了钓鱼台的一幢小楼里，一场艰难而又活泼的语言交锋开始了。

会谈的第一天，2 月 22 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2 月 24 日，乔冠华和基辛格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基辛格凭着哈佛大学教授的资历辩才滔滔，富于哲理；乔冠华思路清晰，反应敏锐，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40 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可以说对美国人的谈判方式轻车熟路，了如指掌。数月之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 26 届联合国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世界各国代表的众目睽睽之下敞怀朗笑，一展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

乔冠华首先口头谈了我方的方案。随后对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作了评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词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词的含意显然不同。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词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

中美双方的声明吗？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军应该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词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削减”，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并问美方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黑格交来的措词中这一点没有讲清楚，而且还与其它书情交织在一起。人们会说美国把台湾问题当作一张牌。基辛格提到，将来如美国国会问到中方在公报中不提“条约义务”（即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有关规定）一事，难以照乔冠华所说的解释。乔冠华立即说，如美方不领情，现在马上可以加上这一内容。基辛格表示不要加，并说如果找不到双方满意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答，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也行嘛。基辛格终于显得有些紧张，但马上又改口说，应做积极努力。

尽管原定2月26日飞往杭州，27日在上海发表公报，但25日的乔、基会谈仍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双方仍然各执己见、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其实，这都是在用同样的外交谈判手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的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包括在一个句子里。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提前提。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而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基辛格也同意了，并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吧。”

周恩来对乔冠华和基辛格之争做了最后的裁决。周恩来劝解基辛格说：“反正双方已经接近了嘛，我们已经报告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来表达。”基辛格也马上说：“我们十分欣赏总理和副外长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周总理又说：“关于‘人民要革命’的问题，还是这样吧，反正这是我们方面的立场嘛。另外我们还有4点共同点准备去实行，这是重要的。”基辛格说：“对，那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这样。”

当日晚10点半钟，乔冠华和基辛格再次会晤。谈判终于进行得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的最后措词。行文如下——“双方回顾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台湾问题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接着，乔冠华和基辛格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字逐句研究了一遍。2月26日凌晨，公报全文终于落实。如释重负的

兴奋感使两人忘却了几天几夜的劳累困顿，两只大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在飞机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刚结束。

意想下到的是，到达杭州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他交给尼克松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拟改之处竟达15处之多。

基辛格把国务院的意见转告乔冠华，并要求重新讨论。乔冠华向周恩来总理作了请示。

周恩来当即通过直通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略作思索，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转告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稍做停顿，又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到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乔冠华与基辛格在杭州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时，最后一个公报草案终于完成，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等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2月27日，在由杭州至上海的飞机上、公报终于定稿。

2月27日下午5时，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讲话。由于当时两国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同一地点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美国“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些形式主义的说明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不可估量的含义。”

震后的余波

2月27日晚，中国方面在上海为尼克松一行举行最后的送别宴会，此时此刻，紧张和疲劳已因为成功的辉煌而烟消云散，中外宾客开怀畅饮。兴高采烈的尼克松总统即席祝酒，为他们这次北京之行作结。他预言：“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以后的几年内要做的事那么重要。”酒兴所致，尼克松紧接着说：“上海这个城市，曾经饱受外国侵占之苦，我们再也不允许上海，及全中国以及全世界所有像上海一样的城市，再受外国侵言之苦了。我们绝不答应！”

此语一出，引起基辛格一阵恐慌。因为他知道，这种“救世主”式的一厢情愿的热情，中国人十分反感。基辛格联想起黑格访华时的一件往事：

1972年1月3日黑格访华为尼克松总统北京之行打前站。在他和周恩来谈话时，黑格说，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有共同点，对于黑格说的“生存能力”（Viability）一词，周恩来大感不悦，并提出质问。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好的几份材料，义正辞严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请问，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您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一席话说得黑格满脸通红，道歉

不迭。

但今天，基辛格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周恩来似乎并不计较美国总统因大功告成而兴奋脱口的即兴之语，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见此，基辛格长出一口气，可尼克松总统的兴致却是越来越高，他继续说道：

“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这句话太出格了，这简直是在鼓吹“中美”联合“主宰”世界嘛！要是往常，敏感的记者们会马上抓住话柄大作文章，但茅台酒麻醉了大家的神经，谁也不会在这欢快的气氛中去挑三拣四。大家只是一个劲地鼓掌，欢度这场双方都认为是胜利了的美好时光。

“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最后，尼克松豪情满怀地为这次中国之行作结：“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默默地望着，当全场鼓掌时，他也随着拍了两下。

当晚 11 时到次日零时，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最后一次会晤，讨论了越南问题的解决步骤。2 月 28 日一早，在周恩来总理欢送下、尼克松登上了返回美国的专机。

轻松和兴奋的情绪过去了，一丝忧虑涌上尼克松的心头，多年来的国际事务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成功似乎比失败更使他感到不安。他担心自己的果断行为不能得到美国公众的充分评价。随着飞机距美国上空的距离的逐步接近，尼克松心中的这种隐忧便显得更加沉重。

就在尼克松返美的当天，全美很有影响的《华盛顿邮报》评价了总统的这次中国之行：

“尼克松总统答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第一次保证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总统所作的这些重大让步看来换回了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同意对美中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便利’。”

“这里的许多观察家在权衡总统所做的让步时，感到中国人在这场交易中占了便宜……看来，中国官员对这次讨论的结果感到高兴。”

2 月 28 日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上的标题新闻则说得更干脆：“他们得到台湾，我们得到蛋卷儿。”

不过这类消极报道终究还是被尼克松访华的有目共睹的成功影响所淹没，电视图像压倒了印刷文字，公众在看了自己的总统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场面以后，“便都压抑不住对中国人的感情冲动”。中国之行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最终得到美国两大政党和公众的一致称赞。

和美国国内的情况相对照，中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静。当有记者对周恩来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总理的一大杰作时，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这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而毛泽东的看法则是：“哦？！是他（指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中美关系解冻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国际社会把尼克松北京之行称之为“尼克松冲击”。这一“冲击”之下，苏联、日本、西欧以及亚洲各国纷纷做出反应，国际舞台一时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

而对尼克松本人来说，北京之行给他留下了两个最鲜明的印象。除了对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的惊叹外，另一个——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纪律而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世界历史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张保军）

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多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首次访华纪实

尼克松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毛还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自基辛格秘密访华同我国商定的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中美双方对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访问都做了充分准备。尼克松为确保访问成功，1971年10月，又派基辛格公开来华，商谈他访华的具体日期和公报草案；翌年1月，又派黑格率先遣组来华，商谈他的活动安排和电视转播等事务。尼克松本人不但请了一些著名的“中国通”给他介绍情况，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而且熟记了不少毛主席的诗词，甚至还学会了用筷子进餐。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于2月17日乘“七六年精神号”专机来华。

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我方也作了细致周到的准备。当时两国因敌对多年，尚无外交关系，而尼克松又以国家无首身份来访。考虑这种实情，我方在礼遇上选择了“以礼相待，下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方针，决定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在北京检阅三军仪仗队、军乐队，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不搞群众欢迎，只由周总理等领导人前往迎送。在会谈方面也确立了一系列原则、方针。周总理还把会谈分成四个层次：一是毛主席同尼克松会见，二是周总理同尼克松会谈，三是姬鹏飞外长同罗杰斯会谈，四是全体会议。在其他活动安排上则根据客人的不同情况做了多套准备，供他们选择。为了创造一个与迎宾相适应的环境和气氛，周总理还布置客人拟去的各地方刷去了街上的一些标语，恢复了店铺的老字号名称，甚至对在宴会上要演奏的中美两国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选择。

尼克松同周总理历史性握手

2月21日上午9时，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用餐后，即由专程前往迎接的乔冠华、章文晋、王海容等陪同，于上午11时30分到达北京。周恩来、郭沫若、李先念、时剑英、吴德、姬鹏飞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约百人前往欢迎。

抵达北京机场时，尼克松刻意要在这一举世瞩目之时，纠正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失礼行为，特安排在他同周总理握手前，随行人员暂缓下机。此事虽已事先通知，但他不放心，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机舱口，以防其他人员紧随其后。当他和他的夫人快步走到舷梯的尽头时，就在掌声中他急忙伸手向周总理走去、主动同周总理热情握手。这一历史性场面被摄影师一一摄入镜头。尼克松事后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随后，其他美国客人开始鱼贯下机，周总理将前往欢迎的中方人员向他们逐一作了介绍。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后，两人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轿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在离开机场时，周总理寓意深长地对尼克松表示：“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呵。”

车到钓鱼台18号楼下车，邓颖超、于立群站在楼前迎接。在客厅待茶时，周总理一一同美国客人打了招呼，然后让尼克松和罗杰斯到各自的下榻处休息。

毛主席同尼克松突然会见

基辛格在飞往北京的旅途中就向乔冠华表示，他想在午后3时单独会见周总理，谈谈活动安排问题。尼克松表示他要同毛主席谈哲学问题。在客人刚吃完午饭不久，毛主席突然决定，要立即会见尼克松。下午2时许，周总理急忙亲自找基辛格说，毛主席想很快见到尼克松总统，并问美方谁一同去。基辛格答，他去，让洛德去作记录。基辛格报告尼克松后，即去中南海。

2时40分，毛主席在他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翻译唐闻生、记录王海容；美方在场的，有基辛格和记录洛德。这次会见因毛主席大病初愈，时间不长，到下午3时50时即结束。谈话时间虽短，但谈笑风生，寓意深刻。毛主席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于在哲学方面。”尼克松即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毛主席指着基辛格说：“他是博士，今天主讲要看他。”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委员长，他下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主席话锋一转，很自然地引出了台湾问题。

然后，毛主席又转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震动了。”基辛格很得体地称赞了尼克松的大胆决策。毛主席又幽默地说基辛格：“他不像个特务。”实际是称赞他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尼克松笑道：“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基辛格忙解释：“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毛主席问：“是在巴黎吗？”尼克松又说：“凡是能用漂亮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毛主席反问：“这么说、你们的姑娘常被利用啊？”尼克松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周总理点上一句：“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大选的话题，毛主席说：“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打交道。”尼克松说：“这个我们懂得，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毛主席爽朗地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毛主席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尼克松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随后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主席说：“是巴基斯坦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们是不大喜欢从社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总统。美国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在那段时间，你们也没有想通。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少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哲学，主

要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想接着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主席打断他的话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随后毛主席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这时，尼克松又说，他这次应邀来访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作出这个决走实属不易。他还表示：他读过毛主席的一些著作，懂得“只争朝夕”。毛主席指着基辛格说：“只争朝夕就是他”。“大概我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套。”尼克松微笑着说：“就是像我这样人，还有匪徒。”毛主席说：“就个人来说，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最后，毛主席也称赞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说：“你读的太多了。”毛主席说：“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然后他又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了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是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这时双方已经站了起来，尼克松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主席对尼克松这句话未置可否，只说：“我就不送你了。”

嗣后，基辛格单独与周总理商定了会谈安排和发布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的消息问题。6至7时举行双方全体会议，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的形式与内容。会上，周总理很艺术和自然地解释了毛主席突然会见和没有让其他美国客人参加的原因。

晚7时周总理设国宴招待全体美国客人。席间军乐队演奏了中美两国民歌，尼克松听到演奏《美丽的亚美尼加》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并指定在就任总统典礼上演奏的乐曲。敬酒时，他特地到乐队前表示感谢，并要给他们发奖。

周总理同尼克松会谈

尼克松在京期间，上午安排参观，下午会谈，晚上参加宴会和文艺晚会。周总理同他谈了5次、在北京谈4次，在上海谈1次。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而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尼克松先从台湾问题谈起，重申了他处理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决定在四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他强调在政治方面有困难，还不能马上丢掉台湾，希望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总理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

他们还就朝鲜、印度、裁军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周总理就美苏军备竞赛高瞻远瞩地说：“你们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你们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困难。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就是因为军费太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可见周总理论断之精辟和风格之高。

1972年2月28日上午，周总理问尼克松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

姬鹏飞同罗杰斯谈双边关系

在周总理同尼克松会谈实质问题的同时，姬鹏飞外长同罗杰斯国务卿也举行5次会谈，北京谈4次，上海谈1次。中方有总理助理熊向晖等参加，美方有助理国务卿格林等参加。

罗杰斯首先提出要弄清关系正常化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关系正常化就是改善关系，就是在没有外交关系情况下改善关系。姬鹏飞则说，关系正常化是指建立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关系，走向正常化。

会谈开始不久，美方就闹了一个笑话。美方翻译的上衣口袋里突然响出声来、急忙用手去按，但没按住。不久，詹姆斯和格林的口袋里也响了起来。齐格勒递了一个条子给罗杰斯。罗即说，拿出来吧。并表白说，这是同总统联系的小电话。实际上是小型录音机发生故障响了起来。因为双方原来商定会谈不用录音，只让记录。美方暗中使用录音机的行为暴露，显得十分尴尬。

接着，罗杰斯反复强调建立常设联系机构的必要性，建议互设贸易、旅游等办公处。姬部长表示，台湾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受影响。蒋介石集团在美国还有代表的情况下，要我们派人去美国，就使我们为难。罗杰斯又表示可在第三国大使馆内设办公室，并强调建立电话联系也很必要。姬部长不把门关死，说可以再考虑考虑，看看能否找到什么办法。

罗杰斯还提出，增进来往可能是最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可以在文化、体育、医学等方面进行人员交流，并具体建议互派杂技、篮球、田径、体操、游泳、医生等团、队访问。姬部长表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前，这种交流只能通过民间机构，双方政府给予协助和方便。熊向晖询问罗杰斯，美国还要不要入境的人按手印。罗杰斯新任国务卿，不太熟悉，马上到另一房间打电话询问后回来说，这个规定已取消了。中国访美人员不需要按手印。

罗杰斯还说，中美开展贸易的经济意义不大，可有可无。

美方并不急于同中国开展贸易，如果中国觉得有利，可以搞一点。姬部长明确指出，贸易是美方上次提出的。我们的政策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美贸易可以不搞，问题是许多美国商人向中国外贸部门提出了做生意的要求。熊向晖当即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即问基辛格，你们说要搞贸易，而你们的国务卿却不感兴趣啊。基辛格听了很生气，马上冲出去，报告了尼克松。

翌日会谈时，罗杰斯首先解释说，关于中美贸易问题，昨天他所说的话可能引起误会，他愿加以澄清。他说，美国对开展中美贸易是有兴趣的，如果中国也有兴趣的话。对愿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美国将给予便利。以后姬部长又说明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和中方的原则立场。罗杰斯也谈了美方的立场和愿望。但他一边谈美国没有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而又说大陆与台湾是两个“实体”。对此姬部长再次重申了我方的立场。

罗杰斯还突然提出，他和姬部长应积极参与公报起草工作，并进行“监督”，因为“政策是要我们执行的。”姬部长表示，先等乔冠华副部长和基辛格博士搞出一个草稿再说。

周总理得知罗杰斯要参加起草公报工作的汇报后，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说，有一个问题要向总统说一下，你们国务卿要参加公报的会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已说定了，双方已分别指定乔冠华和基辛格博士负责此事。当时国务卿没有说话呀。尼克松解释说，我想这事可能有点误解，可能罗杰斯对公报有些想法，他认为可以同你们外长谈谈这些想法。我们指定基辛格

谈公报，你们指定乔冠华谈公报，现在还是这样。

看来尼克松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会谈。而国务院的人对此很有意见。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会谈休息时就向姬部长说过：“似乎你们认为只是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而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不愿改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是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

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商谈经过

基辛格 1971 年 10 月访华期间，双方商谈联合公报问题时，美方想搞一个老套格式、粉饰一致的公报。周总理主张不搞官样文件，应如实分别写上双方的分歧和共同点，以反映真实情况。经过多次会谈，搞出一个公报草案。这个草案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新颖创造。序言概述了尼克松总统一行访华情况；第一部分双方各自阐明了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第二部分确定了建立中美两国关系的共同原则；第三部分写明了双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协议。但当时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以后黑格带来的方案我方也未接受，所以留待这次继续商谈。

这次基辛格一来，就向周总理说明，国务院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方已经起草了整个公报，罗杰斯也只知公报草案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两句措词。美方将由他本人负责商谈公报，只有涉及大的原则问题时，总统才会过问。还说，南亚问题因情况变化，需要考虑修改措词，人员来往和贸易问题还需补充，台湾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讨论。还说黑格提交的措词中方表示可以考虑。意欲先发制人，肯定他们的方案。周总理当即指出：“当时我就说，不同意黑格带来的措词，而倾向于我们原来的方案。如何办当然还可考虑。”周总理指定由乔冠华、章文晋负责谈，熊向晖在参加两国外长会谈之余，有空也参与，必要时周总理亲自过问。

2 月 23 日上午，基辛格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24 日上午乔冠华口头谈了我方的方案。随后对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作了评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词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词的含意显然不同。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人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词则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声明吗？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军应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词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削减”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并问美国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黑格交来的措词中这一点也没讲清楚。而且还与其他事情交织在一起。人们会说美国把台湾问题当作一张牌。基辛格提到，将来如美国国会问到中方在公报中不提“条约义务”（即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有关规定）一事，难以照乔冠华所说的解释。乔冠华立即说，如美方不领情，现在马上可以加上这一内容。基辛格表示不要加，并说如果找不到双方满意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答，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也行嘛。基辛格显得有些紧张地说，有此可能，但又马上改口说，应作积极努力。

2 月 25 日下午，基辛格同周总理单独谈话提出公报中关于台湾那段措词。周总理劝解说：“反正双方已经接近了嘛，我们已经报告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即说：“我们十分欣赏总理和副外长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周总理又说：“关于‘人民要革命’的问题，还是这样吧，反正这是我们方面的立场嘛。另外我们还有四点共同点准备去实行，这是重要的。”基辛格说：“对，那是次要的问题，可以那样。”

2月27日，在由杭州去上海的飞机上，公报终于定稿。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改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另对反对霸权主义一条中，把“双方”改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最后在公报中还加入了双边贸易问题，并“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2月27日下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联合公报（或称“上海公报”）发表讲话，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和强烈震动。当天晚上为尼克松等送行的宴会上，尼克松心情舒畅，开怀畅饮，即席讲话中说他“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今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把世界的前途掌握在我们手里”。在场的外国记者没有留意尼克松的上述讲话，未作报道。尼克松说他“访华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虽属酒后之言，但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确实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

（郑谦）

“要把校办工厂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课堂，斗私批修的战场，锤炼忠于毛主席红心的熔炉。”——“文革”中的“教育革命”

三结合的领导体制·三结合的教学体制·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辽宁一个下乡知青因为高考交了“白卷”竟成了“反潮流”的英雄。

“教育革命”或“教育改革”，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中，第十条即为“教学改革”。其具体内容为：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样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这段文字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尽管以后的实践多方面超出了它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度。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提出：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回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文化大革命”中，类似的社论、文章、文件、讲话很多，这些文字与当时的实践一起，使人们对“教育革命”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虽然在1966年就已被提出，但直到1967年间才有一些零星的、时断时续的试验。在1969年至1971年间的斗、批、改运动中，“教育革命”在全国各地广泛，深入地展开，并达到高潮。1972年至1973年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清理中，教育工作中一些“左”的和极左的观点、做法受到遏制和批判，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教育观点和方法被提出、推广，受到普遍的支持和欢迎。在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左”的和极左的思潮再次泛滥。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一样，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转机 and 进步。但是，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旋即被1975年底至1976年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中断，教育领域重新陷入一片沉闷，紧张和荒谬的局面之中。

1969年至1971年间，处于高潮阶段的“教育革命”，涉及到教育领域里诸如领导体制、教学体制、专业设置、学校布局。教材教法，师资队伍，学生组织等所有方面，以其典型的形式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内涵与核心。它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出在经历了“大破”、“大乱”之后，“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阶段所要“大立”的理想社会的某些一般特征。同时，它也暴露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党分子以极左面目出

现，打着“教育革命”的幌子，推行极左路线，迫害知识分子，打击一大批学校管理干部，毁灭中国教育的种种罪行；反映了党内外建摩力量在困难的环境中，顽强地抵制极左思潮、纠正“左”倾错误的种种努力，正是这种努力，大大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教育工作的破坏。

对学校领导体制。教学体制和招生制度的“革命”或改革，是这场“教育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了解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场“教育革命”的一般特征和实质。

“三结合”的领导体制

“斗、批、改”运动中的“教育革命”，像当时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一样，也把“领导权”、领导体制的问题放在了第一位。这一问题的提出，除了“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夺权”的一般背景外，也有教育领域中的一些特殊原因。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以及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阶级斗争状况作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他对教育领域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也错误地估计了我国教育界的状况。而正是这样的错误估计和判断，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直接前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别有用心地封锁、歪曲了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科学的意见，利用了他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某些失误，并将这些失误推向极端，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在教育领域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领导权问题，在1966年8月的《十六条》中就已经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很快就因形势的发展而落空。1967年初“复课闹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曾提出“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的问题。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中规定，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这种三结合的提法和体制，一直沿用到1968年上半年，尽管实现这种领导体制的学校并不多，而且大多还都有反复。

自1968年下半年起，学校的领导体制尽管还保留着“三结合”这种外在的形式，但其内容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68年7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地应该依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 据此，继清华大学之后，至8月29日，工宣队进驻了北京地区的全部大专院校。自8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在一些武斗严重的学校，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领导开展革命大批判、

清理阶级队伍，调整或建立革委会、整党建党、“教育革命”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第二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转述了毛泽东新近的一个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文章中，姚文元以毛泽东著作、语录权威诠释者的身份公然歪曲毛泽东的讲话，断定解放以后学校“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文章提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

工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学校的领导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三结合的形式虽然保持不变，但其内容已变为工（军）宣队、革命师生以及革命领导干部，姚文元的文章中称这是“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8月25日的《通告》以及姚文元的文章，实际上改变了派工、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初衷，把它们的任务由短期的、临时的平息武斗、稳定形势、实行大联合，发展为长期的、自始至终地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在这种新的三结合领导体制产生初期，工军宣队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核心领导”的地位。一段时间以后，一些学校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开始进入这个领导核心。

1968年9月初至10月初，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分别批转了北京市革委会与北京卫戍区、上海市革委会的三个报告。报告强调工宣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

“不要陷于事务主义”，“学校日常工作仍由院校革委会去做”。——

根据毛泽东有关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各地贫下中农自8月底起，陆续向农村各类学校派出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社、队革委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师生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组），实行对本社队范围内中小学的管理。贫管会成立后，宣布废除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

1969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吉林省梨树县革委会《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并加编者按，高度评价这个大纲，说它为今后农村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在此之后，该报陆续发表了一些拥护、支持和补充这个《大纲》的文章和来信。黑龙江省庆安县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了《大纲》的做法。这个县提出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三种具体形式：贫下中农代表长期驻在学校里，和教师同上班，同下班，一起研究学校斗、批、改问题；贫下中农代表半个月左右到学校检查一次工作，帮助学校解决重大问题；不进驻代表，由大队革委会（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直接抓，不定期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讨论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等等。总的来说，管理学校的代表以下脱或半脱产为原则，做到有事到校，无事归队，上下结合，保持本色。——

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间，当一些学校还忙于实现“大联合”、清理

阶级队伍或整党建党时，工宣队、贫宣队等发挥了主要的、核心的作用。随着学校革委会的成立，特别是校内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宣传队的核心作用下降了。这种下降的表象的后面，是这种领导体制与领导对象的矛盾。

学校中党组织普遍恢复以后，革委会实际上成为党委（支部）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或办事机构。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内，除了宣传队代表外，还有学校原来领导成员、教师以至学生党员代表。这些人中，起码有一至二人（甚至更多）进入了“核心小组”的圈子，而其中的原校领导则往往成为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这时，虽然有人在私下或潜意识中还希望强调党员出身或职业区分的政治意义、但在当时极左思潮已经有所收敛、退潮的大背景下，在学校教育这个有着特殊规律和要求的小环境中，这些观念所构成的政治压力已大为减轻。虽然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但与运动初期相比，重新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学校知识分子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处境已有所好转。与此同时，宣传队以往那种政治上不容置辩的权威地位也在无形中逐渐下降。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九大以后，报刊文件反复强调的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了。

矛盾还出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虽然“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的说法已在教育界流行多年，但教育科学本身内在的规律和要求却也在时时、处处顽强地表现出来。其结果，不是外行变成内行，就是内行取代外行，否则就是学校工作的停滞或混乱。当“教育革命”全面铺开以后，教师、学校领导干部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等一系列专业性、知识含量高的领域里的优势便逐渐显露出来。这种矛盾的外在表现，一是当时普遍存在的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翘尾巴”的现象，一是工宣队作用的下降。

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章程，是导致宣传队作用下降的又一原因。在学校内部，各地宣传队根据北大、清华等学校的经验，机构设置比较统一，工作方式方法也有一定的章程。但是，在各学校之间，宣传队却往往缺乏统一的、一贯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而随着各地革委会陆续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并开始实施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在这些教育行政领导机构内，要么是没有宣传队，要么有也远不如各学校中那样人数众多、举足轻重。这也就是说，一度在学校中“领导一切”的宣传队，在刚刚恢复的政府机构和党组织中往往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人们由此往往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宣传队不过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如武斗、派性斗争严重），处理一些特殊问题（如制止武斗、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等）的临时性组织。随着学校党组织的恢复和教育革命的展开，宣传队的历史使命已接近于尾声，人为维持的只能是形式。

导致工宣队作用下降的又一原因，来自他们的派出单位。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随着国内形势逐步趋于安定，工业生产、战备工作大规模地、全面地、紧迫地开展起来。不少工厂因任务紧张把派到工宣队的骨干力量抽调回厂，有些工厂把派出工宣队看作是工厂的额外负担，因而派出的人员有不少是刚进厂的青年工人、合同工和老弱病残人员。

由于以上几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1968年下半年确立起来的以宣传队为核心的领导体制，到1969年下半年以后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宣传队在学校中的作用下降，而学校内原领导干部、教师的作用逐渐上升。据1971年初兰州市中小学反映，当时的问题是工宣队的领导普遍削弱，每个学校的工宣队一般只有2至3人，有的只有1人，个别中学还没有工宣队。学校的

党支部成立后，有的人便认为工宣队“可有可无”了，不是领导了，有的学校出现了工宣队“没事干”的现象。在浙江省，有的学校还发生了校革委员会与工宣队发生冲突的事情。

学校领导体制中的这些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教育工作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变化很快就被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成是“右倾回潮”，“否定工人阶级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然而，这些叫嚣并不能阻挡教育领导体制上合规律的发展变化。1970年以后驻学校的工宣队逐渐减少，据1973年10月统计，全国352所高等学校中，还有工宣队员4892人，比1971年7月的12804人减少61.8%，其中87所高等学校已无工宣队，约占当时高校的四分之一。在农村，多数进驻学校的“贫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也已形同虚设，徒具形式。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是各种学校内党组织的逐步恢复和健全。

这一本来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发展过程，受到了“四人帮”的激烈反对和抵制。1973年10月后，迟群等人打着“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旗号，在清华大学发动了对全国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的“反回潮、运动。运动中，“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被列为“回潮”的主要罪状之一。1974年2月之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河北省威县辛店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管理学校的经验，强调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贫下中农对农村学校的管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此前后，《人民日报》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强》为题，《教育革命通讯》以《顶得住、站得牢、管得好》为题，刊登了辛店大队贫管会的这份材料。其中，《教育革命通讯》还在编者按中说：“辛店这些‘大老粗’们，比起某些知识分子高明的地方，就是对孔老二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深恶痛绝。清除其流毒时，痛快淋漓……”1974年3月31日至4月12日，在中共辽宁省委召开的工宣队上作会议上，重点介绍了中共鞍山市委、丹东市委请工宣队给领导机关“吹氧”的经验、即“帮助省文教组、教育局的领导干部提高路线觉悟”的方法。会议指责省教育部门“在批林中为回潮大造舆论”，提出“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的口号是“为回潮鸣锣开道”，等等。因此，“要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宣队的建设”。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批判的反动。运动中，许多批判极左、纠正“左”的错误的思想和实践都受到猛烈的攻击，一些极左思潮的作法又被恢复或部分恢复。1974年6月6日，《光明日报》报道，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普遍加强了驻校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的工作。中共北京市委也向17所高等院校增派了400多名工宣队员，各院系两级领导班子部有工宣队参加。1974年间，北京、上海、辽宁、广西、新疆、山西、内蒙、四川、青海等省、市、自治区或召开工宣队、贫管会工作会议，或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委调整，充实和加强工宣队、贫管会的力量。一些省、市还健全或重建了各级工宣队的专门领导机构，一些学校的领导体制又部分地恢复到1968年下半年至1969年的状况。但是，由于这种体制内在的矛盾，这种恢复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没有持续多久。

谈及学校的领导体制时，还可附带他说一下学校中的学生组织。学校中的学生组织（小学中的少先队，大学中学里的共青团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天下大乱”中，全部陷于瘫痪，停止活动。“复课闹革命”后的一

段时间里，学校里（特别是大中学里）学生一般部分别属于几个“革命造反”群众组织。因这类组织中既有学生又有教师、干部，不是纯粹的学生组织，革委会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组织恢复后，造反派组织逐渐消亡，学生组织陆续恢复。一般来说，在小学是“红小兵”，在中学是红卫兵和共青团，在大学是共青团。

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反映，该校在全校二至六年级的28个教学班中，以年级为单位，分别成立红小兵连（下设排、班），全校组建红小兵团。材料断言：“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队的战斗作用”，“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自此之后，全国小学以红小兵取代少先队达11年之久。

教育革命初期，特别是在整团建团之前，中学里的学生组织多为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是学生中的群众组织。复课闹革命以后，它又逐渐发展演变成一种常设性的学生组织、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取代了中学共青团组织。1968年至1970年间，一些大中城市相继颁布了各自的“红卫兵条例”。1970年下半年，天津市中学红卫兵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天津市中学红卫兵条例（试行）》中，有关红卫兵的性质的规定是：“红卫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学生的先进群众组织。”关于参加条件，《条例》规定：“红卫兵要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为主体，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加入手续为经学生本人申请，填写登记表，由分队（排）红卫兵听取群众意见讨论通过，中队（连）红卫兵领导小组审查，报红卫兵领导小组批准。各级组织为：市建立红代会常务委员会，区建立红代会常务委员会分会，下设办事机构。学校建立红卫兵团，连建立红卫兵中队，排建立分队，分队下设若干小组。校红卫兵建立各级领导小组，设组长、副组长和成员若干人，各级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可兼任相应的学生连、排的领导成员。红卫兵干部实行轮换制。组织原则为市、区红代会常委、委员和各级红卫兵领导小组成员，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各级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大会）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并经同级党组织批准，报上一级红卫兵组织备案。各级红卫兵组织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上级红卫兵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关于各级组织的任务，《条例》规定：

组织红卫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对红卫兵经常进行阶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组织红卫兵开展革命大批判；组织红卫兵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开展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积极开展创四好、五好运动；经常整顿组织，发展红卫兵，抓好活思想，过好组织生活。《条例》还规定，红卫兵要佩带胸章标志。从《条例》中不难看出，此时的红卫兵已经由运动初期的群众造反组织发展为一个青年学生的阶级斗争组织。由于脱离了中学生的实际需要，游离于学校教育之外，所以，尽管它从表面上看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在实质上，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发展的动力。由于当时社会上的红卫兵组织多已解散，此类组织主要集中在学校（特别是中学），成为中学生的专门组织，而诸如此类的《条例》都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说明红卫兵与共青团组织的相互关系，也由于红卫兵没有中央一级的统一组织，1969年整团建团开始以后，它的活动逐渐减少。1973年3—4月间，共

青团北京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恢复了北京团市委的工作。此后，红卫兵变成为中学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以至最后徒具形式，成为一个只能唤起人们以复杂的心情回忆当年“革命造反”的一件往事。

在大学，由于新生入校时团组织的恢复已经取得相当进展，所以一般都未再成立红卫兵一类组织。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体制

对教学体制的改革，也是“教育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时，这一改革被认为是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教学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教学活动的直接领导，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生产、科研实践，理论紧密联系实际。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及其编者按，已经勾勒出了这种新体制的雏型和方向。9月，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此后，各地相继仿效这类学校。至1968年底，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几乎已经成为把学校交给工厂、街道办的代名词。

196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读者来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学由工厂、街道办的建议，同时开展了“城市的中小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随后，该报刊登了大量支持上述建议的文章、来信以及一些地方和学校的经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许多城镇中小学改由工厂接办或“定厂办学”，上海、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经试点后，将小学改为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兰州市五中自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每周学习2天，另外4大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把原来17门课合并为5门（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在此前后，河北、广东、四川、辽宁、湖北等许多地方的城镇中小学校也由工厂接办，实行类似兰州的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校。

一些大型企业自办附属中等技术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专门人才，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存在。把它作为“教育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简单地推向整个社会、把中小学及一些大学交给工厂、街道去办，实际上从总体上否定了学校独立存在的意义，加重了工厂的负担，降低了教学水平。这种“开门办学”的结果，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的“门”，这是对毛泽东“七二一”指示的曲解和庸俗化。这种做法不久就被一些新形式所取代。

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之后，全国各种学校经过普遍的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与工厂、社队挂钩，以及在校内大办工厂、农场，建立校外学工、学农基地等活动，初步形成了另一种开门办学的新体制。这种体制与1968年下半年和1969年初的做法明显不同。官不再一概要求把学校交给工厂、街道去办，实行厂校合一，而是在“开门办学”这一总的要求之下，在保留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独立存在的条件下，以校办工厂、农场、厂校挂钩等多种形式，实现学校与社会的结合。

197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中，以权威的形式系统地提出了教育新体制的原则和设想。该文提出：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

文章介绍了该校宣传队带领师生走“五·七”道路的经验：

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创办实验工厂、农场；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训练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

这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世界观的改造。

关于新体制的具体内容和实施办法，该文提出“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但是“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与清华大学经验几乎同时，其他一些大学也纷纷拿出了自己教学体制改革的计划或经验，尽管这些计划往往都只停留在“计划”阶段上。

例如，河北大学提出的《政治建校方案（草案）》中，对理工科教学体制改革的方案为：

彻底克服理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倾向，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统帅自然科学，用毛泽东思想建设新理科。

根据国防尖端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以军用带民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必须不断改造原有基础科学和探索新的基础学科。

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厂系合一。根据理科的特点，校办工厂的类型要多，厂的规模不宜过大，产品要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多样性。厂校挂钩要选择那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因陋就简、革命精神较强的革命、生产先进的工厂，并与有关科学研究单位挂钩。理科还要特别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承担国家的科研任务。

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力求结合生产实践，用现场教学的方法学习基础理论，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把边干边学与系统学习结合起来。在学习基础理论过程中，认真研究、总结、推广工农兵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要用科研任务带动教学，围绕科研任务组织教学内容，边研究边学习，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理科各系，除结合专业学工以外，每年还应安排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参加校内外工农业生产劳动，与工农结合，向社会学习，改造世界观。

在这个大学《政治建校方案（草案）》中，对文科教学体制改革的设想为：

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组织师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到阶级斗争复杂、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和单位去参加阶级斗争和集体生产劳动；带着阶级斗争中的问题和省、市交给的政治任务，结合专业特点，到工厂、工地、农村、商店、学校、街道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与批判各个学科领域中封、资、修思想体系结合起来；到社会上进行本学科领域的业务实践，如写四史、写通讯报道、创作革命文艺、总结先进思想、和工农兵一起学用哲学、普及战备外语等。通过以上途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提高政策水平，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写作能力。

文科要校内校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统一，校外的时间在一半以上。不论校内校外都要体现“以学力主，兼学别样”，都要密切联系实际斗争，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

文科建立校外基地。基地选在具有革命传统的、条件艰苦的、革命生产先进的和阶级斗争复杂的、革命生产落后的公社和工厂。校办工厂也是文科学工基地。

文科要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文科设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外文系。文科要提倡一专多能，造就革命的“通材”。

当时，各类学校提出的教学体制改革方案数不胜数，但就其基本点来看，与以上所说几种方案大同小异，关于学制，各高校在“学制要缩短”的总方向下，各自提出了一些设想。如河北大学提出理科3年、文科2年（外语系3年）。1971年江西省委在讨论“贯彻全国教育工作精神时决定：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制为2年，井冈山大学2年，医科大学3年，理工科大学2—3年，药科学院2年，冶金学院2—3年。课程时间安排，根据清华大学等的经验，各校普遍地确定授课时间的比例为：政治、劳动、军体课占授课时间的40%，业务课占60%。

中小学教育革命开展得比较早，但教学体制的改革却因缺少权威的典型而呈现出多样性、地域性。九大以后，一些中小学的“教育革命”经验陆续见报，使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逐渐有所遵循。其中，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比较系统，提出了农村中小学体制改革的模式。这个《大纲》提出，农村中小学设置，应以“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为原则，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公社办，或分片设点，或大队联办，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由大队单办；学校经费实行民办公助；农村中小学实行9年一贯制，学年分段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县、社可办一些社来社会的农业技术学校，普及农枝知识，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打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入学年龄的限制，废除旧的考试、留级制度”，允许政治思想好，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跳级；农村中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生，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烈军属子女入学；为了便于国家的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大体以春季作为学年的开始；农村中小学生在毕业后，主要是面向农村，等等。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高度评价了这个《大纲》，认为“它为今后农村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支持、拥护这个《大纲》的文章和来信。梨树县的经验，不仅成为农村中小学改革的权威典型，也成为城市中小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关于中小学的学制，当时各地的做法也很不一致，即使在同一地区，也往往存在几种做法。1970年初，兰州市中小学试行的新学制的类型有：五年一贯制（小学5年毕业），7年一贯制（小学和初中合并，毕业后达到初中程度），9年一贯制（小学、初中、高中合并，毕业后达到高中程度）。中学实行4年一贯制（初高中合并）或2、2分段制（初中2年，高中2年）。兰州市革委会教育革命组认为，根据一年多来的实践，城市中小学还是分开办好。天津市革委会的看法是，目前天津市中小学学制为9年一贯制（5、4分段），为了使学生毕业后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拟将全市中小学学制改为10年制。其

中，市区中小学为 5、5 分段，效区中小学为 5、3、2 分段（小学 5 年初中 3 年高中 2 年）。北京市二十三中提出，中小学实行 4、4 制，即 6 周岁上学，小学 4 年，中学 4 年，到 14 周岁中学毕业后，用 2 年时间或去农村种田，或去工厂做工，或去连队当兵。2 年后再由国家统一安置，或参加工农业生产，或参军，或上大学。在清华大学等经验的带动下，在前一段“教育革命”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各种类型的学校也都纷纷拿出了各自教育体制改革的设想和经验，山东省一个县创办了“五·七”红专学校。该校在总校下设工业、农业、林业、卫生、教育 5 个分校和 28 个教学点。其中，工业分校由县工交革委会负责，在几个工厂里设 5 个教学点。农林分校在县农场、林场设教学点，卫生分校在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设点，教育分校则采取集中和分散（轮流到公社）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教学。学制暂定为 3 个月至半年。学生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厂、农民中选拔，实行队来队去。在学校学习期间，由生产队按同等劳力记工分，工种差额部分由国家补助，学习中实行边干边学。福建省某县创办的“五·七大学”中，共分工业、农林、医疗、师范、财经等 5 个系，下设化工、水电、文科、财会等 10 个专业。其中除财会专业是短期训练班性质外，其他的学制分别为 1 年至 2 年。该大学没有固定校址，工业班办在先进工厂，农业班办在先进社队，医疗班办在医院和先进的合作医疗单位，水电班办在水库和电站工地。教员除少数抽调的专业干部外，其他均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技术、医务、财会人员和中学教师授课。学校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学生主要来自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在职人员和知青、实行社来社去。

清华大学等校的经验发表之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掀起了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办起了几所校办工厂。这些工厂具有一定规模，有一些比较像样的厂房和设备，有一些工人技术骨干，生产一些比较正规的产品。大学的农场原是安排下放教师和干部的，现在又被发展成为学校的学农基地。中小学所办工厂，农场规模小，数量大，至 1970 年 8 月，黑龙江省 10000 多所中小学已有 85% 的学校建立了学工、学农基地，有校办工厂、生产组 9000 多个，农场 12000 多个。南京市 133 所各类中学已办起各类工厂 79 个，正在筹建很快可以上马的有 49 所。至 1971 年上半年，南京已有 87% 的学校办起了工厂和农场，生产 513 种产品。苏州市 90% 的中等学校办起了小型工厂、作坊，生产多晶硅、平面高速开关、晶体三极管等 60 多种产品。北京市 271 所城区中学已有 253 所办起了工厂和小作坊，生产机械、电子、化工、印刷、木工等方面的产品 500 多种，1970 年产值达 800 多万元。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师生于 1970 年 4 月办起了“五·七”小作坊。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这个小作坊建立了木工、缝补、修鞋、理发和勤工俭学（为校外工厂加工纸盒等）5 个组。与此同时，学校开设手工课（每周 2 节），把“缝缝补补”搬上了课堂。小作坊为学校修理了桌子，椅子，为同学理发，手工缝衣服、书包、袜子等。

在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的过程中，转变学生思想、改造世界观被放到了首要的位置。陕西师范大学在一篇文章中说：

“在下乡下厂中，首先强调‘专业对口’还是首先强调‘思想对口’，这实质上是教育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同志思想上的反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首位，只有首先解决了‘思想对口’的问题，才能说的上真正的‘专业对口’。”

北京一中在兴办电子工厂时提出：

“从教育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校办工厂不仅是生产车间，更重要的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进行教学的场地。在学工中，要始终突出政治思想教育，根据学生生产劳动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学生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进行阶级教育……”

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校办工厂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课堂，斗私批修的战场，锤炼忠于毛主席红心的熔炉”。

除了放在首位的政治任务外，校办工厂还必须密切结合学校的教学任务，特别是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一些学校把这些课程搬到工厂去进行教学，由工人、教师、学生共同备课，进行现场教学，“即要加深学生对工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又要提高学生生产技术的实际操作能力，使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方法为学校教学开辟了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新途径。除此之外，校办工厂、农场还被赋予这样一种使命，即根据国家需要和实际可能，进行少量生产，力争在几年内做到经费自给和粮食部分自给，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

这场关于教学体制革命的讨论和试验，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了权威性的概括和进一步的发挥：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统筹规划，组织好厂（社）挂钩，使学校与社会互相促进。校办工厂（农林院校的农场）应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合教学和科研，以小型为主，既有一定批量生产，又要搞研究试制。防止贪大求全，片面追求科研生产指标的倾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把校办工厂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配备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人，并认真解决劳保福利等问题。要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开展科学研究。

这种教学新体制自确立后，中间几经周折，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当然这时它已被打了很多折扣。从总体上看，这一体制是“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产物，它的基本点都是“左”的或极左的，它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鼓吹极左思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统帅、推动学校的教学工作，以学校为阵地迫害知识分子，打击一大批从事教育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攻击周恩来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它歪曲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用所谓“厂带专业”否定以教学为中心，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它篡改、歪曲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论，把直接经验等同于实践，把实践的决定作用歪曲为人们必须事事直接经验，从而否认书本知识和学校课堂教学的重要性，用“干啥学啥”和以干代学取消了学校的基础教育，等等。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中也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学校中就已采用并取得成效的方法，如开门办学，厂校挂钩、下乡下厂等等。但江青一伙却把它们当作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最新发明，并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旗号下，把它们发展到否定课堂教学、否定“以学为主”的荒谬地步。他们歪曲了毛泽东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把大学降低到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实际上取消了普通高等教育。

很快，这种体制内在的脱离实际、压制知识分子、违背教育与生产规律的问题便暴露出来。自1970年底以后，许多学校反映，由于校办工厂属非生产部门，原材料供应因未列入计划而往往得不到充足供应，难以维持正常生产。一些中学反映，校办工厂往往满足不了学生学工的需要。如北京市中学校办工厂规模一般为四、五十人左右，而北京市中学学生大多在千人以上，一般学生要2—3年才能轮到学工一次，而到工厂去劳动的学生，往往由于所需劳保用品，粮食补助，住房等问题不易解决及工厂要考虑自身生产任务等因素，工厂不太欢迎，不愿接待。就是到了工厂，也因无法操作机器而只被当作劳动力使用，达不到厂校挂钩、厂带专业的目的。特别是这个体制内在的排斥文化知识、贬低课堂教学的倾向，更是受到广大师生越来越明显的抵制，1972年起，各种各样的学校普遍开始强调以课堂学习为主，以书本知识为主。那些不顾客观条件、违背教育规律、轻视理论学习、简单化、绝对化的开门办法的作法和形式实际上已被程度不同的打了许多折扣，有的也只是徒具形式。许多学校和教师提出，学生的升留级和毕业，在政治上、文化上要有个标准，不能一刀切，不分好坏全部升级、全部毕业，这样做不符合学生目前的客观实际。他们认为，在学生的自觉性还不是那么高、学习目的还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还应保留升留级制度和对学生的一定考试制度。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上提出，进一步提高质量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要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会议指出，理科的基础课一般宜单独设课，系统学习，基础知识面要适当宽一些，保证必要的教学时间；文科要使学员在实践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外语院校要加强基本功训练；要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重视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努力开展科学研究，贯彻“双百方针”；理科要加强理论研究，抓紧实验室、研究室的改造与建设，等等。会议提出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广大师生的迫切要求，部分地否定和纠正了教学体制改革以来的“左”的或极左的错误。

1972年7月3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杨振宇时，表示赞同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and 研究人才培养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会见时在座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提倡一下理论”。他对周培源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认真考虑了周恩来的指示，7月20日，他给周总理写信，汇报了自己对我回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为此，周总理写信给郭沫若、刘西尧等人，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完了”。此后，周总理又多次指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指出：“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针对教育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周总理指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学校里的基本理论课也少了”。他还提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提高”；“大学毕业生下一定百分之百的回到原单位，有些人可以留下来深造”，“从理论上提高。”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光明日报》1972年10月6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

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足够的重视。”周培源的文章在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受到广大师生的衷心拥护。

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间，教育界中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又受到江青等人的猛烈攻击，被诬为“右倾”、“复辟”、“修正主义回潮”一些极左的做法再次抬头。

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与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一样，大、中、小学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和招收新生的工作被迫停止。局势稍有稳定后，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各学校“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自此，大量实际未完成规定学业的大、中、小学学生毕业离校，各类学校的招生工作也由此提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该报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7月21日的一个重要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谈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反映了他教育思想中一些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如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农基本群众中普及教育、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这里，因为是针对一个具体经验而发，很难说这段指示就是他对招生制度改革思想全面、系统的表述。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歪曲，这段指示的精髓被忽视了，而其中的一些个别论断则在被形式主义、绝对化地歪曲之后广为宣传、普遍贯彻。

《调查报告》所总结的上海机床厂的主要经验有：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应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普通劳动者；由有经验的工人担任教师；由基层选拔经过劳动锻炼的初高中学生入大专院校，等等。上海机床厂的经验 and 毛泽东的批示——已经被形式化地处理过了，为“文化大革命”中招生制度的改革定下了基调。正如《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9月，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名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为2年（后延长10个月）。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大学”外，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尝试举办各种试点班。广东省一些大专院校自1969年起，举办了各种试点班24个，从工人、农民、复员退伍军人、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学员1000多名，“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经验”。其他一些省、市的大专院校也大多如此。农村中很快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1968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报告》提出：要从“土专家”中招生，到学校学一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中小学的招生工作，在1968年以前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68年底，随着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出现，许多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下乡而

停办了高中，而初中和小学要么是采取依据年龄自然升学的办法维持，要么就是处于停滞状态。自1970年起，中小学开始全面、大批地招收新生，新生入学的首要条件是政治表现——这在当时被称作“路线斗争觉悟”或“阶级觉悟”，一切文化考核均被取消，这种状态在1971年以后有所改变。当时，一对十分突出、荒谬的矛盾直接影响着中小学校的入学率：一方面，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轻视教育，鄙薄知识的思潮使许多学生失去了入学、求学的热情，这在中小学中比较突出，直接导致了中小学入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教育普及的重视和强调，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教育普及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它同时存在着粗糙、质量低下、形式主义等各种问题，这一因素又导致了入学率的上升。这两种因素作用的方式、层次及其结果各不相同，但后者起码在形式上占了上风。所以，从总体上来看，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始终保持在上升的趋势，而与这种上升趋势同时存在的却是教育质量的明显下降，

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中的问题表现得格外突出、集中。

在许多大专院校举办各种类型的试点班、教改小分队约一年多的基础上，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因此，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报告》规定的“招生办法”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事”。“分配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1970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的署名文章《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中，进一步阐发了以上《报告》所提出的招生设想。文章指出：

“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学校这个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这次高校招生，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招生工作的全过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群众路线，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真正把工农兵和上山下乡以及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推选出来。”

1970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介绍江西省教育革命的文章认为：“旧招生制度是‘高分录取’，‘不分阶级’，‘一张考卷定终身，工人农民莫进门’。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题、打分、说了算的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废除。”《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文章把这场改革的意义提得更高：“招生工作，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

这是招生工作中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不难看出，所谓招生制度的改革，所谓新的招生制度，其基本点主要有二：一是停止了从高中直接升入大学的传统做法，代之以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知识青年中招生，二是废除升学考试制度，代之以“群众推荐”，“领导审批”。

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些举措都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个“革命”。而且，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措施也确实接触到了以往招生制度中的某些弊端。但是，仅此就能证明这些“革命”的合理性吗？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群众中选拔学员，这无疑是个积极的、富有想象力的思路，但如果简单地把它当作排斥一切其他方法的唯一途径，简单地否定从高中直接升入大学的程度，这符合现代社会知识传授、积累的规律吗？当人们废除高考制度从而取消了因分数高低造成的不平等时，他们也就不得不面临一种新的，更为严重的不平等了。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过去是面向全国的大学，现在条件成熟必须到外省招生时，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上述精神，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

招收的新生以政治表现、出身为首要标准。据1971年5月统计，北京清华、北大、北医、北航等7所大学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党员46.2%，团员38.1%，非党团员占15.7%。武汉大学1970年招收新生988名，其中工人占40%，贫下中农（包括基层干部）占33%，上山下乡知青占21%，解放军战士5%；党员31%，团员38%，县以上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60多名。学生平均年龄21岁（其中最大的43岁，最小的17岁）。广州中山医学院招收的600名学员中，有一半是工人、贫下中农、复员转业军人，一半是解放军战士。他们都是从公社以上在职基层卫生人员和部队的初级卫生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其中来自地方的学员，有6年以上工龄的占2/3，有的工龄在20年以上。

招生中，文化标准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北京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文化程度高中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在另一些省、市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初中生和小学生的比例更多一些。

学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及相互之间的悬殊立即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困难。大学按初中水平教学，高中水平的“吃不饱”，小学水平的“吃不消”；讲理论，老工人不容易听懂，讲实际的东西，知识青年和复员军人又感到困难。教师教起来棘手，一些学员也产生了“怕”的思想：文化程度低的怕学不好、完不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给工人、贫下中农丢脸；文化程度高的觉得上课没意思，怕学不到什么东西。为此，一般学校都采取了分班上课、加强辅导、互帮互学等办法。

刚开始招生时，因学生来源广、各级领导比较重视、知识青年上学要求迫切等原因，各院校从农村招生比较顺利。而从工厂招生却遇到了麻烦。一方面，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当时大部分是工厂骨干，工厂不愿放。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工人不愿上大学，认为上大学有“三个划不来”：政治上划不来，由领导阶级变成了“再教育”对象；经济

上划不来，由 30—40 元的工资变为 19.5 元的生活费；生活上划不来，找对象不能结婚。一些大工厂技术力量强大，对送工人上大学不热心。一些小工厂、新建厂急需培养、补充技术人员，但因新工人多，选不出多少符合条件的学员。对此，各院校建议，为保证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员，最近两三年应多从上山下乡 2 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学员。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文化、科学、知识在狂暴的大批判中遭到了空前的贬抑和褻读，知识分子也不再因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教条呆板”而仅仅受到轻视和嘲讽，而更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和歧视，以至一度普遍被戏称为“臭老九”。但是，很难说这些政治狂涛表面奔腾飞溅的泡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意蕴和本质，更遑论中国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类的文化传统了。这样，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矛盾画面：一方面，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视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们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需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走进大学校门，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场奇特的竞争中，权力和关系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人们是怀着很不相同的动机投入到这场竞争中来的：有人是出于对知识、文化的热爱和渴求；有人是看准了学历对仕途和特权必不可少的装饰作用；有人显然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关读书人高雅地位的思想所支配；有人则仅仅是为了一些极为现实、琐屑的利益——脱离农村，挤进工薪阶层和城市户口的队伍，摆脱沉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尽管这在

当时口头上被说成是最崇高，最革命的）。这些由各种各样的动机汇合而成的强烈的进大学门愿望，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新招生制度相结合，很快在全国造成了一场持续多年，手法多样、影响深远、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新事物”——“走后门”。

1970 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走后门”的问题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1971 年以后，“走后门”已成为招生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严重的问题。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堂而皇之、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入大学，权再大一点的，则要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

招生工作中明目张胆、相当普遍的“走后门”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不满。1972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

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违反招生规定的予以制止纠正，如今后再有违犯规定的，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通知》下发后，并没有对招生工作中的“走后门”现象起到多少遏制作用。1973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给福建省李庆霖的复信中也曾对“走后门”问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深深的忧虑。1974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刊登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学

员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该报在编者按语中指出：钟志民“自觉批判了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错误，从而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编者按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组织高等学校干部和师生认真学习”。在此之后，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的问题，一些“走后门”进大学的学生要求退学，一些“走后门”“开后门”的领导干部作了检查，这次反“走后门”运动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尽管它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处理了一些具体问题，但不久就不了了之。

自从实行新的招生制度以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反复强调、“走后门”之风却一直屡禁不绝。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这个顽疾才像被一双无形的、但却是有力的手制服了。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道德感化，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而是制度，一种曾被当作“封、资、修”，去打倒的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制度。

一个时期横行泛滥的“走后门”进大学，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学生水平的低下，影响了大学的校风和教学，更为严重、深远的是，它进一步恶化了社会风气，并且使“文化大革命”本身处于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在经历了高唱入云的“斗私批修”运动之后，人们却变得更加“自私”了；在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宣传形势大好、觉悟空前提高的同时，人们却对如此普遍的社会顽疾束手无策。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眩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奇怪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

自1972年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倾错误的多方面工作中，这种招生制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72年的招生工作中，针对几年来造成的多方面的消极后果，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提出了对学生的文化状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考核或“调查”，但这些设想或做法很快引起了分歧。山东德州地区某县在为北京化工学院招生时进行了一些文化考核，结果被地区通报批判为“分数挂帅”，县委书记还作了检讨。但在1972年至1973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之中，进行必要文化考核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本年除继续采取前一年的办法外，还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意见》要求“考查的内容和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专业不同要求进行试验”。同年5月和6月，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规定。体育学院运动系和北京外语学院可招收少量应届高中毕业。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还曾指出：“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以上各项规定和指示实际上突破了1970年以来高校招生中取消或轻视文化考查以及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高校学生的规定。这些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新招生制度的补充和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对“旧”招生制度的部分恢复，实际也是对新招生制度的部分否定。

据此，当年许多省市的高校招生中加大了文化考核的分量。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入校学生的文化素质，也从制度上对当时屡禁不止的“走后门”风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把希望升学的青年的注意力部分地从“找后门”转到对学业的关注上，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社会风气。

但是，这种做法和结果很快就引起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在高校招生中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核，就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是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该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此信是张铁生在参加当年辽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查时，因为不会答题而写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的。信中说：为了实现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敏感地感觉到其中大有文章可作。他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试卷，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8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加以鼓吹。随后，各地报刊加以转载。《红旗》、《文汇报》等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文章、评论，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江青还在讲话中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这“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甚至把张捧为“反潮流的英雄”。

遵照张春桥的旨意，11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继张铁生的“白卷”和批判评论文化考核之后，又掀起了以批判“智育第一”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学校择优选拔、培养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两报发表她的谈话记录时，徐景贤曾作过删改、增补，并在编者按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提出“要注意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就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认真展开讨论。这个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3个多月，上海的高等学校还通过贴大字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揭露“智育第一”流毒的表现。

以张铁生的“白卷”为契机，结合在其他各条战线上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扑，江青、张春桥等掀起了一股反对文化考查、反对文化学习的恶浪，刚刚开始的高校入学文化考查又陷于停顿。

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再次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抵制。许多学校又恢复或部分恢复了正常的文化考核制度，校园里又出现了文化学习的气氛和较好的学习秩序。不久，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又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中断。但是，这一次“四人帮”横行的时间更短。1976年4月，正当“四人帮”陶醉于“批邓”的胜利中时，伟大的“四·五”运动爆发了。而在此后仅半年，“四人帮”就彻底覆亡了。中国的教育事业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路。

（郑谦）

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批林整风”运动始末

群众反映，这样批林“反而又证明刘少奇的话对了”。《“571”工程纪要》下发后，许多干部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出现了乱抓“小林彪”的现象。某生产大队在批判林彪的“5·18”讲话时，把一个领导作风有缺点的生产队长当作“权力中心论”的靶子来批判。江青说林彪从当杭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周恩来借机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赞同批判极左思潮。毛泽东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批林整风运动，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运动经历了内容相互矛盾的几个阶段，这种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内在矛盾的缩影。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错误及由此产生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党内外健康力量对“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预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

在“左”的错误框架中批林的矛盾处境

“九·一三”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沉着、果断地领导全党、全军，比较稳妥、顺利地处理了林彪事件遗留下来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稳定了形势。

为彻底清除林彪集团对军委工作的干扰和破坏，1971年10月3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为彻底审查、理清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同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小道消息沸沸扬扬，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实在无法理解何以会发生如此离奇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怀疑和愤懑，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迅速、集中地爆发、渲泻出来。再者，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武斗”遗留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激化起来。为安定人心，稳定形势，并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九·一三”事件后，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萧劲光、杨得志等老同志纷纷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严厉谴责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错误言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决策。

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了9次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揭发、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史的罪行，批判了林彪及黄、吴、李、邱等鼓吹的“天才论”、“有权就有一切”，“三十字方针”以及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等谬论，愤怒谴责了林彪集团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抱病参加座谈会的陈毅作了两次长篇发言，集中揭露了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到开辟中央苏区这段历史时期林彪所犯的错误，揭穿了他“一贯正确”的假象，深刻指出伪造历史就是犯罪。朱德、刘伯承等分别提交了书面发言。

在收集、整理林彪反革命政变材料并逐步向全党全国传达的同时，中央还采取有力、稳妥的措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慎重、妥善地处理了一些重点地区、单位的人和事。在一些林彪集团插手较深的地区和单位，中央首先把重点放在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等问题上。在中央派出的负责同志的领导和参与下，采取隔离审查、举办学习班等方式，对那些在林彪集团阴谋活动中卷得很深或比较深的人进行审理、清查，组织专人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并对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对一些虽然有些牵连但没有过多卷入而问题确实较多的地区和单位，中央则以较长的时间，反复、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避免了较大的震动和反复。“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一伙蓄意在一些地区、部门排斥异己，

安插亲信，同时，由于“全面武斗”以及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积累下来大量尖锐的矛盾，林彪事件后，这些地区和部门的矛盾迅速激化。一些与林彪集团有不同程度牵连的领导或受到审查，或立即受到曾被自己压制、迫害的对立面的批判和冲击，一些已经实现的两派联合又出现松动或分裂，一些原派别组织的少数人积极串联，准备拉山头，算旧帐，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挨整干部和整人的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许多在运动中被关、押、审查的人把矛头指向那些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些领导干部或是捂盖子、转移方向，或是对工作撒手不管，躺倒不干，等等。上述种种不稳定因素，又导致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些地区又出现某种混乱局面。

中央对此已有考虑，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间，党中央分别在北京召集武汉地区、成都地区、陕西、兰州军区、新疆、浙江、四川、贵州、江西、湖南、广州军区、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海军等省、自治区负责人及驻军负责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汇报会，并在本地区召开各自的工作会议，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一些会议的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及张春桥、王洪文等分别参与一些会议，帮助统一认识、解决问题、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及调整领导班子。在此基础上，中央批转了浙江、四川、江西、山东等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汇报材料，用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党中央的这些措施，比较稳妥地解决了一些省、自治区及军兵种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在影响本地区、本部门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制止了派性，促进了团结，避免了因林彪事件、派性斗争可能导致的较大反复，稳定了形势。

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逐步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和巨大惯性，在批林整风运动之初，基本上还是按照“继续革命”的思路来总结与林彪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林彪的斗争的。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说，“文化大革命”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按照这样的逻辑，林彪事件的发生反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成为“继续革命”理论正确性的又一标志。显然，这种理论既不能真正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也不能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而只能引发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批林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时，许多地方纷纷反映，虽然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集团的罪行非常痛恨，但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谬论并不容易，特别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更感到吃力，认为林彪的“罪行好批，谬论难驳”，同林彪的“政治界限好划，思想界限难分”。一些地方反映，干部群众中的主要思想障碍，一是不敢批，“怕批错了，批了正确的思想不好办”，希望等待上级表态，等待别人的经验；二是不好批，“林彪以谣言和诡辩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感到真假难分”。某地反映，《解放军报》1971年11月11日在报道中批判了看书学习中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当地群众感到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批判过的刘少奇的言论一样，这样批林

“反而又证明刘少奇的话对了”。1972年初，天津市一机局举办300多人的大批判骨干学习班，提出要批判林彪的“政治业务关系上的诡辩论”。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发言时，却没有一个人敢碰这个题目。

1972年1月中央将《“571”工程纪要》下发后，许多地方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由于批林整风既要批林又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既要辞众广泛参与又不得不回避许多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很快就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路线斗争不可知”的消极心理，认为“该批的都批了，没啥好批的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批林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对林彪事件的实质采取回避态度或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加上当时普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气氛，这种整风又往往导致了扩大化的后果。在联系实际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无限上纲和乱抓“小林彪”的现象。在一些政策水平低的基层，批林整风更是五花八门，屡屡出现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倾向。某地确定批林整风联系实际的重点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结果一些县、社又在农村批了“搞副业单干”、“私人开荒”、“多分自留地”等等。某生产大队在批判林彪的“5·18”讲话时，上批下联，把一个领导作风有缺点的生产队长当作“权力中心论”的靶子来批判。一些社队又发动群众清理财务，搞经济退赔，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怕在整风中挨整，或“等着挨整”。在城市和工矿企业，整风往往又引发了领导班子中的派性争斗。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领导部门一再强调要把批林放在首位，要注意区分两类矛盾，不要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不要“打横炮”，不要层层揪“代理人”，不要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扩大化的倾向，但它同时又使批林所要联系的实际更加空泛和难以捉摸。各地普遍反映，对批林与整风如何结合、批林如何联系实际难以掌握。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在当时各种文件所确定的范围之内，在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的批林，其结果只能如此：要么是新一轮的扩大化，要么就是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

但是，与这种倾向同时存在着的另一种倾向，即把批林与清算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结合起来的倾向，也正在发展，尽管它当时还处于次要的位置。“九·一三”事件后，深受动乱、武斗、阶级斗争扩大化之苦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仅仅是凭着他们的本能和直觉，便会自然而然地将林彪集团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林彪等人在“文

化大革命”中最“革命”、最极端的表演，而且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已经把它的真实性质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群众面前了。在批林整风初期，已经有不少人不是根据文件所定下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了。这一思潮和倾向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引导之下，在1972年下半年间一度发展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

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人知晓。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在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分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在于说明他对林彪等人早有觉察。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它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7月上旬至8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各自的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学习文件，联系各自的实际，清理思想，总结经验，解剖自己。按照中央要求，这些会议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要搞好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

总的来说，1971年9月下旬至1972年5月间的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但主要还是在“左”的错误的框框里作着既难于被群众接受，又实在难于深入下去的批林文章。而在当时，已经有许多地区和部门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一类的任务。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很快就突破了批林整风汇报会所规定的范围，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周恩来领导的纠正“左”倾错误、 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也使他有可能从一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种反思使他进一步放弃了几年前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热情洋溢的赞扬和肯定。他虽然还没有放弃“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可能从整体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确实觉察到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以及“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些明显漏洞，并在他认为可能的范围之内，着手纠正一些错误。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极左思潮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他曾对红卫兵和造反派一些偏激、过头的言行采取了宽容、理解甚至支持的态度。但在1967年“天下大乱”到了几乎失控的时候，他又对极左思潮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对“王、关、戚”等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在此之后，毛泽东还不时批评过极左思潮，甚至把它归结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在毛泽东决心削弱林彪集团的时候，他所选定的主要突破口，便是林彪等人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的言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更是把极左思潮的表现和破坏与林彪集团直接等同起来。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这种批判有时已超出了极左思潮的范围，而对“文化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错误也有所触及。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19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到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对极左思潮的不满，使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与党内一大批老干部接近起来，这是“九·一三”事件后他的一个突出变化。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二月逆流”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并做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

1972年初，陈毅病危期间，毛泽东特意派周恩来、叶剑英去看望陈毅，并转达他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意见。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不顾自己仍在病中，冒着严寒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解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并大胆地使用他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批示突出地反映了他当时思想认识上的两重性。批示中，他一方面仍然在

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没有丝毫松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肯定了邓的历史功绩，对邓迟迟未能出来工作表示不满。

“九·一三”事件后，许多老同志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在揭发和批判林彪集团的同时，也反映了各自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希望能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团聚、改善生活。毛泽东对其中许多信件作了批复，有的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审查、出来工作，有的虽然未置可否，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容易被理解为同意申诉人的意见。1972年1月，萧克从江西永修农林部五·七干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一面揭发、批判林彪的罪行，一面说明自己虽已结束审查，但却迟迟未予解放和恢复组织生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萧克同志的问题属于党内犯某些错误的性质，应当恢复党籍，并给予适当工作。周恩来等因势利导，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陈云、苏振华、杨成武、林枫、张执一许多老同志解除审查，分配工作或改善了生活待遇。

中央一级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对省、市级乃至基层，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许多领导机关都比较自觉地把落实干部政策与批判林彪结合起来，当作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1972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落实政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对于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进一步限制造反派的势力，遏制江青集团的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林彪事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干部队伍的严重错误估计，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变化。1973年后，尽管毛泽东对批林整风运动中明显发展起来的纠“左”倾向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断定林彪的实质是“极右”，但他仍未停止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1973年12月21日，他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明确地表示要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要作自我批评。他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并坦率地承认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要“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九·一三”事件后，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或隐或现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是有限的，但也是重要的。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得党内健康力量能够利用这种变化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有利条件，展开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在不少方面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初衷。

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72年间，周恩来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认识上的积极变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抓住时机，适时地把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极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为抑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减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殚精竭虑，不懈努力。在1967年至1971年间，他多次使用“极左倾向”、“极左行动”、“极端民主化”以及“极左思潮”等用语，批评社会上的种种极端言行。在一些问题上，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尚能被接受的形式，曲折、间接地对“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他来说，不存在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对极

左思潮的批判更为彻底，甚至成为一种反对“左”的错误的特殊方式。“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周恩来等这一阶段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首先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而且从一开始就与调整和整顿密切相联。

197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刚刚兴起，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一些省、市主要领导人领导生产不力、无政府主义、瞎指挥、纪律废弛、生产设施、设备失修甚至被毁、空头政治肆虐、体制混乱、几乎没有企业管理、知识和知识分子备受歧视、科学技术工作停滞、倒退、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等所造成的危害，立即尖锐、严重地暴露出来。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客观上不能不是个否定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的过程。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经济工作实际，精心组织，使这次会议成为批判极左思潮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精神。根据他的指示和与会代表的要求，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强调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等等。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反映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主义、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张春桥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对会议施加压力。《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通过与与会代表广为传播，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1972年初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精神显然使他们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指导。从1972年上半年起，多数省市的企业又先后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次劳动竞赛不仅在规模上大于1970年的那次竞赛，而且，它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展开，从一开始就与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企业管理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竞赛除了政治、学习、作风、团结等当时被称作是“大指标”一类的内容外，还有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等仅限于生产领域、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实际上，在当时开展竞赛的企业中，“小指标”赛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更是在全国肯定、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破坏和否定，造成了产品质量普遍严重下降。周恩来从抓产品质量入手，解决当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对极左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针对援外飞机质量下降批示，要求“提起警惕” 。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

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就汽车生产质量问题批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4、5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这怎么向国家交待，向人民交待，向领袖交待？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新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方面人员调查、研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1972年下半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业方面的整顿进一步深入发展。同年10月，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7项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后，经济主管部门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这个文件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表示赞成，唯有上海市的代表在张春桥等人的操纵指使下，表示坚决反对，并由张春桥出面迫使会议将这个文件收回。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1973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一米七轧机、几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多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再次明确肯定了农村《六十条》的基本精神，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5

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些政策对于遏制极左思潮的泛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26日，在批林整风刚刚开始之初，根据广大农民、农村干部的强烈要求，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用群众自己创造的、愿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指示》发出后，各个省、区都召开专门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落实。

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1972年5、6月间，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在“当前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的问题上，与会人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较多的县委书记认为，当前农村中虽有极左的流毒，但主要倾向是右，另一些县委书记则认为极左思潮的倾向是主要的。又如在1972年1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虽然着重讨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但会议通过的《纪要》对农村许多经济政策采取了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一概回避。会上，当地地委副书记对本地区“左”的政策进行批判时，被昔阳县委书记说成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平定县委副书记等则表示：“我们是坚决眼着昔阳老大哥走。”

尽管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阻力，但在批判极左思潮逐渐成为批林整风主流这个大气候下，1972年间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还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在1972年10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普遍感到，由于批林整风的深入，特别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阻力比半年前明显减少。年初会议上顶牛的平定县委副书记等也表示

回去要认真落实政策。会议肯定在自留地、猪饲料地等问题上要坚决按《六十条》办，当时在山西省比较普遍的大队核算除少数确实办得好的外，一般都要恢复为生产队核算。

1972年下半年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许多省都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召开了各种会议。会议在诸如所有制、社队规模、劳动管理、自留地、分配问题、多种经营问题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程度上不同地批判了极左思潮，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在农村批判极左思潮的直接成果，是《六十条》等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落实经济政策的同时，干部政策的落实也在展开。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虽然1968年下半年以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开始进行，但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阻挠、破坏，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这项工作一直困难重重，步履蹒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注批判极左思潮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大大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后仅1个月，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调量，并严肃批评了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由于他的亲自干预，使许多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使一些

老同志解除了囚禁，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妥善安置。他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公开露面，以扩大影响，推动全国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4月，鉴于一些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而去世，周恩来一方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一面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经他亲自修改后于4月24日发表。这篇社论反复引用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语录，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影响，大大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许多省专门就此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落实社论精神。一些报刊发表文章，结合本地实际论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九·一三”事件后，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岗位。这些干部的复职，进一步削弱了江青集团的社会基础，增强了党内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里，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卓越斗争，使得这些领域里一度出现了盎然的生机。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时，认真听取了杨对我国科学教育界的看法。他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同月14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时，要求他要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汇报他在北大传达了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许多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许多人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使得“老、中、青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教育、科学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

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的来信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提出，要以该信为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谈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18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他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本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要把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随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进行批示，要求将此《意见》修改、讨论、上报，并尽快加以落实。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

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封信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领域中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与此同时，批判极左思潮在中、小学教育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文章，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堂教学和学习书本知识为主”。10月份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科技领域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文章涉及的直接内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义却在于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公开挑战。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烧起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热情。1972年下半年间，北大一些民主人士和老教授，在种种政治嫌疑被排除、落实了政策以后，精神振奋，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哲学家冯友兰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几年内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不顾腿伤，拄着拐棍上课。他一反自己十多年来不写文章的“规矩”，自报《马克思对古典派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和《列宁后期著作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问题》两个研究项目。原东语系教研室主任金克木在解除“托派嫌疑”后，精神振奋，表示：“谁对梵文、巴利文不懂，有什么问题，部可以来找我。”他还开始着手编校《汉语印地语字典》和《乌尔都语汉语字典》。哲学系一级教授朱光潜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寻找抄家抄去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他还就《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译文中的一些不妥之处，写信给中央编译局，提出自己的意见。

兰州铁道学院在“教育革命”中，由于“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极左思潮的冲击，一度出现了“政治时间要多少给多少，业务时间剩多少算多少”的局面。教研组解散了，科学实验处于停顿状态，教师有的当了管理员，有的当了采购员。平时教师宁可闲着打扑克，也不敢钻业务，教师业务水平普遍下降。1972年后，在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该院党委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教师，在教师中开展了制订红专规划的工作。红专规划不仅对教师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业务方面要求编写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开展科研活动、学习一两门外语，等等。学院整顿和扩充实验室，举办外语学习班，建立科学技术情报网，减少政治活动时间，定期到对口工厂（工地）参加生产实践。经过整顿，该院出现了空前的钻研业务的空气，教师争相报课题，搞实验，外语学习班上座无虚席。

教育、科技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激发了广大工人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的热情。1972年10月11日，北京市科技局在北京天文馆电影厅举办第一次“科技讲座”，介绍“可控硅应用技术国外发展状况”。因领导有顾虑，决定少发票、少印讲义，并嘱咐主讲人少讲。通知发出后，很多厂矿企业要求多发票，许多工人跑到科技局要票。科技局增印几百张票仍不够发。讲课那一天，天文馆电影厅里人员爆满但却秩序井然，工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讲，课间休息时，许多工人围住主讲人，热情地提建议和要求，一些大厂矿还要求为他们开“包场”。由于听讲的人不断增加，第二次题为“可控硅的主电路及触发电路”的讲座，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并决定同样内容的讲座讲两次。讲座那天，远郊区许多工厂的工人利用公休跑来听讲。

散会后，很多厂矿还要求继续参加听“科技讲座”。科技局的干部为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科技的热情所鼓舞，准备从11月份开始增加农业科学技术讲座。

1972年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个个谨小慎微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指导人，这些领域里的干部和群众行动起来，迎来了1972年的转机和复苏。继197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全会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除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作品外，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地理、历史的书籍。4月25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一段时间里，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书店门市部出现了排长队购书的景象。5月间，在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时，许多省市举行了文艺创作节目汇报演出，文艺工作出现了劫后复苏的气象。从1972年上半年起，一些大城市里的医院开始试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10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举行了全国田径运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批判极左思潮宛如春风化雨，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尽管它的时间十分短暂。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了高潮。这不仅表现在批判极左思潮所涉及的领域、范围之广，在实践中的影响之大，而且也表现在批判的深刻与激烈程度上。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人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通篇贯穿“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周恩来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极左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反复强调了它仍然是当前破坏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继续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根据周恩来的一贯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

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江青集团对批判权左思潮的反扑及周恩来整顿被迫中断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整顿各项工作的斗争，顺应党心民意，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使许多领域里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转机和起色。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对极左思潮批判的范围，实际上开始了对“左”的错误的清算，这是不妥协地反对极左思潮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等人的努力遭到了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

“九·一三”事件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林彪集团都十分接近的江青集团，一度曾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如果说1972年上半年他们对周恩来等工作还只是警觉和不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随着深入发展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危及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便全力展开了对周恩来等的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江青等人立即感觉到这篇文章的分量和意义。在张、姚的指使下，《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等人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姚文元看了龙岩等的文章后当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想抬头”，江青认定“这个版（指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2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10月至11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等到上海活动，张在市委常委会上攻击说，当前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不管四面八方刮来什么风，上海都要顶住”。这样，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以龙岩等人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在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的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斗争，终于不可避免地尖锐化，公开化了。

11月28日，根据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一贯思想，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30日，周恩来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第二天，张春桥批示将报告送“总理再阅”，并批：“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等人以其特有的语言，从反面准确地说出这场斗争的实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是，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这种变化是相当有限的。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特别是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越来越多地触及“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本身时，它也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限度和范围。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对报纸宣传方面的情况也同样适用。王若水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谈到了对王若水来信的看法。他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

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结论成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很快就从各种文件、文章中消失了，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3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把林彪一伙的实质概括为对内“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外“反华反共反革命”，只字不提批判极左思潮，提出要把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林彪，“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1973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则更进一步地说：“如果只看表面现象（即林彪的极左），那就不但打不中要害，分不清是非，而且会偏离斗争大方向”。这种明显的变化立即引起了人们普遍的疑虑和不安。许多地方反映“批林联系实际的问题又成了问题”，“不知应联系什么实际”，“到底是反左还是反右？”基层纷纷要求省委明确态度，省委又因不摸底而含糊其辞。一些企业不敢再提劳动竞赛，一些学校不敢再提“以学为主”，一些农村地区也不敢再公开提《六十条》、按劳分配、自留地等问题了。一些了解底细的省、市，则已经改弦易辙。1973年1月在北京市召开的批林整风座谈会上，强调的是“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口批判‘极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2月初召开的辽宁省批林整风座谈会上，认为从1972年9月以后，把批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当作林彪路线的实质来批，是“没有抓住林彪反动路线的要害”。

毛泽东的最后裁决虽然改变了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但是，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因于它的正义性、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使它仍然以巨大的惯性向前发展着。周恩来等人也在可能的条件下，顽强地继续领导着这场艰难的斗争。

1973年上半年间，周恩来在一些重要场合，仍然多次尖锐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对经济、外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经济方面，他指出，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计划工作也“没有王法”了，在外事工作方面，他指出，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不满、隔阂，不能与中国人交朋友，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评后，我们就主动，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等等。1973年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对遭到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他的讲话使在场的外国专家深为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仍然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的意见，同日，他还向毛泽东提出让王稼祥“做外事调研工作”的意见，得到毛的同意。他还提出，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得到毛泽东的同意。3月10日，党中央发出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具体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复出、任职，是周恩来在困境中继续批判极左、落实政策的重要成果，对于党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反对江青集团、结束“文

化大革命”的灾难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公开否定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江青集团有恃无恐，疯狂反扑，周恩来虽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勉力苦撑，但已经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江青等人的反扑，仍然是把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作为突破口。5月21日，国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里批林整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说，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知识分子是改造过头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开展了一场大辩论。科教领域群众对批林整风问题，有以下看法和情绪：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文化大革命”和科教战线的斗批改搞过了头，现在要反“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批，而去批右，就会愈批越‘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等等。报告把这些正确意见统统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甚至污蔑为“攻击”。报告提出要“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认清当前的大好形势，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关于所谓“右倾回潮”的汇报，并把它与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因而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越来越难以容忍。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除了重提批判孔子的问题外，还尖锐地批判了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实际上曲折而又严厉地批评了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7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书记毛远新的指令，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的信适合了江青等人反击“批判极左思潮”的迫切需要，因而得到了他们的高度重视。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随后，各地报纸纷纷加以转载，《文汇报》等以张信为由头，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的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等等。7月28日，江青、张春桥等又在审查影片《园丁之歌》时发难，指责它是“反攻倒算”。1973年底，为了否定批判极左思潮给教育领域带来的积极变化，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反击“右倾回潮”，在党的十大上势力得到加强的江青一伙，又指使迟群等在清华大学校搞了“三个月运动”，反击“教育界出现的一股翻案风”。

从1974年初起，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集团发起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诬蔑、中伤，对1972年整顿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进行全面否定。周恩来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批林整风运动随之不了了之。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失去了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性内容，只不过是打着批判林彪的旗号，全盘否定周恩来等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从全局上维护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它很快就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抬头，生产、工作秩序的混乱和生产的再次下降。“四人帮”倒行逆施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不满和觉悟，周恩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所留下的深远影响，成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坚实基础。

(陈泽)

“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风庆轮事件*

上海全市批判交通部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是“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制造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责问邓小平：“你对风庆轮是什么意见。”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

江青逼迫邓小平：“你要表态”。邓小平气愤地说：“那我还要调查。还要调查。”周恩来听到说：江青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问邓小平，邓小平已经忍了很久了。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

发生在 1974 年的风庆轮事件，是“四人帮”妄图实现其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组阁的阴谋而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

风庆轮事件从 1974 年年初开始，一直闹到年尾，从上海一直闹到北京，闹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迫邓小平表态，迫使邓小平不得不与江青面对面进行抗争。会后又把这件* 本文采用了交通部远洋运输局向 1978 年 5 月全国交通战线工业学大庆会议提供的关于“风庆轮事件”的部分资料。事报给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和远在湖南的毛泽东主席。这一事件，虽然随着“四人帮”组阁阴谋的失败成为“四人帮”政治阴谋棋盘上的一个七彩肥皂泡，但是，直到 1976 年“批邓”时，江青又祭起风庆轮事件，欲将邓小平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又被毛泽东主席制止。这些事实都说明，无论从哪方面看，风庆轮事件都不能算作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小中见大或由小及大的政治事件。

本文拟就风庆轮事件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关系国策的情况进行评述。

风庆轮事件的序幕

远洋运输事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从 50 年代起就十分关注这项事业的发展。由于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在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有计划地开展后，为了解决海洋运输方面的急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租用外轮，这不仅需要国家付出可贵的外汇，而且受雇于外轮的我国职工，常常在经济上受盘剥，在政治上受屈辱。

那时我们还只能在迫不得已租用外轮的同时，尽快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但是落后面貌的改变决不能一蹴而就。直到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交通部组织的上海造船大会战时，我们仍然没有一个万吨级船台和必需的大型设备。广大干部职工就是在这样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群策群力克服困难自行造船的。据国家计委于 1970 年 12 月上报的计划执行情况称：即将建成的 9 艘万吨级客轮货轮，相当于以往 20 年所建造的万吨轮的一倍半。

风庆轮就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 9 艘万吨轮中的一艘远洋货轮。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承造的。江南厂于 1973 年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随后，在上海远洋分公司的参与下，前后进行了轻载和重载试航，并在 1974 年春季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了远航欧洲的任务。

风庆轮完成建造，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这件大好事却被“四人帮”及其党羽当成了浑水摸鱼的天赐良机。

最初的问题发生在风庆轮轻载试航的过程中。在正常情况下，上海远洋公司在接收风庆轮之前，就试航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提出意见和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江南造船厂完成移交使用之前，应该尊重公司方面的意见，采取改进措施，提高质量。本着对工作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这种分歧本来是不难解决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但是，“四人帮”及其党羽却把事情越闹越大，直至闹出了一个风庆轮事件。

问题的症结就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极不正常的情况。当时在全国批判所谓右倾回潮的余音未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即将启动。“四人帮”及其党羽，正凭借他们的反革命嗅觉寻找时机，兴风作浪。这时发生了关于风庆轮部件质量问题的分歧，“四人帮”党羽控制下的上海市工交组便蓄意歪曲事实，扩大矛盾，以求一逞。

具体情况是：当时公司方面指出，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磨损达 0.15 毫米，质量尚不过关，需要采取改进措施。但是，“四人帮”的党羽却说：风庆轮主机汽缸套的“磨损仅为 0.08 毫米，完全属于正常。”实际情况是他们玩弄了一个花招，把单边磨损 0.15 毫米平均到两边，即把 0.15 毫米磨损值除以“2”，再四舍五入，得出磨损仅为 0.08 毫米的虚假结论。然后以这个弄虚作假的结论为根据对交通部进行污蔑攻击，说交通部的人对国产船如何地百般挑剔刁难，是“崇洋迷外”的典型等等。

1974 年 1 月，姚文元为准备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回到上海进行活动，收集材料。1 月 17 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金祖敏（上海市革委会常委）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有些设备明明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喜欢进口，包括电机厂、造船厂出的产品。可见，“最近崇洋迷外思想有所抬头”。马天水（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

一听，如获至宝，立即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搞几个材料给我。”

1974年初姚文元的上海之行，为上海党羽们的反革命活动撑了腰，打了气，加了油。

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煽动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等等。经陈阿大点火，江南厂的一些人贴出了题为《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文汇报》急忙要来了大字报原文，登在该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马天水看后立即指示让远洋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马天水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动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

之后，工交组又派人到远洋分公司，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污蔑交通部及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等等。

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上海远洋分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远在大连的红旗造船厂，也在“四人帮”辽宁死党的指挥下遥相呼应贴出大字报，攻击交通部天津远洋运输分公司是“天字号崇洋公司”。

金祖敏根据姚文元指示，让江南造船厂写了一个“典型材料”、题为《从万吨饥的制造看造船工业的两条路线斗争》。该材料列举了上海机电一局系统的电机、机器制造等行业的例子。重点之一则是就风庆轮试航过程中质量问题的分歧，攻击交通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路线”。金祖敏于1974年春节大年初一写信姚文元，报送了这份材料。

下面是金祖敏于1月26日致姚文元信的节录：

在本月十七日您接见市总工会常委时，我汇报了前一段到工交系统所听到的一些反映，即在当前工业战线上崇洋思想又有所抬头，这次我又作了进一步了解，现将我所听到的一些情况和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报告如下：

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教导，进口一点技术先进的样品、样机，作为借鉴是可以的。而有些可进可不进的设备、原材料，应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但当前出现一种什么都依赖进口的倾向值得注意。

对于这问题，我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

以上……请张春桥、王洪文同志阅示。

姚文元在金祖敏的信上批道：这是“崇洋卡国产的典型例子”，“相当尖锐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姚文元还要王洪文、张春桥考虑是否印出来给政治局的同志看看。还声称：“简报上是完全看不到这类材料的。”

之后，金祖敏的信和材料果然以《金祖敏的一封信》为题印发。姚文元还寄了一份给上海的金祖敏，所附便条上写着：“信已经印出，寄给你一份。”

马天水立即让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翻印了此件，并补拟一个通知，发到上海工交系统。同时，又报送张春桥、姚文元。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上海全市立即展开了借风庆轮问题批判“崇洋迷外”的造势行动。一时间，接二连三地召开了各种联合批判会、

现场批判会。批判会上攻击买船是“崇洋迷外”、“依赖进口”，是“投降卖国”，是“曾国藩、李鸿章一伙制造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卖国贼的衣钵后继有人”等等。最为别出心裁的是搞了一个全市性的歌咏大会。组织者指定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的同志们去唱《自力更生造船好》的歌，同时，让公司领导作为对立面到会接受“唱歌批判”。被徐景贤请去大会的“四人帮”文化部死党于会咏在会上说：“中远公司的人自己唱《自力更生造船好》，这是给领导的一张很好的大字报”。实际上，中远公司被指定参加唱歌的同志们思想上很抵触，组织者却说：“这不碍你们的事，路线问题主要是指上头的。”可见，他们的矛头所向了。

风庆轮事件的背景

那么，“四人帮”及其党羽为什么要利用风庆轮大作文章呢？这就要联系风庆轮事件的背景进行分析。

风庆轮事件的大背景是正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

自从1969年开过党的九大以后，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就提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日程。就在筹备大会期间，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抢班夺权的问题及九·一三事件，推迟了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的时间。直到批林整风大致结束的1974年，才把这件事再次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由于“四人帮”在党的十大攫取了重要权力，他们利令智昏，认为羽翼已丰，妄图在四届人大由他们组阁。为此，从1973年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他们就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对“四人帮”来说，在其党羽中选拔拼凑一套班子并不难，难的是必须排除组阁的障碍，而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周恩来和已经恢复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以及国务院所属主管部门那些恢复了领导工作的老同志。

出于以上政治需要，“四人帮”在1974年新年伊始便大张旗鼓地造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声势。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影射史学的效用，他们极力企图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利器对付政敌。他们曾利用批判走后门、以求一逞，但是很快被毛泽东揭穿予以否定。不过，姚文元年初的上海之行却带回来他们认为可用作重磅炸弹的风庆轮问题。

背景之二便是抓住风庆轮问题大作文章，被“四人帮”认为是对他们最有利，也最有效的突破口。一则，他们具有地利的优势，这颗“炸弹”的制造乃是上海的死党爪牙，在他们眼中上海当时乃是他们的“帮天下”，借风庆轮问题兴风作浪，上下串通十分方便。二则，抓住风庆轮大作文章可以由小及大，从中引出一个关系国家建设的方针的问题，可以对政敌上纲上线到方向路线上去。正如“四人帮”死党爪牙所做的那样，可以用“崇洋迷外”、“洋奴哲学”、“刁难国产船、依赖进口船”等等罪名，从下往上追，往上批，直至打倒政敌，为他们组阁让路。

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被“四人帮”抓住不放的外贸进口及利用外汇买船的实际情况。

关于外贸易情况是这样的：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领导批左，让国务院有关部门抓计划、抓管理，使我国的经济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其中又以扩大外贸的成果为最。当时，国务院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的有利时机，开展外贸工作。1973年党中央、国务院任命李强担任外贸部长，并请陈云进行指导和协助。李强部长常常亲临外贸第一线，亲自领导和操作，在黄金买卖、期货交易方面收获甚丰，外贸部门在短时间内就赚回了30亿美元。同年，在引进国外大型设备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动作。比如，1973年初，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报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如果加上以前确定和后来追加的项目，共计用外汇51.4亿美元。这份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付诸实施。

后来的事实证明，上列引进项目，对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积极作用。

然而，“四人帮”及其党羽，出于他们的本能总是对国务院工作的成就切齿痛恨，总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这就是他们所攻击的所谓“进口风”的实质。

关于利用外汇买船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历来是十分关注的。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就对交通部门提出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发展一二千万吨的海上运输力量。1958年，毛泽东主席再次提出要建立起“海上铁路”。1963年，周恩来总理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队。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又明确指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便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

风庆轮问题就是发生在这个计划执行期间。但是，事实本身正好说明，我国在买船的同时，也积极造船，不然怎么会有万吨级的远洋货轮风庆轮的诞生呢？交通部的人在轻载试航后提出质量方面的某些不足，正是为了使国产船性能日臻完善。这里“四人帮”及其党羽蓄意制造事端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汇买船，本来就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可见“四人帮”并不真正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

针对“四人帮”在造船与买船问题上蓄意捣乱破坏的行径，李先念副总理于1974年3月8日作了针对性很强的指示：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应当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努力加快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

（二）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这是根本的。但并不排除在有利条件下从国外适当购买一些船只。因为我们现在的船舶太不够了，每年花掉的运费就要三亿美元，数目太大。为了加强我国海上运输的能力，适当购买一些船只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东欧一些国家，生意还可以多做些，从他们提出的贸易货单当中，进口一些船舶，可能对我们有利。

（五）广东、上海以油为原料的大化肥厂，一旦建成就需要有较大的油船，如五万吨的或更大一些的。建议早点筹办。否则、只靠火车运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另外，我们也在进口矿石，装运矿石万吨船不行，吨位要大，也要考虑解决。

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既是对“四人帮”的回击，也是对国务院既定的既要积极造船，也要利用条件买船这个方针大计的坚持。

据统计，截止到1974年年底，我国的远洋船只发展到304艘，共计450万载重吨。

不过，“四人帮”是决不善罢甘休的。

风度轮远航及远航途中的斗争

就在风庆轮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那段日子里，风庆轮结束了重载试航并移交给交通部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使用。接着，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建造情况以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技术状况，批准了远洋运输总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决定在近期内让风庆轮远航欧洲，国务院作了报告。

在对待风庆轮远航的态度方面，“四人帮”的党羽表现得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他们既想捞一张反党“王牌”，又没有把握。起初，他们曾大叫大嚷要求让风庆轮远航，那时他们以为交通部不会批准，他们就可给交通部罪加一等。结果却出乎意料。于是马天水诬蔑说：“有人故意下令远航，是要整整上海，想要我们好看。”叫喊远航最凶的黄涛这时也变了腔调。黄涛说：“交通部倒来将我们一军了。”还说：“风庆轮远航不该一下就跑这么远，风险太大，该先跑几趟近洋。”

不过，在交通部已经下令让风庆轮远航欧洲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召集上海一二百家工厂，为风庆轮远航赶制备件，而且实行了包干责任制，谁家提供的产品，由谁家负责，如果出了问题，就要唯谁是问。原来有争议的部件也偷偷地换了下去，而且备件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认为，风庆轮远航胜利了，就可以捞到一张反党“王牌”。用黄涛的话说，他们就是要“同党比输赢，争高低”。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帮”就是要同我们的党“比输赢”，为此才要下这笔大赌注。

此处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对待风庆轮远航的胜败、输赢问题上，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的看法比他们的党羽是更为高明的。张春桥说：“风庆轮即使沉了，也是个胜利。”“这要大宣传”、“要组织欢迎”，“因为这是路线问题”。上海的马天水和朱永嘉立即向上海宣传部门作了布置，定了基调：“要把洋奴哲学好好批一批。”解放日报社立即通过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发了一封约稿信给风庆轮，要风庆轮组织几篇文章“回击洋奴哲学”。接着，“四人帮”的黑指示也传到风庆轮上，朱栋更加肆无忌惮地大搞批判，并对李国堂、顾文广两同志进行政治陷害。

1974年9月9日，风庆轮离开毛里求斯在印度洋航行时主机增压器故障，不得不停下来修理47个小时。期间漂离航线52海里。美国军用飞机三次飞临风庆轮上空盘旋。鉴于情况严重，李国堂建议向公司发电报，如实报告情况。船长也按制度规定起草了电报。但是，朱栋公然违反规定强行压下电报不准上报，并反诬李国堂同志“胆小怕死”，“强迫船长发求救电报”，还指使人在黑板上辱骂李是“假洋鬼子”。顾文广同志严厉提出这样做违反了在船上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朱栋却在第二天亲自在黑板上写出“你们这些假洋鬼子，跳海去吧！”在风庆轮快到新加坡时，顾文广同志利用总结支部工作的机会，就黑板报问题再次提出质问时，朱栋恼羞成怒，跳了起来，拍着桌子说：“你们的问题现在不说，到上海再给你们弄清楚。”

实际上，当时朱栋已经布置人把平时监视李国堂、顾文广的记录，假借群众来信的名义整成诬告材料。

后来才知道，当时接受监视任务的至少有4人。诬告材料共罗列8大问题，54条，共万余字。其内容完全是颠倒是非的，且许多都是歪曲事实的污蔑不实之词。

这些材料将被用来作为攻击交通部和国务院的炮弹。

风庆轮事件的高潮

风庆轮事件从 1974 年初揭开序幕之后，伴随着该轮远航，斗争也从上海转移到了大洋上。直至返沪、斗争已持续达 9 个月之久。

不过，风庆轮事件的高潮还在后头。

“四人帮”必须要选择一个最重要的时机才向最高层抛出这张“王牌”。时机终于到来。

风庆轮返抵上海时正逢 1974 年国庆 25 周年前夕。当时，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正进入最后确定国务院领导人选的阶段。这是“四人帮”篡夺政权能否得逞的关键时刻。

9 月 30 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倾巢出动，借欢迎风庆轮胜利荣归的名义，向中央、国务院、交通部示威，抢尽了远航头功的风头。当时，朱栋迫不及待地吧诬告陷害李、顾的材料交给了《解放日报》记者，并交代说：“请赶快转交市委，是很重要的问题。”

《解放日报》立即以党委办公室名义编了简报，题目是：《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群众来信揭发副政委李国堂的错误言行》，还附上朱栋炮制的所谓群众来信。

“四人帮”的上海死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见到了材料后说：“是交通部派来搞破坏的，是特务。”于是，这份材料很快送到北京。姚文元看后立即批交新华社登《国内动态清样》。这样，“四人帮”就可以把事情闹到政治局去了。

国庆 25 周年纪念活动很快就过去了。10 月 4 日，毛泽东就国务院组成人选第一次表态。他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因病住进医院已经四个多月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项提议意味着什么是不难理解的。

当晚 8 时，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指示。这个消息对“四人帮”组阁阴谋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野心勃勃的“四人帮”必然要制造事端反对毛泽东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而所谓风庆轮问题，这时便成了他们认为已导演成熟的一出好戏。于是“四人帮”一个接一个赤膊上阵，把问题闹到了最高层。

“四人帮”首先借 10 月 13 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诬告李国堂、顾文广的材料大做批判文章，把问题闹到政治局委员面前。

10 月 14 日、江青首先写了以下一大篇批示：

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导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他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装满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号这艘轮船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上意见妥否，请指示。

同日，王洪文紧随江青之后，也批了下面一段话：

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三日告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批判。

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告中央。

张春桥批了以下一段话：

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轮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路线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姚文元当然表示同意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的意见。接下去他还写了下面一段：

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迷外思想是由他的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以上文件经政治局传阅后，退给江青。江青于10月25日再作批示如下：

总理、康老：

这三份传阅件毛主席都看了。现送上请阅。

退江青

周总理批示：已阅。

康生则于10月26日批了下面的话：

同意江青同志在各份材料上的批示，同意洪文、春桥、文元同志的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应该说明的是，江青说的“三份传阅件毛主席都看了”，是指毛主席已经“圈阅”。也就是名字上划过圆圈了。

当时，邓小平也圈阅了上述传阅件。但是，“四人帮”绝不让邓小平以圈阅了事。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在会议末尾，江青蓄意挑衅，质问邓小平：“你对风庆轮是什么意见。”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江青以命令的口吻说：“你要表态。”邓小平气愤地说：“那我还要调查。还要调查。”这时，李先念就把邓小平劝走了。可是，张春桥却心怀叵测地说：“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散会后，江青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到钓鱼台17号楼密谋对策。江青对张、王、姚说，她之所以发火是因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邓小平不支持新生事物。风庆轮船虽不大，毕竟是中国造的，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当晚，“四人帮”密谋决定让王洪文抢在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前，先到长沙去告状。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瞒着周恩来等在京主要领导人，乘专机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接他到毛泽东处。

王洪文恶人先告状，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实际上是

“四人帮”正如当年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那样搞阴谋)。王洪文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表态。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情绪那么大，与最近在参谋长人选和总政主任人选问题上，江青与邓小平意见分歧有关。”王洪文还想说风庆轮问题，当即被毛泽东叉开了。当王洪文讲到叶剑英利用矛盾挑拨他和江青的关系时，毛泽东却问国内经济形势情况。王洪文见毛泽东对他想讲下去的事没有兴趣，只好把政治局讨论过的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名单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名单交给毛泽东，同时提出：董必武、朱德谁当委员长？毛泽东没有表态，随即把名单退给了王洪文。

最后，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形势比人强。不久后的事实说明，王洪文长沙之行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但却被毛泽东发现了“四人帮”的组阁企图。

江青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切等待王洪文告状的结果。但是，江青毕竟做贼心虚，她唯恐王洪文此行难以如愿。10月18日中午，江青迫不及待地王海容、唐闻生召到钓鱼台17号楼。这是因为王、唐两同志即将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江青要王、唐把17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他们国务院那些人借谈工作搞串联”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并让王、唐在当晚9时再来钓鱼台见她。

10月18日晚，王洪文回到北京当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他的长沙之行。

在王洪文长沙碰壁的情况下，“四人帮”一起会见如约前来的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唱主角的是张春桥，他首先说：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争吵是“二月逆流”的重演。接着，张春桥还诽谤说：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中的逆差，都是由国务院领导人“崇洋迷外”造成的。江青再次让王、唐把这些情况报告毛主席。

10月19日，周恩来把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找到305医院。周总理对他们讲了政治局会议的真实情况。指出：江青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问邓小平，邓小平已经忍了很久了。看来，他们是事先计划好的。周总理还说，已告邓小平“这次陪外宾见主席时不要为此事干扰主席，回来后慢慢解决”。周总理问王、唐：这次你们去长沙有没有向主席汇报此事的任务？王、唐两同志回答说：我们没有接受这方面的任务。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报告了“四人帮”及周总理同他们谈话的全部情况。毛泽东听后很生气，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已经在办，江青不应该那样做。毛泽东让王、唐两同志带话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江青批文件，不要江青批一个，他们也跟着批一个，否则，其他人不好办。毛泽东还让王、唐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是对“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粉碎性打击。尽管“四人帮”并未就此罢休，但已经步步被动、次次挨批。他们只能利用上海这个阵地继续捣乱了。

风庆轮事件的落幕及问题的实质

风庆轮事件的落幕，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对李国堂、顾文广两同志的批判和处理；朱栋进入“四人帮”组阁名单及其结局；上海的舆论攻势及其落幕。

在王洪文的指令下，李、顾被扣留上海，并从10月15日起接受批斗。在此后一个月内，他们被200人参加的大会批斗3次；被10人至20人参加的小会批斗22次。加给他们的罪名有“假洋鬼子”、“洋奴”、“汉奸”、“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交通部派来的特务”、“风庆轮上的错误路线代表”、“攻击中央首长”（指对“四人帮”）等等。在批斗期他们组阁阴谋的破产，篡夺交通部大权的梦想也成了一枕黄粱。

1974年10月到11月间，“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挑起风庆轮事件时，上海党羽也卖力地展开了一场超大规模的“成套宣传”攻势。他们组织朱栋等人四处作报告达上百个场次；组织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借机批判所谓“崇洋迷外”的“卖国主义”；还组织《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

在此之前，文化部的“四人帮”死党还打紧急电话令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年内拍一部风庆轮问题的电影，并作为文化部直接抓的“重点片”之一。徐景贤授意他的秘书赶到上影厂文学剧本创作组交底说：“风庆轮要重点搞”，“这个题材如一般地反对崇洋迷外就搞偏了”，“这个剧本要敢于触及中央的部，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要写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要写高级走资派。”“不能只反贪官，不反修正主义的皇帝。”此事后来未见下文。

在报纸宣传方面，由徐景贤、朱永嘉直接指挥，在1974年10月至11月两个月内，《文汇报》共发表了44篇文章（其中有9个是整版）；《解放日报》共用20个版，发表各类文章66篇（其中有画8幅），共约13万字。上海两报使尽浑身解数，既有通讯报导，也有评论、访问记、座谈会纪要，还有照片、图片、杂文、小说，他们称之为“全套宣传”，“连锁宣传”。上海两报的这种超大规模的举动，在上海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而且流毒全国。

“四人帮”及其党羽兴师动众，口诛笔伐。朱永嘉视为重大无比的所谓路线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在前面提到的关于风庆轮事件的背景时，已经接触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党中央、国务院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通过国家经济往来和扩大外贸加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决策本是利国利民之举，也是符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国策的。

邓小平正是在这个关系国策大计的问题上挺身而出与“四人帮”进行面对面的抗争的。这种抗争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第一，就风庆轮事件本身而论，这是“四人帮”及其党羽出于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而制造的一起政治事件。他们使用的手段，无非是歪曲事实，编造虚假情节以混淆视听。他们不仅借风庆轮制造假象，还公然伪造历史，于4月20日在《朝霞》第4期登了一篇《李鸿章出洋》。该文编造了李鸿章出洋购买洋船洋舰的情节，以此影射攻击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领导人“崇洋迷外”。而且威胁说：“如果执迷不悟，甘当洋人走狗，定必痛惩不贷。”这些捣鬼伎俩虽然可以蒙骗不明真相的人于一时，但是许多领导同志却洞若观火后来毛泽东也赞赏说，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开得好。

第二，“四人帮”当时所以能够借买船大做文章，把买船同“洋奴哲学”、“崇洋迷外”、“爬行主义”、“卖国主义”等等罪名划等号，大批特批，这是与泛滥全社会的极左思潮有密切关系的。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我们是走了一段弯路的。建国初期，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是想对外开放的，只不过限于当时国际环境，美国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我们只能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后来由于客观情况变化，也由于我们主观上陷入“左”倾错误，热衷于批判资本主义，我国一度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搞建设，使我们错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世界性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会，丧失了使我国经济得到更快发展的良机。到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我国实行了扩大外贸进出口的政策，这本是审时度势后的正确决策，但是“四人帮”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掀起了这股反对进口的恶浪。这只能说明他们除了玩弄政治阴谋之外，对社会发展规律实在一窍不通。他们既无视我国从明、清以来数百年闭关锁国造成贫穷落后的教训；更不懂得世界已进入开放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间的交往是不行的。如果按照“四人帮”的主张行事，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所以说，“四人帮”的愚蠢无知实属世界之最。

在“风庆轮事件”这一实质上涉及是实行对外开放还是坚持闭关锁国的原则性斗争中，邓小平同志不但对“四人帮”采取了不妥协态度，在他随后领导的1975年整顿工作中，更针对“四人帮”所搞得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政策，明确提出“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并强调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后来，邓小平还说过：“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今天，风庆轮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了，但是，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而言却仍有深远的意义。而今，经济开放政策已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续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苏采青）

“雅典事件”是没有调查的结果——“雅典事件”始末

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肯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相当荒唐的政治错误，是外交界的丑闻。周恩来说：“过去我常讲外事工作无小事，并不是外事没有大小之分，而是说外事工作特别敏感，小事如下注意，也会出大事故。”

1973年5月，我在驻希腊王国首任大使任上，因误赴同我国并无外交关系的以色列的国庆招待会，发生了“雅典事件”，在外文界曾经轰动一时。经过毛主席批示，周总理直接处理，问题得以圆满解决。两位老一辈革命家在处理这这一事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对于部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时萦回脑际，令我终生难忘！

“雅典事件”的发生

希腊王国 1972 年 6 月与我国建交。为了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外交部决定于 1973 年邀请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邀请信由我 3 月赴任时带去。我到雅典后与希腊外交部几度磋商，确定访问时间为 5 月下半月。我于 5 月 7 日中午赴希腊外交部进一步落实具体计划，事毕已是下午 1 点 1 刻。返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比平时增多，表明有重要的外事活动。我问翻译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回大使官邸后，我要翻译去使馆查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 K 字，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请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他见翻译匆匆回来，随口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上回来？这一问不打紧，翻译却因而认走刚才途中所见，就是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的缘故。他匆匆查看请帖，时间是 12 点到 1 点半，离散场只有 10 分钟，更加着慌，也看不清日期，就扔下请帖跑来找我，说是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请我参加，他忘记登记，出了岔子，时间只剩 10 分钟，使馆就在附近，问我怎么办？我一听也很着急，未加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当时我刚端起饭碗，尚未换装，便仓促登车前往。

按照正常的办事程序，大使外出参加活动，翻译事先需将请帖送大使过目，并报告有关情况，来去过的地方，还应与司机一道先去探明道路。我当时匆忙中未看请帖，也未问翻译、司机是否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我们使馆西北，他们都未去过，也不知方向、地址，只知道离我们很近；而东南方还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也不知道。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根本不问路，只顺着警察手势走。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了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腊不久，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见过，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就是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急急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当时《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问我到这里来是否意味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我遂把这一很不寻常的问题只当作是他无故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也觉得记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会，与正侍离去的荷兰、墨西哥、乌拉圭等国大使略事寒暄，即与以色列代表告别，匆匆返馆，《纽约时报》记者回去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下午，在捷国庆招待会上遇到罗马尼亚大使。他叫过我的翻译，神秘他说出了些什么。我见翻译神色不对，便过去问出了什么事？翻译一时竟然说不出后来。再三催问，他才冒了一句：“大使，我犯了大错误了！”经向罗大使再次询问，才知道我们昨天走错了地方，匆匆忙忙地在十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处理经过

从捷使馆回来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有强烈的负罪感。当时“四人帮”乱国，急于进一步篡权，周总理是他们的眼中钉。由于周总理长期主管外交工作，他们企图从外交战线寻找反对总理的口实，很可能利用这一事件，说大使中有坏人，进一步迫害外事干部，掀起反对总理的新浪潮。为避免“四人帮”插手，防止事态的扩大化和复杂化，在事件发生的次日，我主持召开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地、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造成的影响；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犯错的情况，并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外交部接到我的报告后，复电同意补救措施，查询犯错误的详细情况，并召我回国，要原定回国参加接待希腊副首相的政务参赞申志伟留馆主持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安排，使馆同志都为我担心。翻译尤为紧张，哭泣着说他断送了大使的前程。为防止发生事故，我找他谈心，明确表示这次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我回国后承担全部责任，希望他不要过分紧张，而应吸取教训，立功补过。同时向他说明，我这次错误严重，但毕竟是工作错误，我可能不再当大使，也可能调离外交部，但组织上一定会分配我工作，谈不上断送。这次谈话后他情绪开始好转。

我坚决执行外交部命令，于14日下午乘法航班机回国，15日晚到达北京。16日上午一上班，我即去外交部报到。当时仲曦东、乔冠华两位副部长先后与我谈话，他们都说我这次闯了大祸，但态度很好，这样快就回来，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他们知道我有心脏病，都嘱咐我不要过分紧张，先休息两天，再写检查，谈其它问题。他们这种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但我丝毫未敢懈怠，回家后立即写检讨。17日一早，西欧司司长王栋到我家中，说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已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肯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上午就要开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要我赶快写检讨，以便一并上报。我当即连夜赶写出来的检讨报告交给他。与此同时，驻希腊使馆在接到外交部通报后，也立即向外交部作了检讨，主动分担责任，并报告我到使馆后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以及错误发生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认真检查等情况。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了我使馆的检讨，一致认为我所犯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我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免予处分，让我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外交部领导还主动承担责任，于18日下午召集部和部属各单位全体同志传达“雅典事件”，并结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安排十天时间进行小整风。

外交部的报告于19日上报总理。总理立即批示同意，并决定我参加希腊副首相接待工作后，看看主要外交文件，立即返使馆工作。当乔冠华副部长告我这一消息时，我实在大出意外，感动万分，心头的一块巨石顿时落地。总理于21日批发了外交部第二次通报。“雅典事件”至此可以说已经解决。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

5月24日，毛主席看到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外交部19日报告，以及所附的我和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我对所犯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把‘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了。总理见到毛主席这一批示后加批：“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以鼓励。

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

外交部于26日发出了第三次通报，使“雅典事件”得到了彻底解决。

本来，“雅典事件”的性质，我在雅典向外交部作的初步检查和回国后的进一步检查中，都确认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因为从“雅典事件”本身看，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当成科威特的，又糊里糊涂错到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去祝贺国庆，当然是既严重又荒唐的政治错误。总理和外交部都同意了我的这一看法，并写入了外交部的通报和报告，是很自然的。毛主席予以否定后，我反复寻思，深感这不仅反映了毛主席的宽厚，也反映了他老人家综观全局、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从事件的起因看，确实“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如果事前对驻地周围环境作过调查，知道我们使馆东南有一个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是绝不会发生此事的。从事件的全过程看，主要是忙中出错，事后我们又采取了补救措施，未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毛主席改变“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完全正确的。

总理的亲切教诲

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于5月20日来访，我参加了接待工作的全过程。5月25日，总理接见马及其代表团主要成员，乔冠华、王栋同志和我陪见。交谈中，总理主动谈到我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机构的事，并就我将返使馆工作征求意见。马表示这有偶然性，与他们警察指挥错误也有关系，感谢中国政府允许周大使回去。会见结束后，我们向总理告辞，总理要乔冠华同志和我留下来再谈一会。坐定后，我感谢总理对我所犯错误的宽大处理，给我立功补过的机会。总理笑青说：“要感谢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这件事这样结束，我当然很高兴。过去我常讲外事工作无小事，并不是外事没有大小之分，而是说外事工作特别敏感，小事如不注意，也会出大事故，所以遇事要谨慎。经过这次事件，我想你会有深刻理解了。”总理还问翻译和司机的情况，问他们为何如此不负责任？我说他们与我一样，都是忙中出错，现在他们都很沉痛紧张，主要责任在我，希望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总理轻松地转变话题说：“好了，事情已经过去，别谈这些了，还是谈谈希腊吧。那是西方的文明古国，她的今天和过去都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先听听乔老爷的意见。”乔冠华同志就希腊的哲学、经济学和文学艺术等概略他讲了一些看法。总理饶有兴趣地听着，问我到过希腊什么地方。我说初到希腊，尚未离开过雅典。总理要我回使馆后多出去看看，不仅要研究希腊的今天，还在下功夫研究她的过去，待下次回国时，要听听我的汇报。这一席话时间不长，却使人如沐春风。总理神采奕奕，但比过去消瘦了。当时还以为只是操劳过度，不知总理已患癌症。乔冠华同志可能知道，还是他及时煞住话头，说不能再占总理的宝贵时间了。我们于是辞别了总理。总理1974年住进医院，直至不起。这次晤谈，竟成永诀！

（周伯萍）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决议。邓小平答曰：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柔中寓刚。——邓小平在 1975 年

1973 年 12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现在，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他说，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

毛又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毛泽东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江青说：“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邓小平正视江青，说出一句话：“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历史的呼唤

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圈阅，中共中央发出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很快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几年的、被诬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国家领导人，在1973年春重返政坛后，现在进一步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可谓1975年新年伊始国内爆出的一大新闻。时值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时刻，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讲，这一消息无异于是在心头燃响了一枚充满着希望的爆竹。

史料记载下了这样一个场面。几个月前，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几位教授曾在私下里有过“邓小平还得主政”的推测。此时，预言成为现实。这些平日少言寡语、老成持重的教授们在讨论发言时，禁不住眉飞色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果真如此！果真如此啊！”

“这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这些思想敏锐的老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预感得到证实而兴奋不已，使他们由衷欣喜的深层原因是，他们以犀利的眼光看出：大乱了9年的中国终于出现了“大治”的转机。

一位四川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技术员，在“文化大革命”的8年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场运动的严重危害。从1974年开始，他以“心赤客”的笔名，不断上书中共中央。他痛斥江青等“三男一女”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寄殷切期望于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现在，他又一次激动难抑，提笔给邓小平写信了。他的信，记述了1975年年初，大多数中国人对邓小平新任职务的反应。他写道：

“当你任总长的消息传达后，全国、特别是军队，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人感动得热泪长流。”“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是谁，使国家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又是谁使国家落到这步田地。谁是人民的儿子，谁又是民族的罪人，人民都看清楚了。”“不甘心民族重遭奴役，国家重受破碎的中国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您和你们身上。”

邓小平担任党和军队领导要职的消息，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出现了热烈反响。一时间，“邓小平”这个名字和与他有关的轶闻趣事联系在一起，成了中华大地上说着各种方言的人们日常交谈的热门话题。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里，邓小平是个传奇人物。

1920年，这位矮个子的四川广安人，刚满16岁，就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党。他于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年底回国，23岁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从此成为曲折发展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几起几落的人物。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他同张云逸、韦拔群等人先后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任两军的政委，开辟了右江和左江革命根据地。几年后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先是被党内“左”倾领导者点名批判，邓小平拒不认错，又被撤去一切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最后被发配到江西宁都一个山上不长树、地上不长草的山岗挥锄垦荒。

以后经李富春、王稼祥等同志的帮助，他才调到总政主编

《红星报》。在长征途中，邓小平第二次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大战略区和野战军的领导职务。1948年，他与刘伯承、陈毅等人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成为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的著名元戎。在党的“七大”上，他首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央领导层。

新中国建立不久，他调到中央担任党、政、军要职，并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比较年轻的领导人之一。从此，他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担负起领导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在中苏关系出现重大原则分歧并趋于恶化时，他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不卑不亢，当面与赫鲁晓夫“摊牌”抗衡。毛泽东评价说，邓是个战士，像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导人，在“文革”中却被诬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凌辱、批斗。1969年10月，邓小平与家人被下放到江西，在新建县的一个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邓小平过了3年饱尝孤独的生活后，他居然“打”而不倒，再次复出。在周恩来病重住院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现在又进一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这自然成为举国上下热切关注的一大新闻。

邓小平被委以重任，使1975年这一年刚刚开头便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不过，这仅仅是中国政坛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征候。相隔几天，又有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接踵而来。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当讲到今后的任务时，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的嗓音逐渐响亮了。他向全国人民重新展示了他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设想，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身体衰弱的周恩来用不断增强的声音展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时，他瘦削、憔悴的面庞泛起了红晕。台下，许多人眼里涌出泪水，人们的心，随着这声震屋瓦的宣读加快了跳动……

中国现代化，这是凝聚着多少仁人志士、炎黄子孙毕生理想的辉煌目标啊！自甲午战败，国运衰落，民生艰困，正是这国富民强的目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捐躯洒血，忘我奋战……

可是，自从“文化大革命”的旋风从神州大地刮起之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却总是浮浮沉沉，飘忽不定。如今，当中国走过一段风雨交加的历程之后，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又一次高矗在中国人民面前！它带着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芽透了历史积淀的厚厚尘埃，从周恩来总理那深陷的、却目光炯炯的眼睛里流溢出来，从正直的人民代表漾溢着兴奋表情的脸上流溢出来，从人民大会堂的每一个角落向上空汇集，渐渐形成一股暖流向全国扩散……

在周原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部分，只是不长的一段文字，然而这一段文字却在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经历了9年社会动乱的人民共和国的航船，在波翻浪涌的历程中，将要调转船体，……

这个重要的信息，连同邓小平重新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任命，像是1975年中国政坛上迎接春天到来的两声脆炮，先后在神州大地爆响。从此，中国社会便在那个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导引下，拉开了新的一幕。

乍暖还寒

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更加严重。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第一副总理紧张地工作起来。

四届人大闭幕后1个星期，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邓小平从严治军在军内外是有名的。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接连打了5个大胜仗之后，一部分指战员滋生居功自傲情绪，违纪现象不断发生。对此，作为大军区政委的邓小平与司令员刘伯承发布一个整顿军纪的命令，规定对违纪者，营以上的干部“经批准后处理”，“连以下人员就地处决”。这个命令在前线传为佳话。

现在，在邓小平重新走上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后，他又一次来到离别已久的军队干部当中。此刻，他靠近讲台，目光从会场扫过，满满一会上众多的红星闪着光亮。那红五星像是延安宝塔山下无数的灯火，闪烁青光芒，聚集在党中央周围……

可是，现在的情况呢？

两年前，他在江西被监督劳动期间，已经对“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有了深切感受。在他接到党中央的通知，从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快列车竟晚点3个多小时。他忧郁地望着窗外：铅云低垂、原野清寂。在早已超过停发时间的站台上浮动着一层令人压抑的空气，你挤我推，人头攒动，喊叫声、咒骂声、跑步声，一切都吞没在似乎凝滞的空气中……联想到自己在江西各地耳闻目睹的种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他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一路上，时断时续的车轮声不停地在耳边回响……他彻夜难眠。

四届人大前后，从反映各地情况的材料和汇报里，他深深感到了国内问题的严重。

邓小平坐在讲台上。他静默了一会儿，望着台下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在群众场合说出了他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的第一句话：

“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

他满怀深情地从井冈山讲起，讲党的领导，讲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讲组织纪律性。他高亢激昂他说：“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忽然，他沉下脸来严肃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邓小平声色俱厉地说着，一些令人忧虑的镜头不断地在他眼前闪现——一些地方，少数人频繁地出入军营内外，传播小道消息，进行各种非组织活动。有些群众在派头头的怂恿下，涌进部队驻地，以种种“革命”理由抢夺枪支弹药，进行武斗……

批林批孔运动已经1年了。可是如今，全国各地仍可见到江青等人“点火放炮”、“放火烧荒”的痕迹……

一年前，“四人帮”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张春桥公然鼓吹：“造

反派要打天下，而且要坐天下”……

“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叫喊着“要砸开党的大门，改造党委领导”，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他们把“坐天下”作为“要解决的最高问题”，迫不及待地给所在的省、市委提出长串名单，强令省、市委按照名单安排领导职务。他们坐着小轿车，带着秘书、警卫等随从，到处横冲直撞，正如一位造反派头头在以后写的检查材料中所说的那样，自以为“有了一帮人，就有了一帮势力”，“就可以无法无天称王称霸他们把四届人大的召开看成是权力再分配的机会，指望着江青等人在全国人大组阁时地位的上升，能为自己今后的飞黄腾达打开通路。一位造反派头头如实描述了自己的心态：“走路想着坐天下，吃饭想着坐天下，开会想着坐天下，睡觉梦着坐天下”，一想到“坐天下”，就像“夏天吃棒冰，无限舒服”

可惜好梦不长。

四届人大的召开，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彻底挫败了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这使一帮曾为“坐天下”而坐卧不宁的造反派头头大失所望，不满、怨愤、嫉恨。他们心中的妒火十倍地迸发，骤然间化作了疯狂地冲砸一切的行动。

邓小平不能平静了，他克制着自己，果断地说：

“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军队的整顿，一个是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他深知，在目前的形势下，在歪风邪气面前，必须使党的优良传统发扬起来，才能把歪风邪气压下去。他相信，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有着近50年优良传统的人民军队中间，什么“放火烧荒”、拉帮结派、“反潮流”这一套，是没有多少市场的。必须让那些热衷于闹派性的人知道，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这里行不通！不仅如此，从现在起，在全国也行不通！

会场里一次次迸发出热烈的掌声。

逐渐增强的太阳的热力使大地回春，但是，1975年年初的天气仍是寒冷的。

在几个武斗严重的地区，交通面临着中断的危险：铁轨上静卧着一列列火车，冷风从两节车厢中穿过，呜呜地响。在国家经济运转的“大动脉”上，没有了汽笛长鸣，没有了车轮转动。车站上冷冷清清，弥漫着可怕的、濒死的沉寂。

许多厂矿因生铁煤电供应不足，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一些厂矿已经被迫停产。规章制度的松弛，使一些厂矿陷入瘫痪或半瘫痪。市场商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许多城市均反映，商品品种大大减少。在一些较大的百货和食品商店，除一些样品外，货架经常是空的。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的杭州市，不少商品脱销。新年刚过，在滴着冰水的商店屋檐下，可见到排长队抢购棉布、猪肉、糕点，以至火柴和食盐的群众。

寒风卷过陇中。在一道道裂痕交错，黄土覆盖的高原上出现了外流要饭的农民。他们身穿黑布棉袄，背着铺盖卷，三三两两，踉跄而行。这些在路边伸手乞讨的人，多数并非老弱病残、婆姨女子，而是一些年富力强的汉子。在他们向路人伸出了黑得发亮的手之后，便从怀中掏出盖有生产队大红印章的介绍信。这些大红印章，在呼啸的寒风中传递着令人震撼的信息。

四届人大的召开，固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还久久地在大地上空回荡。

1975年，既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年份，也是冷、暖两股气流顽强对峙的年份。

邓公的“钢铁公司”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你呢（指邓小平），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也许是巧合，47年前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因为他身材矮小，能言善辩，更由于他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曾被同学们称为“小钢炮”。47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也用“钢”来比喻他，在劝诫中也肯定了他性格刚毅的特点。

不到1年，邓公的“钢铁公司”正式打响了。事情起因于“四人帮”挑起的“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远洋货轮，1974年5月由上海港启程远航。9月底顺利返抵吴淞口。“四人帮”利用“风庆轮”试航成功，企图否定60年代以后中央为尽早结束高价租用外轮而制定的造船和买船并进的方针，将进口外国船舶和其它先进设备说成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把矛头指向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4年10月中旬，“四人帮”为了阻挠邓小平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逼迫邓小平对他们认定的买船是“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路线”表明态度。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回答：“我要调查。”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拥而上，起而攻之，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随即起身，愤然离开了会场。……

那次会议后的一天，邓小平又见到江青。面对行若无事趾高气扬的江青，他想起了一段插曲。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针对江青动辄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的作法，批评江青开“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江青故意把矛头转向邓小平，说：“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他沉默了一会儿，抬头正视着江青，说出了一句话：“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几个月后，在邓小平主持国家日常工作短短的时间里，对于邓小平这个人，不管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开始体会到了邓公“钢铁公司”的份量。

1975年3月初，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独具特色的见面方式和撼动人心的讲话，给到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开会那天，国务院主管工业的领导干部和各省、市、区的工业书记聚集在会议厅里。听说邓小平要参加会议并讲话，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特别是那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对这位老首长重新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感到由衷的喜悦。一些人禁不住喜上眉梢，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一些人下意识地看手表，左顾右盼地环视着，希望能快一点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领导。

离开会的时间还差几分钟，忽然一个边门打开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议厅。他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体阔肩宽，步伐稳健，显得刚毅有力。他神态安详地环顾四周。半个世纪斗争风雨的磨炼，使他既不露喜，也不显优。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和热烈的问候，他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

一会儿，几个省、市领导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想与邓小平握手。邓小平却迅速地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

“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这句话，使全场刹时鸦雀无声。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僵僵地怔住了，两眼定定地望着邓小平。

邓小平走近大家，站住脚，目光从会场扫过、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这种对 1975 年年初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在场的大多数工业书记心中共有的认识，但是用来代替见面的礼节，却是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

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不紧不慢地划着火柴，吸燃一支烟，开口说道：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 25 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向左右望着，以不容反驳的力度大声说：

“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磕磕烟灰，吸了口烟，接着讲：“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

他审视着在场的人，把茶杯盖儿“哒”地一声盖在杯上，提高嗓门说：“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他从农业谈到工业，然后说：“今年是第 4 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 5 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接着，他讲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需要采取的措施。他一条一条地讲，声音由低渐高，忽然，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茶水溅了出来：“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

他停顿了一下。稍顷，接着讲：“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

他越讲，神情越严肃：

“另外一种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

他的声音严厉，特别是讲到少数坏人“利用派性浑水摸鱼”，“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时，言辞铿锵，语如重锤。全场悄无声息。

他疾言厉色地继续说：“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他不能平静了。

最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他以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

他的出现和他的讲话，使到会者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及至散会时，许多人的表情还是严肃的。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决定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据说，同时邓小平曾令徐州驻军同闹派性的头头“谈判”，结果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很快结束了徐州的混乱局面，一共只抓了3个坏头头。

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大的反响。

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在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在铁路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响亮地提出：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万里一边讲，一路跑，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很快地，严重堵塞的几个路局全部疏通，实现了万里1个月前提出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口号。

铁路整顿见了成效之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上来。军队、军工、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的整顿也厉兵秣马，酝酿展开。

正在外地治疗腿伤的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应召回京。在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找他谈话后，拖着未治愈的伤腿出征了。他拄着手杖、上飞机，下基层，奔走在混乱不堪的国防科工战线。在有名的“老大难”单位七机部，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正言厉色他说：在问题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

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在省委会议上表示：要拼着老命干，不要怕打倒！浙江省委规定：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允许参加任何派性活动。此外，还明确提出，要把被坏人“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杭州市连续三次召开批判派性的大会。每场参加者逾万。

福州。武汉。郑州……

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为社会安定而围歼派性的战斗打响了！

到处在批派性，讲团结，组建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到处在讲大局，抓生产，恢复健全规章制度。

寒风骤起

在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有步骤地向更广的领域推开时，绝不善罢甘休的“四人帮”也在进行着紧张的活动。

在他们的布置下，上百名负特殊使命的人，频繁地出入于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各个部门，足迹遍于浙江、福建、四川等省，邓小平、万里、张爱萍、谭启龙等领导同志在各处的活动情况随时被上报到姚文元等人的办公室。

很快地，一股寒风又在中国大地刮起来。

张春桥首先上阵，打出了头炮。1975年3月初，他让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关于批经验主义的一段话。同时在全军总政治部召开的一次会上，张春桥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命题，要求把反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

接着，姚文元指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点突出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要求新华社立即“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才效果好”。

江青还怕不够劲，又亲自下达电话指示，强调：“现在我们党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讲到此处，她仍嫌不够味儿，进一步提高了调门：“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务必“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能力，否则就会变修”。

对于“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提出，“四人帮”的死党们早已在私下有所议论并有所准备。此时，头头一旦发话，他们便四处活动，上下其手，紧锣密鼓地配合行动起来。

他们或召开大小会议进行动员，或找人“交底”提供“炮弹”。他们叫喊道：那些老家伙凭“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老经验办事，抓规章制度，抓生产，无非是搞修正主义。他们是走资派！他们的经验是复辟倒退的经验！

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全国大小报刊杂志的主要版面均充斥着耸人听闻的批判所谓经验主义的文章。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危险”，“修正主义的货色”等“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抛了出来。这不能不使善良的人们困惑不解，心生疑虑：

怎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又来了？

实现四个现代化，整顿，生产，……难道是“资本主义复辟”吗？

一个党、一个国家真正的危险是什么？

寒风骤起，沙石滚动。

从整顿工作开始以来，各地掌了权的造反派头头们面色阴郁。他们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有的被调离领导岗位，送进了学习班；有的像自己当年批斗走资派一样，被押送上台，受到批判。在他们搞乱社会、为害四方的大量材料面前，这些曾经不可一世、欺上压下的乱世名人，如坐针毡，心神不宁，突然间感受到了如临深渊的恐惧。

现在，“反经验主义”的鼓噪一旦响起，他们仿佛在悬崖边上看到了希望，立时平添了勇气，又抖擞上阵了。

他们开始在群众中串连，重新拉起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纷纷聚集在“反经验主义”的大旗下，一方呼喊，四方应合。其队伍组成有了不同于以前的特点，正如中共广东省常委会上一位书记指出的：目前抬头的派性，

表现形式有个特点，主要不是“派”与“派”之间闹，而是“派”与“派”联合起来向党闹。

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煽动停工停产，频繁地在厂矿企业间串连，扬言：“要拖住生产，硬把他们拖垮！”

“反经验主义”的声浪，又一次扰乱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形势的扑朔迷离、变化无常就是这样令人咋舌。几年来，“四人帮”已经形成了揣摩毛泽东的思路，打着“革命”的旗号，达到自己目的的活动特点。三年前，张春桥针对周恩来在林彪叛国事件后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就曾经用毛泽东在历史上对经验主义倾向有过的批评，影射攻击周恩来，果然一矢中的。那一次，毛泽东作出了在批林整风中，只准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而不准批极左思潮的决断，使周恩来纠“左”的努力被迫中断。

现在，他们又一次以更大的舆论声势掀起了“反经验主义”的浪潮。他们似乎比一切都目光锐利嗅觉灵敏，都更加忠诚毛泽东，更加关心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向一切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人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其实，对于“四人帮”而言，他们对理论的真正兴趣在于实用主义的需要。他们在组阁阴谋失败以后，面对邓小平领导的快速发展的整顿形势，深感岌岌可危，只能通过制造舆论来扭转局面。

“反经验主义”正是他们窥测时机，变被动为主动的政治棋盘上的关键一着。

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与3年前极其相似的一幕。

3年前，在批判极左思潮过程中出现的形势逆转，还会出现么？

捅“马蜂窝”

夕阳西沉，霞光倾泻时，邓小平沿着小径缓缓地走着。饭后散步是他喜爱的、使全身放松的活动。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处院落，树丛被淡淡地洒上了一层美丽的光泽。但是，这静寂的傍晚，丝毫没有减轻邓小平此时所承受的压力。“反经验主义”来势凶猛。现在这样搞，是毛泽东的意图吗？如果把对全国工作的整顿视为“经验主义”，那么，应该怎样去整顿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要不要强调呢？

阳光落尽，树丛发暗，听得见晚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邓小平习惯地把左手插入裤袋，右手有力地前后摆动，低头走着。近几个月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谈话跃然眼前——

去年，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全国再次出现了严重混乱的局面。对此，毛泽东深感不安。他不断地对江青等人“放火烧荒”、搞乱全国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去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郑重地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1月，毛泽东在听取李先念等汇报1974年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时又指出：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支持由周恩来“组阁”，一再对“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提出了严肃批评。

更重要的是，在周恩来的病情日益严重，而王洪文又使他明显地感到失望的情况下，他对邓小平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他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他明确地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比王洪文强。

从这一桩桩的举动中，显而易见，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并使这种“左”倾错误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年迈多病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9年之后，现在，“大治”天下的愿望愈发强烈。他把这种愿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把邓小平推到了治国安邦的第一线。

庭院静静的，晚风吹动着邓小平的衣襟。1年多来，在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实践中，他深深感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政治生活的不正常。1974年前后，“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一次次地发难，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不断掀起剧烈斗争的波澜。

1973年年底，“四人帮”抓住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大做文章。江青凶狠地叫嚷：“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她还当面指责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身体刚刚发胖的姚文元也瞪眼跟着叫。此事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和纠正。

不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又上窜下跳，四处送信，大造舆论，批林批孔兼批周公；同时大反“走后门”，把矛头引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批评说：三箭齐发，搞乱了，成了三个主题，也不告诉我……

接着，是四届人大召开前，“四人帮”为了实现组阁阴谋而挑起的“风庆轮事件”……

一次次发难，一次次挑衅，其矛头所向，其实质所在，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当洞若观火。每一次挑起事端的，都是这一帮人。这是把“革命”二字

挂在嘴边，掺和着唾液随意咀嚼的一帮人。不过，现今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的斗争，不同于以往，甚至也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不完全一样。这一帮人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伪装、特殊的能量。每一次斗争的浪头都来势凶猛，而且挥舞着“最高指示”吓唬人……

眼下的“反经验主义”与以前的一桩桩事情，颇有同工异曲之处……

邓小平决定了。他要直接向毛泽东“请教”，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作一次专门的“请教”。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请教”。其锋芒所向也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

“马蜂窝”——不捅不行。捅之不易。

不捅……是进，是退？

捅之……是成，是败？

许多老一辈的领导同志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1975年春天，历史为中国选择的风云人物只能是邓小平。

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这是邓小平。他对干部讲过：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

横下一条心，不怕再一次被批倒！这是邓小平。他曾幽默他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最多，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起来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了。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这次“请教”，很快有了反响。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还写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批示一传达，立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批还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

那些正在老干部面前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态度收敛，声细如蝇了。

为邓小平的“请教”捏着汗的老一辈领导同志，会心地笑了。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在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时间不久，“四人帮”就大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干部，与毛泽东此时“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是完全相悖的。毛泽东的批示，从根本上扭转了“四人帮”提出的以“反经验主义为纲”在全国造成的混乱。

然而，毛泽东并不止于此。

虽然年迈多病，头脑仍很清醒的毛泽东，从“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中，对“四人帮”，尤其是江青断章取义、另搞一套的作法，又一次产生了警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他说：“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

接下来，他检讨自己也犯了错误，因患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张春桥那篇反经验主义的讲话，自己只听了一遍，没有听出问题。

他又一次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他严肃地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他再次提到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件“三箭齐发”的事情。接着，他责备在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

他用一双蒙着白翳的老花眼睛看着大家，语气恳切，再三再四地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要求“四人帮”对这次犯错误，作自我批评。

他的目光冷冷地扫过江青，说，“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他的声音从容、迂缓，内里却透着凛凛威严。他一句一顿地讲，语句警人，余味深长：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中央委员更要谨慎。”这些话说得平心静气，却鞭辟入里，戳到了江青的痛处。毛泽东的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不过，这次不是使正在发展的整顿形势发生逆转，而是为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打开了通路。

自此以后，在一个时期里，“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移花接木，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了。可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要让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已任的“革命家”承认错误，实在不易。

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上，“四人帮”近几年搞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进一步的批评。

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四下放“风”。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向人诉说，政治局会上大家的“讲话过了头”。说着说着，不甘屈从的情绪浮泛上来，越说，气越足；越说，火越大；越说，他们的调门又提高了。他们横眉竖眼地叫着：政治局会议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事情是这样的富于戏剧性：是与非、黑与白、善与恶，原来是明明白白地摆着，转瞬间，却完全颠倒了。政治场上的是非原则之争，在江青那张嬉笑骂阴晴多变的脸上、嘴上，竟像脸谱变换、曲调调整一样地易如反掌……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政坛上，江青演了多少这样的戏……

然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举行。“四人帮”继续受批评。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

他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太浅。”

他紧紧抓住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声色俱厉地质问：“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没有什么过头的。”

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这一番话，单刀直入，有如蓄久速发的惊雷从会场滚过。

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默然不语地坐着，会场出现了长久的沉默。

张春桥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终于，王洪文发言了，多少做了点自我批评。

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她没有忘记强调客观：“上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变化是如此的迅速，如此的强烈！

9年来，江青等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现在沉闷垂首地接受批评，这还是第一次。1年半以前，也是在这样的场合，也是在这些人中间，那个在周恩来、叶剑英面前颐指气使，狂妄专横的江青，今天已经茫然失措，张口结舌了。

不到1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于1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第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全方位的整顿

邓小平领导的反对派性，反对批判所谓“经验主义”的斗争作为整顿工作的前哨战，首战告捷。把“四人帮”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后，邓小平并未松懈。

政治局会议刚结束，他就连续作战，在5月29日召开的全国钢铁会议上“开炮”了。

他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几个月后，9月27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他还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讲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这些话，既是对前段斗争的总结，也是新的战斗部署。

显然，前段虽是锋芒初露，颇见成效，但是，有待整顿的方面还是大量的，存在的问题仍是尖锐的，没有英勇顽强，敢斗敢于的“作战”精神，全国的局面还是“扭转不过来”。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更加广泛、深入的整顿工作迅速地在各条战线开展起来。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他气愤地脱稿讲话，严厉说道：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下，他亲自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把部队掌握好，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工作，为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巩固的组织基础。

在中国科学院的院部及所属单位，活跃着胡耀邦瘦小精干、不知疲倦的身影。他主持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科研机关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这个风要吹起来”，“刮8级不行，得刮上12级台风”。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搞了54年。28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26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会骂……。”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

在“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回响着教育部长周荣鑫响亮的声音，“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根

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光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在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后，这块被“四人帮”把持的领域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人们奔走相告，为“四人帮”的禁令被打破而欢欣鼓舞。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的日子，《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重新公演，“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老家伙”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在文艺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宣传理论阵地。为了打破这一块被“四人帮”控制的一统天下，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在宣传理论领域也展开了。6月至7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以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老的理论工作者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研究室。为了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许多重要的文件开始起草，一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振聋发聩、战斗性极强的重要思想逐渐形成了……

1975年的夏季是火热的，芳菲正浓，万物争荣。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领导班子——经济领域——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全方位作战。

这是从“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挫折中觉醒过来的干部、群众，满腔热忱地投入其中的全方位作战。

1975年全面整顿的发展趋势很清楚，邓小平和他的战友组成的“作战指挥部”，“横下一条心”，竭尽全力所要“扭转”的，不仅是严重混乱的社会和生产秩序，也不仅是“四人帮”趁机夺权的嚣张气焰，而且是力图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这是斗争逻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全国正在好转的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1975年，偏离了正确航向的人民共和国的航船正在调转船体，驶入正确航道……

尾 声

受到中央政治局批评后，“四人帮”虽然一度有所收敛，但是内心的不满却使他们一刻也平静不下来。

“四人帮”处心积虑，伺机反扑。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四人帮”闻讯后，立刻借题发挥，掀起了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浪潮。

江青离开北京，跑到大寨，四处散布说邓小平开会斗了她几个月。她破口大骂，对着虎头山尽情发泄内心的怨愤。

江青鼓动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10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她的仇恨露骨地发泄出来：“《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邓小平将江青的讲话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同意江青的讲话，他斥责道：“放屁，文不对题。”

“四人帮”热衷于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时候，恰恰是整顿工作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由经济领域深入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整顿，正开始对一个个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进行着艰难的再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些困扰了中国共产党10几年的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如今，在中国经历了9年“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实践之后，又一次提到了处在整顿第一线的领导同志面前。

巨大的历史挫折往往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

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一批有胆有识的老革命家放在了这样一个百年不遇的文汇点上：过去与未来；挫折与成就；主观与实践；旧观念与新认识……反复比较，激烈碰撞，相互斗争，激发孕育……

原先困惑的，现在清楚了。可是，清楚了的认识，却与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理论体系发生了冲突；

本来不成熟的，逐渐成熟了。然而，成熟了的思想又与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存在着差距。

整顿工作的深入发展，已使新一轮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迫近……

1975年，对于毛泽东，是一个不轻松的年份。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此时的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他一生中所做的、可与创立新中国并列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迫切地想扭转“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社会出现的混乱现象，希望实现社会安定，加快经济发展。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却与安定团结、经济发展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矛盾。

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旦这个前提条件不存在，他对

邓小平的支持也将不复存在。

“四人帮”深知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们又一次开始活动了。

这一次，他们打头阵的是毛泽东的侄子、“四人帮”的亲信毛远新。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

毛泽东在不断听到、并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的态度变了。他在听取汇报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他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希望能够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邓小平谢绝了。答复是：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寓刚。

1975年11月起，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先后靠边站了。

然而，邓公“钢铁公司”的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驳斥：

“说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邓小平沉默不语。每天黄昏日落之前，他仍在散步，一圈一圈地走着……

1975年12月初，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仍是共和国副总理的邓小平参加了中美会谈。在涉及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为了“不抛弃老朋友”，仍是徘徊瞻顾，踟蹰不前。

邓小平代表中方斩钉截铁地回答，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有三条：第一，同台湾断交；第二，废除美蒋条约；第三，撤军。实现了这三条，就可以建交。

此时的邓小平，虽然身处逆境，仍是兀然不动。

不久，邓小平下台了。这是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不过在他这一次身处逆境时，毛泽东仍然对他采取了保护态度，指示“保留他的党籍”，派出专人、专门部队保卫他的安全。

邓小平再次下台带来的厄运，决不仅限于他个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民族、他的国家又一次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

邓小平下台了。但是，他和他的战友所进行的9个月的整顿，不仅给了“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以沉重打击，而且强烈地冲击着“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使全国笼罩着的“左”倾空气进一步淡薄了，也使在“左”倾错误的迷雾中困惑、痛苦的人们看到了希望……邓小平下台了。但是，他和他的战友在整顿中提出的重要思想，仍在深入人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印发的、作为“批邓”的靶子用的所谓“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三篇文章）在散发过程中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思想共鸣。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使数以万计的人们在比较，在思考，在选择……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批邓”；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四化”……“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展，恰恰与发动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广大群众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矛盾迅速地激化了！爆发了！1976年春天，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及“左”倾错误的强大的人民抗议运动发生了！在这一震动全国、震动世界的“四·五运动”中，“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成了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沟通思想、互相鼓舞的力量源泉。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旗帜下，人民群众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斗争最终汇合成强大的历史潮流，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进程。这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1975年邓小平和他的战友，在整顿中力图使全国“扭转”过来的发展方向。历史注定了若干年后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仍将是邓小平。邓小平这种当之无愧的历史地位，奠定在1975年。1年半以后，邓小平又一次重返政坛……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第二次新的革命。

（张化）

胡耀邦说：“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

——中国科学院

1975年整顿始末胡耀邦在中科院团员大会上说：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再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假使我能挣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将向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祝贺……1975年中国科学院的整顿是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科学院的整顿过程中，胡耀邦同志从科技路线、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着手纠正“左”倾错误，从而使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在全面的整顿中处于重要地位。

“文化革命”对中科院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

1975年7月,党中央决定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党中央作出这一决定,首先是由于在全国逐步展开的整顿工作客观上促使着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的大局。如果农业搞不好,要拖工业的后腿;而如果“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因此,“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科技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使之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也是科技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国科学院是深受其害的“重灾区”之一,科学院在科研路线、专业队伍、科研机构等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首先,科研工作正确的方针政策遭到批判和否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在建国后17年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深入人心的“科学十四条”和1962年的广州会议精神等,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受到了批判;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科学研究工作也被指责为“三脱离”,即:科研“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是“专家路线”、“崇洋媚外”,等等。在批判科研工作所谓“三脱离”的同时,基础理论研究遭到了否定。为了扭转“多年来资产阶级世界观及方法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江青、陈伯达等人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视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开展了对“相对论”的批判。1970年,陈伯达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要把这一场批判“搞成群众运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正式出版《相对论问题讨论》刊物,并准备在生物学、地学等领域也开展类似的批判,对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了沉重的压力。中国科学院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黑线”的高潮中,各种名目的大批判联络站达73个之多。科研人员失去了从事研究工作应有的环境与条件,科研工作不断被削弱。“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科学院经费大大下降,1967年的经费只占1965年的16%。1970年以后经费略有增加,但1976年的经费还比1965年减少1/3以上。

其次,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受到批判和摧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因参与制定或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而受到批判。如: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被污蔑为“三高政策——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执行“学位、学衔”有关规定被指责为搞“名利挂帅”、“专家路线”、“引诱青年走个人奋斗的邪路”等。科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叛徒”或“特务”。许多科学家被打成追随“美帝”或“苏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广大知识分子被污蔑为“复辟基础”、“个人名利”、“知识私有”、“技术挂帅”、“学院式研究”等。1971年1至3月,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中公开称知识分子是“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北京地区170位高研中有131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对象。这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在被立案审查或非法监禁期间,受到残酷折磨。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占全院职工总数

的 0.38%；被迫害致死的科技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 0.41%。除了被审查或打倒外，科学院大批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不少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摧残。

再次，领导班子被改组，研究机构被肢解。

中国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1965 年，科学院拥有 106 个研究所，24714 名科技人员，基本形成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研究中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被视为一个“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应该“打碎”、“砸烂”的单位。1967 年，科学院的领导权被造反派夺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开始进入科学院的最高领导层。1968 年，在“斗、批、改”阶段，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科学院，解放军和群众代表在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中的比例高达 76%。造反派始终在领导层中占据重要地位，科学院的领导班子成了执行“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得力工具。在此期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数量被大大削减，科研机构出现了大的变动。一部分研究所划归国防科委，一部分研究所下放地方，一部分研究机构被撤销。到 1973 年，中国科学院除 43 个双重领导的研究所外，直属研究所仅有 13 个。领导班子的改组和研究机构的肢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院整体的性质和任务，使科学院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同时，科技人员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相当大的部分被散失、损毁，一些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课题被取消。—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院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正如 1977 年 6 月方毅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的：“这几年来，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新技术领域，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在基础理论的许多领域，研究工作停顿了；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中许多重大的关键性的科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科技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现象，科研的装备和实验手段相当落后。学风被破坏。”“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院造成的破坏表明，科学院如不很好地进行整顿，在国家建设中是难以担负起所应承担的重要任务的。中国科学院 1975 年的整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拨乱反正

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院造成的严重影响，把科技工作搞上去，1975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同时间，党中央批准了关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参加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领导科学院工作。整顿科学院的工作从组织、思想、理论等方面展开。

一、整顿领导班子，执行科技工作正确的方针政策。

7月14、18日，李昌，王光伟与胡耀邦先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胡耀邦等人到科学院后，首先着手改组领导班子，加强领导力量。他们参加党的核心小组以后，又先后调进刘华清、王屏，增补了武衡和胡克实。核心小组改组后，取消了造反派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制度。同时，改变了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这时，虽然科学院的革命委员会还存在，但是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1975年10月，党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为核心小组副组长，核心小组组长继续由郭沫若担任。科学院领导班子的改组，为整顿工作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

在加强科学院领导力量的同时，胡耀邦等重视并强调发挥研究所所长的作用。10月31日，胡耀邦在座谈会上提出：要重视选拔业务干部，“在今后一定时期内要大力扶持业务干部的威信”，“支持他们大胆放手地抓业务工作，没有这一条对大干快上不利”。他还多次提出，要恢复所长制。“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第一流的……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力量。”他经常这样讲：如果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当所长，老老实实地对他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10月5日，他在数学所讲话时，明确反驳了所谓恢复室主任制是复旧的说法：“说室主任制是修正主义路线，我看是形而上学。”“不要以名词吓唬人，把科研搞上去，谁都要服从这一条。”在胡耀邦等同志的支持下，研究机构的业务专家重新受到重视，研究所所长的作用开始得以发挥。

在组织整顿中，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落实政策，消除派性，促进安定团结。整顿开始后，胡耀邦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落实政策，开始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受审查者所作的结论；对于没有安排适当工作的科技人员，尽量给予安排。为了使更多的科技人员发挥所长，胡耀邦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查，发掘人才。8月19日，他与部分科学家座谈时，真诚地请求：“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他列举了一位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搞植物生态研究的科学家，回国后于1970年被下放的事例，向大家询问：“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经过大量工作，科学院在4个月的整顿中，落实政策的达800多人。

在落实政策的同时，科技后勤工作也得到了加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技人员的生活基本上无人过问，加上下放农村等因素带来的变化，使

许多科技人员在生活上存在着困难。胡耀邦等明确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队大家议论很多的生活困难入手，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问题、夫妻分居两地问题、煤气炉子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等。一直压抑的科技人员从这些生活小事上点点滴滴地感受到尊重和关心。人们相聚时，生活中正在出现的变化成为大家热衷谈论的话题。

二、整顿思想，把科学研究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科学院在进行组织整顿时，思想整顿的工作也在进行。正如胡耀邦8月15日谈到的：科学院的整顿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领导班子的整顿；第二，思想作风的整顿。思想方面的整顿，时间可能更长，任务更艰巨。10月15日，胡耀邦在一次会上明确指出了科学院科研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这次要以思想整顿为主呢？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的，破坏科研的。行政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去帮助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研工作。当时在科技领域需要弄清思想的，首先是科学院的方向任务问题。在旷日持久的大批判中，党内一度提出科研工作要“三面向”的口号，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学校。1971年，又提出科研要“三急”，即：急战备所急，急工农兵所急，急工农业生产所急。以后“三急”又简化为“开门办所”的方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口号无论怎么变化，均不是以发展科研为前提，而是以“改造科研工作者”为目的。科学院的方向任务到底是什么？这是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有一次，胡耀邦与几位科技人员交谈，人们告诉他，这些年除了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就是搞生产，与白菜、土豆打交道。有些研究所每周搞业务的时间不足20个小时。这些问题给胡耀邦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把科研工作搞上去，胡耀邦深入到研究所召开各种座谈会，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每次讲话前，他都亲自准备提纲，对于需要强调的问题考虑再三，甚至对于如何使用新语言来表达新思想也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他每到一个单位都用生动的语言发表即席讲话。他在大会小会都明确回答：“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10月5日，他在数学所说：“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打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8月19日，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说：“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10月15日，他听取遗传所党委汇报时，又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他还说，我们是搞政治的，“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要骂我们的”。因此，“所有的工作为一个目标服务，为把科研工作搞上去”。胡耀邦针对现实，大胆直言；这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干部讲话时照念堆满“最高指示”的稿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

为使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牢固地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专门作了“实

现四个现代化最新的长征”

的报告。他生动地叙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和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长征到现在四十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本世纪末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他满怀激情地说，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再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故事。我们这些人呢？假使我能挣挣扎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将向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青人……胡耀邦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2500名青年同志，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至今，科学院的许多老同志谈起这次大会，都说：那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大会。胡耀邦讲到激动的地方时，台下成片的听众流下了眼泪。一些原来参加造反组织的年轻人，在这次大会后再没有批判“唯生产力论”了。胡耀邦提出的“新的长征”的口号传得很广，影响很大。直到1975年底，整顿工作受到批判时，有的刊物还在宣传“新的长征”的思想。

其次，当时在科技领域需要弄清思想的，是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当时还不可能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观点，但是胡耀邦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尽量消除“左”倾错误的影响，为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创造条件。

1. 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科技领域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毛泽东在1963年听取十年科技规划汇报时谈到的思想。重新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则是科学院进行思想整顿的重要依据。科学院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尽量使大家明确这样一个概念：科技领域不属于上层建筑，不能把所谓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论”搬到科技领域，把广大科技人员当成专政对象。李昌多次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说：在“科学技术战线不要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如果在科技战线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容易把科技人员变成专政对象，“不能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2. 否定“开门办所”的口号，明确科技界的主体是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联系实际。整顿开始后，胡耀邦、李昌明确否定了“开门办所”的作法。9月28日，李昌在谈话中说：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会走到另一方面，如清华大学拆掉水利馆，为办工厂拆掉实验室”。他们否定了科技领域的主力军是工农兵的提法，明确提出“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还提出：“批‘理论风’的口号是错误的”；“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要到工厂农村去。

3. 否定“知识私有”、“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等提法，鼓励科技人员钻研业务。为了打消科技人员钻研业务的顾虑，胡耀邦、李昌在许多场合对所谓“知识私有”、“白专道路”进行了反驳。他们鼓励科技人员精通科学，又红又专，向专家发展。1975年8月，胡耀邦主持了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科学技术规划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与会者强调了两个问题：（1）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工作必须走在前面；（2）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必须划清发挥科技人员作用与“专家路线”和钻研业务与“技术挂帅”

等政策界限。这次会议对于上述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整顿具有广泛的基础。

三、提出科技工作汇报提纲，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胡耀邦等参考 1961 年中央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这份由胡耀邦提出总体思路，由李昌、胡克实等人分头起草，最后由胡耀邦逐段逐句审定的文件，在几经修改后，于 8 月 17 日由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联名上报（以后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概括了科技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写上了许多近 10 年来未曾明确的观点。

第一，提纲肯定建国以来，“我国科学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和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为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作出了贡献”。20 多年来，科技战线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第二，提纲肯定现有的 400 万科技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人已经成为政治上、业务上的骨干”。第三，提纲在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方面，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六个关系。1. 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科技都不可能搞好。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巩固。”2. 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科研要走在前面。”“没有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就不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3. 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绝对地、不加具体分析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4. 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既要反对崇洋媚外，盲目照搬，又要反对排外主义，闭关自守。必须经常地密切注意和调查研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5. 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还是不够的，要有计划地加强……而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6. 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

《汇报提纲》第三稿上报后，邓小平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斗争策略，提出棱角要磨掉一些，但原则要保留，要胡乔木接手修改《汇报提纲》。为了适应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后的修改稿采用了大量引述毛泽东论述的办法，在许多提法上十分谨慎，原稿中一些比较尖锐的语句均作了修改。即使是这样，《汇报提纲》以后仍被“四人帮”作为邓小平的重要“罪状”，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汇报提纲》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对于明辨科技领域思想理论是非的迫切要求。

还必须提到的是，为了克服科技队伍年龄老化和后继乏人的状况，胡耀

邦等还向中央提出了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创办科技专科学校，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3年后送到研究所工作，或送到国外留学等建议。

整顿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从7月中旬开始，至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而被迫中断，历时整4个月。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在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却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科技战线把广大群众向往科技繁荣，抵制“左”倾错误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了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科技战线上，广大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等人摧残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早已强烈不满。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从组织上、思想上、理论上逐步开始拨乱反正，在科学院的干部和科技人员中赢得了广泛拥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将《汇报提纲》（第一稿）作为批判材料印了2000多万册发到全国，并指使“梁效”写“整顿就是复辟”的文章。这些活动遭到了科学院广大群众的抵制和谴责。有的单位的群众去清华大学贴出大标语要同“梁效”辩论。科学院召开的批斗大会，也因批斗不下去而成了一场闹剧。1976年2月，在“四人帮”的精心策划下，又一次安排科学院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批判大会。姚文元布置新闻单位派来成百名记者、《人民日报》以预留版面，准备大事宣扬。在这次批斗会上，胡耀邦因患病未能到场，李昌被造反派押到了会场。会议开始后，到会群众要求认识一下主要的被批斗者。当李昌从台上站起时，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李昌被迫绕场一周，群众纷纷向他表示欢迎。批判开始时，与会者先后退场。“电影机摄下的只是稀稀拉拉、七零八落的场面，记载下的是使“四人帮”极为难堪的景象。”

科学院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抗议和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抵制，与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悲痛汇合在一起，在震惊世界的“四五”运动中达到高潮。“四五”运动中、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和工人群众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厂的群众写出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一充满战斗豪情的诗篇。半导体研究所和其他不少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不顾禁令，播放了周恩来生平事迹的录音。历史表明，科学院广大群众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在科技战线上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二、在科技战线进行有限度拨乱反正，开始对建国后科技工作中的基本争论作出总结。

在思想整顿中，从分清思想理论是非入手，进行拨乱反正，是科学院整顿的重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清是非的工作是与正确评价建国后科技战线的基本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胡耀邦等人的多次讲话和《汇报提纲》论及建国后科技战线状况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充分肯定建国后科技战线取得的成绩，同时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工作受到了干扰破坏，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这在当时是要有一定勇气的举动。这种肯定和正视，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否定。确立了这一基本认识，其他问题的是非正误，也就有了得以分辨的出发点。此外，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科学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建国以来的科技、文教等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等人搞得极为混乱的问题。《汇报提纲》在论及这些关系时，不仅尖锐地批驳了“四人

帮”极左理论，而且继承了“文化大革命”前党在科技工作中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科学工作中的争论作出了基本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工作，标志着党内代表正确发展趋势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思想的日益觉醒，是由被动抵制“左”倾错误到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环节。

三、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正确途径，为新时期改革开放路线的形成作了思想准备。

党虽然在三届人大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不断发展，致使党对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了歧途。1975年，在中国科学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不仅为恢复科学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做了大量工作，还从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研工作要走在整个国家建设的前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些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应该看到，7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以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确认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科技人员（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的否定，而且孕育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这种思想认识，可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长远大计。事实也是如此。《汇报提纲》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

（张化）

一篇文章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了。——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
讨论的前前后后

1978年11月末，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位与会者发言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言立即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真理标准问题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华国锋亮出了“两个凡是”

的方针，邓小平则举起了实事求是的大旗。1976年10月6日，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这几个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标志着陷中国于10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华大地上又一次出现了1949年金秋10月曾经有过的喜庆场面。然而，一度沉浸于欢乐之中的人们不久便发现还不能笑得太舒畅，因为那场未放一枪一弹就使“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漂亮行动并没有给“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划上一个句号。相反，“左”的指导思想还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并在党内外仍保有不可小视的市场。党和共和国面临着坚持、维护“左”倾错误的势力和要求纠正错误、回到正确道路的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斗争。

在举国欢庆胜利、揭批“四人帮”之际，先是部分较早觉醒的有识之士、尔后是越来越多的各界群众强烈要求进行拨乱反正，这种要求在政治方面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实际上，这两个要求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反映了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显然，这些问题不是仅仅揭批“四人帮”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到在当时还颇为敏感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问题，牵扯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是摆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面前的严重挑战。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步调一致的领导人在认识和处理上述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分歧。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及其他几位领导人容许、鼓励人们揭批“四人帮”，但不容许人们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1976年10月下旬，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上，华国锋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年之际，中华大地上再次出现了花圈、诗词和标语。它不仅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也反映着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然而，当时中央某些负责人的态度却与此格格不入。当《人民日报》就周总理逝世1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时，汪规定只准发4、5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泽东审查过的。与此同时，当《红旗》杂志就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文请示时，汪东兴批示

只能“不点名”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理由是“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

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引起了华国锋的注意，但他却背离了人民的愿望。1月下旬，在按他的意图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之一李鑫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出来工作，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的矛头是对着谁呀？要写社论把人们的注意力扭转过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当天的《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4号宋体字，加框刊出。首都其它报纸同日，全国其它报纸随即也以同样的规格转载。这篇社论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社论针对性极强地表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它以在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形式出现，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事实上，它与华国锋等人此前的思想一脉相承，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对待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以至整个经邦治国的态度和方针：一切都不容许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党和共和国还要按照以前的路线继续走下去！

这里有必要说明，这篇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这3个单位的负责人未与闻其事，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部也不甚明了。当时的宣传部负责人耿飚事先就毫不知情，并曾反对发表。实际上，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修改、汪东兴拍板的。

1977年3月，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14日，华国锋发表讲话。在谈到当时的思想政治动向时，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其中谈到邓小平同志问题时，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他却解释说、粉粹“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他还说，对邓小平同志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他认为，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

条件逐步成熟。他说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在讲话中首先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接着又说，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他认为，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告诫大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的上述讲话表明，在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他虽然已经有了松动，即认为邓小平有功有过，适当时候要出来工作；绝大多数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其根本态度没有变化，仍认为批邓是必要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在讲话中，他重申肯定“文化大革命”是7分成绩，3分错误。他两次表示并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说明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的。

与华国锋等人的态度相反，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人民群众关于拨乱反正的要求，对为进行这项工作设置障碍的“两个凡是”的方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斗争。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尽管华国锋一开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但并未奏效。13日，陈云在发言中说，为了中国革命、中国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同时提出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王震的发言更为尖锐：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他们的斗争，得到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实际上揭开了中央内部拨乱反正的序幕。

邓小平，这位在中共党史上几落几起、不屈不挠的政治家，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在“两个凡是”的方针盛行一时，老一辈革命家及觉悟群众的正义呼声受到压制时，邓小平又一次挺身而出，并且以其特有的敏锐和坦率直指问题的要害。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5月3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实际上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5月24日，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直率而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

对他们讲，‘两上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恒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这年的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领导职务。这无疑是在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邓小平认为，要彻底从思想理论上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在这次全会的闭幕词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着重谈了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党的学说的的问题，强调，“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号召一定要把这些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起来，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提出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践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中，通过论述我们党同张国焘和“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有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永远对党忠诚老实”。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思想路线问题”。他总结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说明“我

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老一辈革命家是在“两个凡是”、还是实事求是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同时，还推动着一系列局部和具体问题的拨乱反正，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都不同程度地动摇着“两个凡是”的基础，缩小了“两个凡是”的市场。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其中包括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需要有一个过程等因素，尽管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局部性进展，但围绕这些问题的矛盾和斗争仍是十分尖锐和激烈的，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在一些问题上还占有优势。

当邓小平提出“准确地、完整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时，汪东兴、李鑫认为这和“两个凡是”的精神不一致，要求修改。

在1977年9月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的发言由于触犯了“两个凡是”，被拒绝在会议的简报上刊登。

1977年7月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虽然在组织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两个凡是”的方针还是华国锋等讲话的主调。

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却认为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报告虽然对“四人帮”的不少谬论和倒行逆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揭露和批判，但却仍然坚持并且阐发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观点；报告仍然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这些错误虽然只代表了少部分人的观点，但却以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形式昭告党内外，说明在党中央高层占据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 and 方针。

历史就是这样在徘徊中前进。由于受“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拨乱反正工作虽然取得了局部性进展，但仍然面临着根本性的阻力，难以深入下去；在“文革”中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旋而又掀起一次跃进的热潮，开始步入建国以来又一次大起大落的旧辙。历史越来越明确地提醒人们，党和共和国要从根本上走出“文化大革命”，跨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就必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正确而深刻的反思。要摆脱“左”的思维方式，走出“两个凡是”的藩篱。

历史的发展也为问题的解决创造着条件。邓小平的复出和老干部的继续解放从组织上增强了党的正确领导的力量，使其开始与“凡是”方针相抗衡、人民群众可以公开听到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声音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展及遇到的阻力都在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思索和觉醒。在这个思索和觉醒的过程中，理论界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事实上，人们已日益接近问题的核心和实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张成的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文章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文章还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

应该说，这篇评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本质。它虽然只有 1000 余字，发表的位置也不突出，被安排在第 3 版的左中部位，尚没有引起轰动性的反应。即便如此，《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收到了 20 多封群众来信，其中多数来自基层的干部和群众。这一切至少说明，中央高层的争论和斗争已经开始引起理论界和部分群众的关注和参与。无疑，这个势头正越来越强。

矛盾的蕴育和发展必然导致矛盾的爆发和解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左”的思想 冰封开始解冻了

如果说 1977 年到 1978 年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思想政治方面的大讨论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光明日报》则充当了正式引发这场讨论的“导火索”的角色。

1978 年 5 月 11 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不长，只有 7000 字，却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争论。

实际上，这篇文章在前一日，即 5 月 10 日已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因此，交代它的由来还需首先从坐落在北京西北郊那所中共中央的最高学府说起。

1977 年冬，1000 多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的历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在当时视为“难题”的问题。主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认为，对此应该研究讨论。他明确提出了研究讨论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这所庄严的马克思主义殿堂出现了气氛活跃、思想开放的局面，并创办了一份《理论动态》作为学习、交流的园地。根据学习、讨论的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酝酿着就真理的检验标准等问题撰写文章，进行宣传。

几乎是与此同时，或者更早一些，1977 年 10 月，《光明日报》收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两篇来稿。这是此前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光明日报》的约稿。其中一篇是批判江青的，一篇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选中了后一篇，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加工，寄还作者同意后，准备在该报《哲学》专刊第 77 期发表。

1978 年 4 月初，这篇文章的大样被送到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的手中审定。这位新任总编辑刚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他深切感受到了中央党校的活跃气氛，也知道党校理论研究室正在酝酿准备的文章。面对手中的大洋，他敏锐地感到了真理标准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政治界的分量，于是决定，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然后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

修改的主要要求和目的是增强现实针对性。恰在这时，原作者胡福明来北京参加理论讨论会，报社便请他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一起讨论修改问题，并由胡福明亲笔写出了又一次修改稿。这个稿子经报社编辑两次加工后，又送到中央党校研究室再加修改、润色。就这样，这篇文章先后 10 易其稿、历时 7 个月，始成定稿。这个过程正如胡福明后来所说，“当初写文章时是我个人的行动，但是文章以后的修改、发表，就不再是我个人的行动了。当时有一系列的同志出了力，还有相当一批同志在互相沟通。这是集体的努力，有组织的行动”。

经过胡耀邦的亲自审定，这篇文章于 5 月 10 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光明日报》于次日发表。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并用有力的事实说明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说明任何理论部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联系到当时思想政治领域内的情况，文章强调指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接着说：“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敢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历史已经多次表明，在有些时候，一个观点、一篇文章、一件事情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有什么惊人的新东西，而在于它提出、发表、发生的环境和时机，在于它对现实生活的作用和冲击。人们发现《光明日报》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以下简称《实》文），其基本内容不过是复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有些还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发表，其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针对性却是再明显不过了。因此，它立即在党内外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了人们和各界的不同反响。一场时代的大讨论就这样展开了。

《实》文首先引来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反感和责难。

5月12日，即《人民日报》转载《实》文的当天，《人民日报》的一个负责人便收到了一个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的电话。次日，新华社负责人也收到了一个指责新华社转发《实》文的电话。

数日之后，5月17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了《实》文和《人民日报》5月5日发表的《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说这两篇文章他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5月1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大家对《实》文“议论纷纷，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对《实》文和其它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对胡耀邦则点名批评，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特别说到，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认为，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

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受他们的影响，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对这场讨论长时间保持沉默。当然，沉默也是一种表态。当该刊负责人反映《红旗》的态度正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责难时，汪东兴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当《实》文受到责难、讨论受到压制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则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

5月30日，在同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且批评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尔后，在同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7月21日，邓小平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党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部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迫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

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 85 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文章送到，编辑们发现，文章除了回忆历史外，还讲了现实，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这显然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而作者又不愿删改，只好报送中央常委裁决。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在批语中对《红旗》提出了批评。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当中央高层围绕《实》文的发表及其讨论开展斗争的时候，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并没有坐等观望。他们从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支持中受到鼓舞，顶住来自“两个凡是”派的种种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实》文及此前《人民日报》“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发表以后，多数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同志对实践是否是“唯一标准”的问题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在当时是一个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针对这种状况，应《人民日报》的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刑贡思于 6 月 16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专门对上述疑问给予答复。该文认为，主张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作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一些同志的另一种混淆，是“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指针，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哲学上讲，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是承认理论认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承认这种反作用，决不能否认实践所起的根本的决定作用，不能用这种反作用来代替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

面对有些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种种责难，理论工作者不是避之躲之，而是勇敢地迎战，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和反驳。其中比较系统、比较尖锐、比较泼辣的是 6 月 24 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长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有力的历史事实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正确关系，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混乱，并针对当时的实际和对实践标准的种种责难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判。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要坚持某些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合在一起的缘故。这些人，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饰辞），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会因此受到迫害。”针对有些同志发出的若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的责难，文章写道，“对于说这种胡涂话的人，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供他们思考以外，这里，只需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这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说理充分，针对性极强，有人称它是《实》文的姐妹篇。它是在胡耀邦及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关心、支持下产生并发表的。文章成稿后，《解放军报》社曾送请罗瑞卿阅，罗瑞卿先后细看了3遍，亲自打了5次电话，并亲自查阅有关著作，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要求文章无懈可击。这位由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高位截肢的将军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还特地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50大板”。对不久便辞世的这位将军来说，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心和支持，是他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一个更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但是，当这场讨论开始后，自然科学家们还是感受到了它的实质及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份量，便旗帜鲜明地投入进来。早在5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有关文章，并作出决定：支持这场讨论。7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出面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罗伟、朱洪元、何祚庥、汪容、吴汝康、徐联仓、李宝恒、赵功民、于光远、吴江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作了发言。科学家们用自然科学史上的大量事例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在实验中得到证实的。他们提供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据对于这场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发挥了特殊的支持作用。7月5日至21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了有全国506个单位共1500多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的全国的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真理标准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大家认为，这场讨论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意义十分重大。

7月17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国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研究机关、新闻单位的部分理论工作者160多人举行讨论会，探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首先讲话。针对当时的一些不正常情况，邓力群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表，而且允许保留。要造成一种风气，不要随便把一个人搞臭。打棍子的人，并不是自己有什么高明，只是表明他没有道理来说服人、只能用棍子、帽子来压服人。这些同志连起码的理论知识都没有，没有起码的调查研究。批评一篇文章，也没有通篇看一看，通篇考虑，而是抓住句把话，加上主观臆测，对这样的同志不用怕。他指出，今后的理论研究应该面对今天新的问题，因为新的问题太多了。过去的问题，确实不是一篇文章一个时候解决得了的，这需要经过今后新的历史实践的检验，才能看得更清楚。在7月24日的闭幕式上，周扬以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讲话。他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强调科学没有禁区。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

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讨论会上，冯定、王耕今、马沛文、汪子嵩、胡福明、李秀林、林京耀等作了发言，联系实际，充分肯定了这场讨论的现实意义。这次讨论会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的高潮之一，它使这场讨论在全国范围内更广泛地展开。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始终走在前面，发挥着先锋和引导的作用。根据讨论开展的情况及出现的主要思想问题，它们总是给予积极的、富于说服力的战斗性的分析和回答。9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精神对待各种新情况，推动历史的发展。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有人听说实践标准问题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出这种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是对坚持真理的同志乱扣帽子，是根本站不住脚的”。9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强调“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看实践；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看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生产的领导是否正确，要靠实践检验；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总之，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总结了在“天才论”问题上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指出“天才论”早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障碍，扫除它已经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有人认为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妨碍高举，“那就只能说明：他这种‘高举’，并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是不怕实践检验，不怕批评的”此外，这两家报纸还发表了为数不少的署名文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此后，随着讨论的继续，文章也还在陆续发表。形式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在这场热潮中，有一种现象尤其引人注目，这就是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全国大多数的省级党政领导机关、大军区领导机构都相继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多省委及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撰文或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高度评价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省、市及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高度关注、主动作出鲜明的表态，并见诸报端，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空前的。但它却又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的。他们的发言一般都联系当时全国及本地区的实际，不但指出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更强调其政治意义。这至少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确实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表明实践标准的正确观点已经引起

人们的广泛共鸣和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的有力支持，权力标准、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在中央领导层中围绕真理标准讨论的争论和斗争处于某种程度的僵持状态时，他们的表态无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于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种种原因，中共中央领导层围绕“两个凡是”及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天平已开始向正确力量一边倾斜。这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和按劳分配问题，认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两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华国锋也同意这种看法，汪东兴没有表示异议；11月14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在那场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邓小平重新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这说明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群众提出的最迫切的两大要求已基本得到实现。这无疑标志着在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和斗争中正确力量日益占据优势，僵局已经打破。

然而，事件并没有就此了结，作为这场讨论和争论的最后一个回合，从而使其结局最终明朗化的，是发生在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场斗争。

**最后的斗争不促使人民赢得了这场争论，
更重要的是通过它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

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中共中央于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订议题是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 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 1978 年 9 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前夕，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首先讨论从 1979 年 1 月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会议的中心思想。但是，会议开始后，与会代表提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特别是 11 月 12 日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应给予考虑和决定的 6 个问题后，会议的气氛更加活跃。其中涉及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则是在 11 月 27 日之后。

11 月 27 日，党内一位同志在发言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说讨论是有益的，一方面又担心这样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下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来，到 11 月下旬，会议的讨论议题已逐步转入经济问题，但这篇发言又把与会人员的注意力拉回到政治问题上。发言登上简报后，立即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真理标准问题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这对似乎已近尾声的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又发生了很大影响：

其一，它将真理标准问题集中地提到了与会的 200 名中共高级干部的面前，使此前对这场讨论曾予以关注及还未曾重视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及中央、国务院的部门负责人又一次交流和探讨这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对实践标准的观点及其讨论给予坚持支持，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提出尖锐批评。这种情况一方面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结局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也使这场讨论的影响和作用更力深刻和广泛。

其二，在与会人员的要求下，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一些情况，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这说明围绕着“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将近两年的争论，以正确观点和正确力量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一段落。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其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这样的评价：“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刚刚结束时党的领袖及那次历史性的会议对它的评价。这个时候，如果说对于这场讨论本身来说已经产生了一个结局、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局的话，那么，对于这场讨论对执政党和共和国历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言，则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是个意义深远的开端。从此以后。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魏新生）

有人说：现在有些高级机关警戒森严，还有极少数人进了政治局后深居简出，“一人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新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万里说：当前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康克清说：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推倒。王震说：我今年略略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谭震林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对毛主席。

1978年，是中国结束“文革”动乱的第2个年头，又是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21个年头。人们回首20多年历史风云、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曾被诅咒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曾被赞颂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却依然十分落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历史和现实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强烈呼唤：重新确定正确道路，集中精力加快发展生产力，带领中国人民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局面。

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厚望，终于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历史转折的条件趋于成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此时的说法是“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的方针指导下徘徊前进了2年。这种局面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奋斗了几十年的早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极不适应,同广大干部群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迅速消除十年动乱严重后果的强烈呼声也极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地结束徘徊局面,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崛起和腾飞。而实现这一转折的关键,一是在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一是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及时看到了实现这一转折的必要和关键所在,并为这一转折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后来,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历史过程时曾谈到:“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78年7月29日,国务院召开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在总结建国28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思想主张。关于改革,李先念提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无论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注意发挥工农业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给予各个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关于对外开放,李先念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极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如此明确、大胆的思想主张,已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设想,而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展望。这说明,新的方针政策已经在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酝酿。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央作为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这无疑对会议作出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奠定了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所进行的种种努力,终于在1978年底,把中国推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也使预定于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具备了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条件。

突破了原定议题的中心思想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这次会上都已提出。因此,通常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包括了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3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大组进行讨论。

在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的会议议题是:(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2)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同时又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显然,这一中心思想大大突破了3个议题的范围。3个议题仅仅局限于经济工作范围内,而这一“关系全局”的“中心思想”所涉及的则首先是政治思想路线,即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从华国锋在开幕会的讲话可以看出,他是主张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企图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前提下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因此,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也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甚至没有提指导思想的问题。但是,既然要讨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就不可能不涉及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等问题。这也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早就提出并一直争取解决的问题。为使这次原定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一个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会议,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1月12日,陈云在一个大组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接着列举了6个问题:(1)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等问题;(2)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一大批干部的问题;(3)陶铸、王鹤寿同志的冤案问题;(4)彭德怀同志的问题;(5)天安门事件问题;(6)康生的罪行问题。这6个重大的遗留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根本问题。因而立即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和热烈响应。各个组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和农业问题时,都纷纷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纠正“左”倾错误,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有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问题。

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时和认真地研究了大家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处理。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公开彻底平反。在此之前,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

革命行动。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关文件全部撤销，责任由中央承担。（3）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因这个案件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4）关于薄一波等61人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5）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骨灰应放到八主山革命公墓。（6）陶铸同志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7）杨尚昆同志过去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8）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9）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还决定，各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这几项决定充分采纳了大家提出的正确意见，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决心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大家感到心情舒畅，思想解放。很多同志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是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使会议的气氛更加活跃。这不仅意味着被忽视多年的党内民主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并受到党中央的大力支持，而且也意味着一度被抛弃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得到确立。

这样，对“工作重点转移”这一“中心理想”的讨论，首先就触动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而对于指导思想的讨论和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重新确立，又必然促使与会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党在多年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从而使会议的议题也就必然要大大突破华国锋所宣布的讨论经济工作的范围。

新的历史时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

根据华国锋意见，从11月27日起，会议转入对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的讨论。但是，由于指导思想问题在解决遗留问题的过程中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尽管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问题，并对《红旗》杂志和中央宣传部对这场讨论一直不表态提出了批评，但当时大家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解决遗留问题方面。因此，在基本解决了遗留问题，转入对经济工作的讨论后，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的问题。

果然，11月27日在大组的讨论中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看法，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已见诸许多报刊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这种意见立即引起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很多人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意义，对压制和阻碍这场讨论的一些领导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在讨论中长期保持沉默的《红旗》杂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围绕这一问题，会议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进一步摆脱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束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普遍地感到了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

胡乔木在另一大组讨论时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样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是非不清，又怎么能落实党的政策？

有的同志发言说：真理标准问题虽是马列主义的常识问题，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个原则不明确，思想就不能够解放，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受压抑。缺乏一个最后明辨是非的客观标准，遇有分歧就难以统一认识，不利于安定团结。

还有人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关系到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的争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20几年来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错误的东西。

万里在大组发言时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习仲勋在大组指出：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

邓颖超在大组发言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每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

徐向前在大组发言时指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

最后，邓小平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高度评价了开展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指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

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很多人还提出了在三中全会过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场争论中的是非问题的建议。党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从而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继续引向了深入、保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导方针的确立。

“以阶级斗争为纲” 迅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鉴于以往政治运动频繁不断，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提出 20 多年均未解决，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一再被延误的历史教训，不少同志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时，都痛感到应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状况，把经济建设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以确保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

有人发言指出：工作重点转移，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不是暂时的，短期的，而是战略性的，是针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而提出来的。今后我们要重点搞好现代化建设。

有的同志则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个提法值得研究。如果这样，就没有主次，没有重点了。

有人在发言中指出：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它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另一大组的发言中指出：从 1965 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三起两落，粉碎“四人帮”以后是第三次提出来，这一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就强盛不起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能体现。

还有人在发言中指出：现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

上述意见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被明确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由于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处理失当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使一大批领导干部长期受迫害，不能工作，而且使亿万人民群众精神上受到压抑，积郁着不满情绪，成为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一大障碍。而实现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又必须以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为前提。因此，从巩固安定团结的需要出发，与会同志不能不首先提出并强烈呼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继11月12日陈云讲了6个问题之后，各个组都提出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如：天安门事件问题、“二月逆流”问题、武汉“百万雄师”问题、四川“产业军”问题、内蒙“内人党”问题、彭真的平反问题、黄克诚、周小舟、邓华、洪学智等同志的平反问题，……等等。这样大量的问题，应当根据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陈云在11月12日的发言中提出：对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有人在一个大组发言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等点了一些人、涉及很多人，量很大。当时他们是以中央名义出面的，下面不好处理，中央应该统一讲一个原则，由各地自己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康克清在大组发言中说：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凡是中央当时通知，做过决定的问题，一些全国性的问题，统一讲一下。

聂荣臻在大组发言中还提醒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时，注意不要把派性挑起来。

同组另一个发言提出：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上来。对属于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案子，中央有过决定、中央负责同志讲过话的，中央不讲几句话不行，很多人会觉得不好理解，总会有意见。

另一大组的一个发言说：只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错必纠，有步骤地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的错误，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根据大家的发言，邓小平在12月13日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他说：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这一方针得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通过。会议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

最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全党大规模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探讨农业问题的症结，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在讨论两个农业文件的时候，大家普遍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感到不满意，认为这个文件没有彻底揭露矛盾和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重点不突出，措施不得力，对现状的估计也不符合实际，应当重新改写。

东北组的同志在讨论时谈到：报纸上每年叫大丰收，1972年减产了200亿斤还说丰收，丰收了15年，农业还是这个样。同组还有人指出：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

当时，四川省的农业生产恢复得较快，在全国赢得不少赞誉。但西南组的同志却谈到：四川虽然名声在外，但还有一批生产队不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大部分生产队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少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

西北组的同志谈到：宁夏西海固原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群众生活确实很困难。

同组还有人谈到，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

一些老同志特别对有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生活的贫困状况表示了极大忧虑。

王震在大组发言时提到，我今年略略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对此大家在讨论中进行了认真分析。

在大组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农业上不去，近几年经济政策翻来复去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人认为，我们过去对农民卡得比较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

在大组讨论中，有人认为，农业发展慢的原因。主要由于错误路线干扰，也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还有人认为，农业发展慢，根本原因就是有些人觉得“左”比右好，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应当反“左”。

有人认为，农业生产长期上不去，主要是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农轻重的方针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再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多年来，我们把农民挖得太苦了，竭泽而渔，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这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光从公社、生产队去找原因是不行的。

从以上发言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对于党在农业指导上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针对这些“左”的错误，大家提出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建议。

华北组在讨论中提出：建议目前看重把政策搞对头，调动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特别要坚持等价交换、实行按劳分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充分运用计划、合同制和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

西北组在讨论中还提出：农业学大寨问题要很好总结经验，必须从实际

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邓颖超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学大寨不是农业的方向，农业现代化才是方向，对“一平二调”的做法应当禁止。

西南组有人提出，要承认农民的自主权、所有权。在两种所匀制情况下，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当前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二三年内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要解决一部分地区农民没有隔宿粮的困难。

该组还有人提出，鉴于历史教训，国家一定不要征购过头粮、近几年内起证点必须稳定在三四百斤；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建议每年提高30%，3年内提高1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明年开始增到20%，以后逐年增加。

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调动农民积极性。调动的关键在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改进领导作风，改善党和农民的关系。对农民要放手点，不要卡得太死，要允许农民有真正的“小自由”，不要怕农民富。

还有人提出：要尽最大努力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绝对不证过头粮。社员自留地制度和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的规定一定要坚持，再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怕农民富了。如果认为农民富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越穷越革命，但不能越革命越穷嘛！

陈云在大组关于经济问题5点意见的发言中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到2000万吨。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它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了这一点，就是摆稳了大多数，7亿多人口稳走了，天下就大定了。我认为，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措施。

此外，大家在讨论中还对农村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提出了意见，要求实行政社分设。

根据上述意见，三中全会对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并且做出决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和1980年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给农民。

上述政策措施不仅为我国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带来了转机，而且也为正在酝酿中的农村改革注入了推动力。

改革开放的呼声

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开阔大家的思路 and 眼界，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与会同志认真研究了这些材料，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

有的同志在讨论时提出，可以向外国借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合办工厂。我们赚外国资本家的钱，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行？要研究日本、西德、南斯拉夫等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很好地吸取它们的经验。

还有的人提出，我们的上层建筑有两个方面不合理，一是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吃大锅饭；二是体制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这些都严重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有人在讨论中提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一方面存在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不少管理办法、规章制度，还是统得过死。从中央到省、市、地、县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

还有人提出，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我们要采取各种方式，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

大组讨论中，有人提出建议：从福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地区特点和有利条件，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放手大搞出口贸易，通过外贸和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基础工业，搞农业机械化，以轻养重，以重促农，从而为发展福建经济闯出一条路子来。

还有人提出：要改进管理体制，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权力，以便调动各级企业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意见，三中全会作出了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决策。这些决策在三中全会后逐渐明确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酝酿调整方针

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不少人清醒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冷静地分析了比例失调的危害，初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贯彻，是对长期以来主导经济战线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顽症纠正的开始。

有人发言指出：要正确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要继续解决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遗留的后患，同时又要进行新的长征，各方面搞得很紧，国民经济失调的状况比较突出，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陈云在大组讨论中谈了对经济工作的5点意见：（1）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到2000万吨。（2）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不要一拥而上。（3）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4）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和轻工业。（5）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讨论中不少人指出：现在的经济状况，应承认有比例失调的问题。综合平衡，还没有真正搞好。比例失调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农轻重的关系；先行官和整个工业的关系；生产与生活即骨头和肉的关系。大家拥护陈云的意见，希望在计划安排上再做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

还有人提到：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可能有的同志就认为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放手搞建设了。大家什么都要上，忘了有些失调现象还是严重的，因此，中央应明确一下，明后两年还有调整的任务。

一个大组的发言提出，当前突出的矛盾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建议中央考虑，在今后两三年内，把工农业比例失调大体上调整过来，使农业逐步适应今后建设的发展。今后做工作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还有人在讨论中提出：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四个失调：（1）工业与农业失调。工业品普遍积压，农业落后，农民购买力低。（2）骨头与肉失调，多年来我们主张先生产后生活，这在计划安排上是不行的。（3）工业内部不平衡。主要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矛盾。（4）行业内部失调。石油、冶金、电力等工业部门都存在这方面问题。

三中全会最后接受了大家的上述意见。全会公报中指出：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在此基础上，会后不久，党中央就正式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痛定思痛，加强党的建设

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其最根本的原因究竟在哪？在经过长期思考的基础上，与会同志比较一致地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为此，必须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入手，加强党的建设。粟裕在大组发言指出，“四人帮”的破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

有人在讨论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国元勋被整得家破人亡，令人痛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一条，就是

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缺乏应有的民主，党内的正确意见不能正常表达、党员的权利没有保障，坏人得不到监督，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生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

鉴于以上教训，很多人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建议。

谭震林在大组发言时深情地回顾了党的优良传统，他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

徐向前提出：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讲出来。

叶剑英在大会讲话中提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时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鉴于“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建设造成的破坏，有的同志还认真检查了党风中存在的问题。

有的同志在讨论中指出：我们党的威信下降，应该引起足够警惕，失信于民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更加危险。

有的大组还在讨论中提到：现在有些高级机关警戒森严，还有极少数人进了政治局后深居简出，“一入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这种风气不改变，就会脱离群众。

徐向前在西北组指出，要解决好体制和作风问题。我们现在有些领导机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官僚主义的情况相当严重。

除此而外，各个组还提出了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事务，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的建议。

最后，三中全会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措施。主要有：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视党法，严肃党纪；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等等。对于大家提出的其它建议，党中央也在三中全会以后陆续予以采纳。这表明，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风党纪、党视党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

呼唤法治，保障民主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公检法机关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践踏的10年。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了这一情况。华北组在讨论中提到，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公安机关至今还未恢复元气。公安部原有9个正副部长，被整了7个。

该组还有人介绍说，北京市公安局10名正副局长全被定为“反革命”，其中7名被逮捕法办，使北京市的公安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许多人都提出了恢复健全法制，严格实行法制的建议。

徐向前在西北组发言提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一方面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法制的施行。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要使群众有讲话的条件和机会，要保证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无论什么人违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叶剑英在大会的讲后中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也是钻了我们这个空子。他们砸烂公、检、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有多少人被整死，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这使我们从反面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是人民制订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力转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国家、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流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

如何来加强法制呢？叶剑英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他说，人大常委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订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法制。人大常委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大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也在大会上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程序，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另外，各个组在讨论中还普遍提出了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主犯依法在全国公开进行审判，以体现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建议。

三中全会根据大家的上述意见，专门做出了加强法制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

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和决策，都体现着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体现了对毛泽东本人功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提出的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的思想，体现了党的八大关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方针。同时，也在实际上纠正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解决了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纠正，因为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结论，几乎都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纠正这些错误，正是遵循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

三中全会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长期束缚，破除了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和思想路线。三中全会所作的一切决定和决策，也都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形成的，这也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中全会后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现实的国内外客观实际出发，制定了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把毛泽东早就进行过探索并早已提出，但一直没有条件实行的一些基本设想，如避免学习苏联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争取和一切国家做生意等等，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加以完善并付诸实施，从而克服了毛泽东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一些历史局限（这是难以避免的），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全会还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功过，并抵制了社会上正在出现的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

聂荣臻在东北组发言时提醒大家说，最近已有一个不好的苗头，就是有人企图借机挑拨党内关系，煽动反对毛主席，他们确实是要砍旗的，有人那样大声疾呼，大肆宣传毛主席有错误，不是三七开，而是倒三七，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外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

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据此全会着重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三中全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胜利闭幕

12月13日，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个方针“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肯定、并表示将按照叶剑英的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专门召开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叶剑英着重讲了领导班子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总结了党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向全党提出了勤奋学习、解决思想的要求。

邓小平主要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2）民主是解决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4）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3方面的问题。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集中体现了会议讨论中的正确意见，提出并回答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

此外，汪东兴也在这一天用书面发言的形式，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在“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错误及其他错误作了初步检讨。在此前后，其他犯有错误的同志也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

闭幕会后，各组又继续讨论两天，一致表示拥护三位中央领导人在闭幕会的讲话；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入选的建议。

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

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全会的共290人（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列席9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我们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战略决策，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为，这个战略决策，体现了历史的要

求，反映了人民的心愿，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了 1979、1980 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全会正式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同时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决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经过认真酝酿，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由 100 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12 月 22 日，全会胜利闭幕。

12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讨论的意见，对人事问题作出如下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任命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长；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

这样，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因势利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出于不少人预料的丰硕成果，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转折点。

（孙大力）

